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臺灣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記憶與記憶的鬥爭：
白色恐怖時期中共地下黨在台灣文學中的再現

The Struggle of Memory Against Memory:
Representations of the CCP Underground Party during the
White Terror in Taiwan Literature

洪楷博
Kai-Po Hung

指導教授：蘇碩斌 博士
Advisor: Shuo-Bin Su, Ph.D.

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February 2025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MASTER'S THESIS ACCEPTANCE CERTIFICAT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記憶與記憶的鬥爭：
白色恐怖時期中共地下黨在台灣文學中的再現
The Struggle of Memory Against Memory:
Representations of the CCP Underground Party during
the White Terror in Taiwan Literature

本論文係 洪楷博 (學號 R11145001) 在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14 年 1 月 17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The undersigned, appointed by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on 17 (date) January (month) 2025 (year) have examined a Master's thesis entitled above presented by HUNG, KAI-BO (name) R11145001 (student ID) candidate and hereby certify that it is worthy of acceptance.

口試委員 Oral examination committee:

許紹基 李振昌 陳俊宏
(指導教授 Advisor)

系主任/所長 Director: 張文意

謝辭



2025 年初，我終於完成了碩士論文。

回想起 2024 年，那是我寫作這本論文最密集的一年，充滿著各種不安與焦慮的情緒。這樣的情緒來自於我對論文品質的擔憂，也來自於每位研究生都會面臨的進度壓力。約在七月的溽夏時分，我生了一場重病，起因於各種精神內耗與失眠，最終導致病痛纏身。而本應是衝刺進度的暑假期間，也不得不暫時將論文擱置案頭，休養將息。這段期間裡，我非常感謝岡山醫院和義大醫院的醫師們，他們是我生病期間最可靠的精神支柱。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能生活在醫療品質如此良好的台灣，是一件多麼幸福的事。當然，也感謝父母的陪伴、師長的鼓勵。最重要的，感謝上帝給予我機會，使我能恢復健康，繼續面對我的論文與人生。

白色恐怖的議題對於「民主富二代」的我輩而言尤為重要。通常，「民主富二代」這個詞帶有調侃的意味，並不怎麼正面。出生在民主化行之有年的台灣，我們很容易將前人以血淚換來的成果視為理所當然。尤其近年來，中國侵台威脅上升、認知作戰的問題頻傳，在這個關鍵的時刻當中，更應強調前人奮鬥與犧牲的身影，唯有正視這一切的得來不易，我們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守護台灣的重要性。希望我的論文能夠呼應上述的盼望，透過回顧台灣文學中關於白色恐怖的篇章，提醒我們珍惜當下的自由與民主，並繼續為守護這些珍貴的價值而努力。

完成這本論文需要感謝的人與事茲列如下。

對於白色恐怖這段歷史，以及歷史當中的受難者們，我始終抱持著深深的敬意；同時，也感謝那些勇敢對抗威權政府的先行者們，正是因為他們的勇氣與犧牲，才能讓我們享有今日自由民主的台灣。

感謝我的家人。感謝父母支持我北上讀書的決定，並提供我生活的各種資源。如果沒有父母的支持，我將難以完成碩士學業。感謝哥哥，總是在我論文陷入困境時，傳一些奇怪的梗圖迷因給我，雖然這對論文本身沒有實質的幫助，但確實讓我開心了不少。

感謝我的指導教授——蘇碩斌老師。蘇老師總是能夠快速且準確地指出論文的問題，並且高效率地擬定修改的策略與方向。不僅如此，每次當我想放棄（再拖延一個學期）時，老師的鼓勵與督促顯得十分可貴，正因如此，我才能如期在兩年半內完成我的碩士學業。

感謝宇軒，陪我體驗了台北的各種風景與生活，我無需多言，你一定明白這其中的一切。感謝明智與亮鈞，我總是與二位學長請教學業與生活的大小事，都能獲得許多的啟發，真摯地祝福二位學長在教職的路上開心順利。感謝祥庭學長，我們是一起修課的好夥伴。感謝博士班的學長們——皓棠、士銘、智帆，大家共同營造了溫馨的研究室，不僅給予我許多正向的情緒支持，也總是熱心地與我討論論文的各種問題。感謝與我同屆的好夥伴們——冷樺、錫瑩、芷琦，我不會忘記與大家共同經歷的美好回憶，也誠摯地祝福各位在學位論文的撰寫過程中一切順利。

最後，感謝台大台文所給予我的一切。文薰老師、俐璇老師、芳婷老師、雅儒老師，從諸位師長的課堂中學到許多，使我逐漸成為一名合格的研究生。感謝兩位論文口試委員——俊宏老師、淑君老師的指教，使我的論文邁向更完善的樣貌。當然，也感謝秋蘭姐與詠萱助教的行政支持，使所有的申辦業務得以順利進行。

在我即將結束台北生活之際，巧合的是，台大台文所也即將搬離國青大樓，前往新建成的人文英華館。對我而言，或對台文所而言，都將展開新的篇章。我會懷念在國青大樓、118 巷的一切，以及那間雖小卻充滿溫暖的 332 研究室。我在這裡度過了美好的兩年半，雖然不確定自己未來會在世界的哪個角落，但我會帶著在這裡的各種回憶，更勇敢地面向未來。

2025 年 1 月

謹識於三重新生街

中文摘要



這本論文探討戰後初期在台灣遭到整肅的中共地下黨，在政治逐漸鬆緩之後出現的各種記憶，以及各種歧異記憶之間出現的鬥爭；並試著指出，台灣文學在記憶鬥爭之間顯現的獨特性——挑戰主流化的歷史敘事、抵抗同質化的集體記憶。全文就三波「中共地下黨」記憶生產，透過台灣文學的書寫來闡述不同記憶的鬥爭：(1) 以〈倖存者的證言〉為題，指出見證文學的寫實層面。本章討論解嚴後到 2000 年間的記憶：五〇年代的中共地下黨的倖存者，如葉石濤及蔡德本，在解嚴後意識到其白色恐怖記憶中的「中共」身分敏感性，產製出曖昧的「自傳小說」形式而拓展更多的言說空間。(2) 以〈敘事遺產的繼承與反思〉，關注 2000 年至 2010 年間記憶：文學書寫者一方面繼承九〇年代口述史與回憶錄的「冤假錯」敘事遺產，另一方面又生出三種「反敘事」的抵抗策略（後設小說、複眼敘事、穿越時空），典型作品即如《藤纏樹》、《海神家族》、《朝顏時光》三部長篇小說對試圖將簡化的歷史進行複雜化。(3) 以〈記憶對立的激化與反省〉為題，關注 2010 年代後文化商品之敘事在市場類型化、人性複雜化之間的鬥爭並妥協，進而出現敘事空白的因應方式。這段時期，先是藍博洲《春天》重新出版，強調這些中共受難者是「烈士敘事」，與當時主流的「冤假錯敘事」形成對立，而後 2020 年起又有針對前二種「對立」的反省，包括劇場的《紅色青春》和《無／法／對／白》以及文學的顧玉玲《餘地》的反思，以及跨越既有邊界的敘事。綜上三波時期，本研究指認出「中共地下黨」的記憶及敘事之各種鬥爭，以及更重要的，台灣文學打破對立的集體記憶、尋求包容解釋框架的契機。

關鍵詞： 中共地下黨、省工委、台灣文學、反記憶、反敘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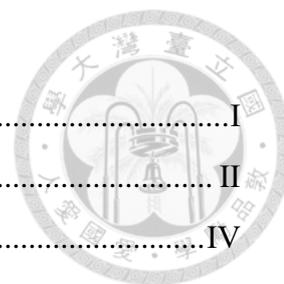
英文摘要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CP underground party suppressed in early post-war Taiwan, the various memories that later emerged, and the struggles between these divergent memories. It highlights the unique role of Taiwan literature in challenging mainstream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resisting homogenized collective memory. The study focuses on three phases of memory production related to the “CCP underground party” through Taiwan literary works: 1. “Testimonies of Survivors” (1987–2000): This chapter highlights the realistic dimension of testimonial literature. Post-Martial Law survivors of the 1950s CCP underground party, such as Yeh Shih-tao and Tsai Te-pen, navigated the sensitivity of their “CCP” identity within White Terror narratives. They used an ambiguous “autobiographical novel” format to create space for expression. 2. “Inheritance and Reflection of Narrative Legacy” (2000–2010): Writers combined the “wrongful conviction” narratives from 1990s oral histories and memoirs with three “anti-narrative” strategies: metafiction, polyphonic narration, and time-travel. Notable works include *Teng-tan-shu*, *Mazu’s bodyguards*, and *The Morning Glory Era*, which complicated simplified historical accounts. 3. “Intensification and Reflection of Conflicting Memories” (Post-2010): This period saw a struggle between market-driven genre narratives and complex human storytelling, leading to a narrative blankness as a response. Works such as Lan Po-chou’s *Springtime* emphasized “martyr narratives” of CCP victims, contrasting with dominant “wrongful conviction” narratives. From 2020, reflections on these opposing views emerged in theatrical works (*Red Youth*, *No Dialogue*) and novels like Ku Yu-ling’s *Margin*, pushing beyond existing boundaries. These three phases illustrate the struggles over CCP underground party memories and narratives, with Taiwan literature offering opportunities to move beyond oppositional collective memories toward a more inclusive framework.

Keywords: CCP Underground Party, CCP Taiwan Provincial Work Committee, Taiwan Literature, Counter-Memory, Anti-Narrative

目次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謝辭.....	II
中文摘要.....	IV
英文摘要.....	V
目次.....	V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1
第二節、前行研究回顧.....	6
一、歷史性研究的評述：關於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中共地下黨的政治案件	7
二、敘事性研究的評述：五〇年代中共地下黨的敘事研究與相關檢討	10
三、文學性研究的評述：台灣文學抵抗主流敘事的傳統	12
第三節、研究理論與研究方法.....	14
一、「集體記憶」與「記憶領域」（兼論研究範圍）	14
二、「記憶的歷史」作為方法	17
三、台灣文學作為「反記憶」的力量	20
四、中共受難者作為台灣「歷史認識」的特殊位置	23
第二章 倖存者的證言（1987-2000）：見證文學的寫實層面	26
第一節、台灣戰後至1990年代「台共」與「中共」的意義流變	29
一、戰後初期：作為「在台」的「共產黨」泛稱	30
二、1980年代：是「台灣共產黨」還是「中國共產黨」？	32
三、1996年：是「中共」不是「台共」！	34
第二節、解嚴後倖存者的感覺結構.....	39
一、解嚴後初期台灣文學的發展	39
二、葉石濤與蔡德本的自白	40
第三節、自傳小說的寫實性：關於葉石濤與蔡德本.....	42
一、「旁觀者清」？葉石濤及其自傳小說	42
二、重返記憶領域：蔡德本及其自傳小說	47
小結.....	50
第三章 敘事遺產的繼承與反思（2000-2010）：多線性文學的反敘事策略	53
第一節、後設小說：藍博洲《藤纏樹》的多層對應關係.....	56
一、藍博洲的後設小說：是「逼近」真實？還是「看似」真實？	56
二、何以「後設」？遁入多重錯位與虛實交錯	60
第二節、複眼敘事：《海神家族》的跨時空敘事策略.....	63
一、《海神家族》與複眼敘事	64
二、何以「複眼」？跨時間與跨空間的敘事手法	65

第三節、穿越時空：米果《朝顏時光》的對比意識	67
一、時空錯位的書寫意義	68
二、何以「穿越」？異質時空脈絡的衝撞	70
小結	72
第四章 記憶對立的激化與反省（2010 年以後）	74
第一節、現象：歷史的那些空白	76
一、行動與思想的模糊化：《返校》「去歷史化」的敘事手法	78
二、善與惡的二元論：《流麻溝十五號》的「浪漫化」與「汙名化」	80
三、「強弱翻轉」後的零餘者：千禧世代歷史小說「日治經驗」的偏重	82
第二節、激化：從〈許金玉〉到《春天》	85
一、與主流敘事衝撞的企圖：重複出版與立場的激化	86
二、藍博洲的「烈士敘事」	87
第三節、反省：紀念的壟斷	89
一、來自劇場的反省：《紅色青春》與《無／法／對／白》	89
二、來自小說家的反省：顧玉玲《餘地》中的零餘者們	91
小結	94
第五章 結論：台灣文學與那些框架以外的人和事	96
參考文獻	10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這本論文探討戰後初期中共地下黨在台灣遭整鬥之政治案件，在解嚴後台灣社會掀起記憶風潮之際，以及這些相互歧異版本的「記憶鬥爭」之中，台灣文學是如何以書寫行動，嘗試介入該段白色恐怖記憶的生產與重塑。作為本文的主標題，「記憶與記憶的鬥爭」改寫自真促會出版的台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書，報告書名為「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源於小說家 Milan Kundera 的名言。書序的撰寫者黃長玲認為，台灣在寧靜革命的脈絡中選擇了迴避歷史，因此台灣的轉型正義不啻是一場記憶與遺忘之間的鬥爭。¹然而，不同於黃長玲等人的關注焦點，本論文所關注到的是同一事件中「選擇性」地彰顯／掩蓋的變數所造就的不同「記憶版本」的競逐關係，也是所謂「記憶與記憶的鬥爭」的意涵；而本文最根本的立場是：台灣文學總是挑戰、複雜化主流的歷史詮釋與敘事結構，作為抵抗集體記憶內部「同質化」趨勢的一股逆流。²

¹ 詳見黃長玲：〈序：追求真相與和解的可能〉，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台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台北：衛城，2015年10月），頁5-16。

² 「記憶與記憶的鬥爭」並非我所獨創，在此說明脈絡及詳述本文所謂「記憶與記憶的鬥爭」的意涵。首先，林傳凱指出，由於「再現機制」仲介了當代對於過去的感知，因此，他將兩種再現機制（烈士敘事 vs. 冤假錯敘事）的競逐視為一種「當代與當代」的鬥爭，並認為我們應「逼近」歷史真實，且在此過程中應避免落入這兩種敘事框架的陷阱中。雖然林傳凱並沒有直接使用「記憶與記憶的鬥爭」這個詞彙，但已具備了這個概念的雛型。參見林傳凱：〈「白色恐怖」中的女性政治犯——重思「歷史真實」與「再現」的政治〉，《性別平等教育月刊》第101期（2023年6月），頁16-29。此外，歷史學者楊孟軒在思考台灣轉型正義的問題上，他將「過去的真相」分為「史實」與「史實的詮釋」二者，指出台灣轉型正義不僅只是前者「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對史料真相的挖掘）的工作，也面臨後者「記憶與記憶的戰爭」（不同記憶群體對於歷史的不同詮釋與評價）的分歧。楊孟軒：〈歷史記憶與記憶的歷史：創傷、情感、牽連性與和解〉，許家馨編，《歷史記憶的倫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24年3月），頁257-298。林傳凱與楊孟軒的概念

在正式進入討論之前，先讓我們先回顧兩個近年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

第一個事件，2022年5月18日，正當台灣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後簡稱「促轉會」）即將完成階段性任務並解散之際，於官方臉書發佈「平復李媽兜、陳淑端司法不法」的貼文，隨後，引起社會大眾的爭論。據該文所述，李媽兜於戰後加入戰後中共地下黨之「省工委會」，並成為「台南市工委會委員兼書記」，而陳淑端則因協助李媽兜逃亡期間傳遞書信，及陪同出席各地會議，而遭逮捕判刑。經促轉會調查，決議為二人平反。³貼文一經發布，立即引發大量關注，留言區瞬間湧入眾多網友，質疑促轉會是否在為「共產黨」和「共諜」平反；幾十日後，媒體人王宗緯投書風傳媒，批評促轉會對該案的平反只是「械鬥」國民黨的工具，更以反諷的口吻直言：「死掉的共產黨就是好共產黨，與國民黨做對的共產黨也是好共產黨」⁴。不久，徐宗懋也投書中國時報，批評促轉會為了強化國民黨的邪惡，把地下黨人解除刑責，這等同承認中共在台灣歷史的正義性及統治台灣的合法性。⁵這個社會現象可以反映出，轉型正義議程要如何納入中共受難者之相關案件，仍存在不同的見解。這呼應了羅宜芬的觀察，台灣五〇年代白恐案件較不

看似不同，實則內涵相通，不同記憶群體內部所欲彰顯或掩蓋的變數造就了不同集體記憶的敘事版本。為了更方便釐清此處的意義，舉一個通俗易懂的例子說明如下：若敘事者認為「中共」身分是不光彩的，便會掩蓋其身分、行動，凸顯其「被動」、「被牽連」和「被誘騙」參加中共的過程，形成「冤假錯敘事」；相反地，若認為「中共」身分是光彩的，就會凸顯其「理想」、「革命」和「犧牲」等情節，從而忽略歷史時空中的不確定性因素，形成「烈士敘事」。其中，光彩與否涉及到楊孟軒所說的「詮釋與評價」問題，這也是導致敘事中彰顯或掩蓋變數的原因，進而成為林傳凱所謂的「冤假錯」與「烈士」敘事的再現機制競逐。林傳凱提醒我們，不論是何者，都失之有偏、不切實際。而本文的立場認為：台灣文學是一個突破了這個二元對立的重要力量。本文所謂的「記憶與記憶的鬥爭」可以理解為「(同質化的)集體記憶」與文學所發起的「複雜化集體記憶」之間的挑戰。這意味著台灣文學在挑戰同質化集體記憶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³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平復李媽兜、陳淑端司法不法〉，Facebook，2022年5月18日。檢索日期：5/31/2023。https://www.facebook.com/twtjc/posts/378811014288206/?paipv=0&eav=Afa8U5GDN-ohibMsyPrL7-TxSRdSkekV6wAJ9J0DPYm-vR0_FqVp99IIIzThsMcLKeQ&_rdr。

⁴ 王宗緯：〈轉型正義的下一步——文明社會版的分類械鬥乎？〉，《風傳媒》(2022年5月29日)。檢索日期：2023年5月31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4353702?mode=whole。

⁵ 徐宗懋：〈促轉會赤化台灣〉，《中國時報》(2022年6月1日)。檢索日期：2023年5月31日。https://www.rti.org.tw/radio/programMessageView/id/134515。

受關注、平反成效不彰等狀況，部分因素與「紅帽子」與「白帽子」的統獨議題有關。⁶「中共」受難者的身份使轉型正義變得更加複雜，這一現象也突顯了當代台灣社會在全面檢討威權歷史的困難；同時，也隱含了威權遺緒的潛台詞：在剿滅「共匪」的大轟下，威權統治似乎還有正當性可言。

第二個事件，不妨一併納入參照。2019 年徐漢強導演執導的電影《返校》⁷，改編自赤燭遊戲公司於 2017 年推出的熱門國產遊戲《返校 Detention》。電影講述了戒嚴時期，翠華中學教師張明暉、殷翠涵以及學生魏仲庭、文雄、阿聖等人閱讀禁書，私自在校內儲藏室辦理泰格爾詩集的讀書會。隨後，他們遭到國民黨政府的逮捕，並遭受獄中刑訊。電影以出色的聲光效果、精湛的鬼魅特效，和緊張刺激情節的成功經營，不僅獲得了市場青睞——榮登 2019 年第 38-39 週台北週末票房冠軍，同時也榮獲《金馬獎》、《台北電影獎》等影視大獎的肯定。值得注意的是，《返校》電影很難指認「單一」或「明確」的歷史原型，電影中究竟融入了哪些歷史事件也是眾說紛紛⁸；然而，「省工委會基隆案」為原型之一並無太大爭議。究其原因，不僅是因為電影中「彩蛋」的證據：電影人物魏仲廷學號的「501014」為該案中鍾浩東的忌日，同時也得力於「文本外」（電影外）的各式宣傳與評論，包括媒體報導⁹、學術論文¹⁰，以及其它諸多間接或直接提及的各

⁶ 羅宜芬：《台灣政治案件平反與轉型正義——以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為中心》，台北：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頁 126-129。

⁷ 徐漢強：《返校》，影一製作所，2019 年。

⁸ 例如維基百科在「返校（電影）」詞條中指出的原型包括：傅如芝、傅煒亮案、黎子松案、基隆中學案。檢索日期：2024 年 2 月 29 日。[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BF%94%E6%A0%A1_\(%E9%9B%BB%E5%BD%B1\)#:~:text=%E8%BF%94%E6%A0%A1%E7%9A%84%E6%95%85%E4%BA%8B%E5%8E%9F%E5%9E%8B,%E5%91%A8%E8%B3%A2%E8%BE%B2%E7%9A%84%E5%8F%A3%E8%BF%B0%E6%AD%B7%E5%8F%B2%E4%B8%AD%E3%80%82](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BF%94%E6%A0%A1_(%E9%9B%BB%E5%BD%B1)#:~:text=%E8%BF%94%E6%A0%A1%E7%9A%84%E6%95%85%E4%BA%8B%E5%8E%9F%E5%9E%8B,%E5%91%A8%E8%B3%A2%E8%BE%B2%E7%9A%84%E5%8F%A3%E8%BF%B0%E6%AD%B7%E5%8F%B2%E4%B8%AD%E3%80%82)。而由署名潘慧中於 ETtoday 的報導，則指出蔡焜霖、基隆中學案、施水環、丁窈窕、褚耀等。見潘慧中：〈特／歷史真有「方芮欣」！《返校》5 真實故事解析...網淚：比電影更可怕〉，ETtoday 星光雲。檢索日期：2024 年 2 月 29 日。<https://star.ettoday.net/news/1540092#ixzz8T3aDaMho>。

⁹ 例如華視新聞網：〈「返校」非虛構？故事原型「基隆中學事件」〉（2019 年 09 月 27 日）。檢索日期：2024 年 12 月 31 日。<https://news.cts.com.tw/cts/entertain/201909/201909271976162.html>

¹⁰ 例如，陳青峯：《導演即大眾史家：電影《返校》的歷史書寫與歷史意識》，台北：台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社會科教學碩士論文，2022 年，頁 90-92。

類文章¹¹。之所以強調「文本外」，是想凸顯這類詮釋與論述多半在電影之外的空間中「被生產」，除了那串不容易被觀眾注意的「密碼」外，電影本身並不存在足以令人聯想至省工委會基隆案的必要元素，更何況電影開頭即將時間定於「民國 51」年，與該所謂「歷史原型」發生的真實時間差距了數十年之久。在這個事件當中，可以看到一個被「模糊化」的省工委政治案件，電影在連結特定歷史事件的同時，卻也刻意地避免呈現該案中鍾浩東等人「中共」身分的線索，這橫跨在外顯／掩藏間的取捨，異常地引人注目。

這兩個事件表面上看似毫不相關，實際上卻隱含著共通的矛盾。無論是公眾將當代對「共諜」的理解套用到五〇年代的「省工委」，從而在留言區引發各式的批評與謾罵；或是電影《返校》巧妙地將「省工委」的訊息模糊化處理，以浪漫化的手法輕輕帶過。這些事件再再地顯示了「白色恐怖」在當代文化脈絡中隱含的矛盾與掙扎：當今，去講述一個白色恐怖的故事是如此的重要，因為它不斷地提醒我們切勿重蹈覆轍；然而，當這則故事遇上了「中共」、「省工委」等字眼，卻成為了爭議——或刻意模糊化的焦點。《返校》作為面向市場的電影，在票房的商業考量下，模糊化具爭議性的人物設定，這樣的做法顯然更受市場大眾的青睞。因此，《返校》選擇性地揭示了部分歷史元素，並模糊化那些容易引起公眾爭議的關鍵。

不同記憶版本間的鬥爭與矛盾的關係，在台灣已陸續零散地發生數十年；然而，隨著近年學界相關研究的開展，以及轉型正義在台灣制度化建立而更顯糾結。檢視近年的研究思潮，可以發現對五〇年代的歷史認識產生一股反省的浪潮。例如，長期關注此類議題的林傳凱，主張重思「冤」的本地化概念，並應打破對於「冤」往往具有的「真實無辜」想像，此想像將曾經著手顛覆不義政權的行動者排除在平反與補償的範疇之外，且此舉不僅如同對於政治犯及其家屬進行「二

¹¹ 例如維基百科介紹「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案」時，即直接指稱該案件被改編為《返校 Detention》。維基百科：「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案」。檢索日期：2024 年 12 月 31 日。<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9F%BA%E9%9A%86%E5%B8%82%E5%B7%A5%E4%BD%9C%E5%A7%94%E5%93%A1%E6%9C%83%E6%A1%88>。

次審判」，更是間接肯定了威權政府政治暴力的「正當性」邏輯。¹²而陳柏謙也指出，當前大眾對於當年「自願」加入中共地下黨並從事革命運動者的理解，仍存在著「被動受害者」、「無辜」的認識傾向，往往將其視為「被統戰」的客體，而無法嚴肅地正視他們反抗威權壓迫的能動性。¹³陳柏謙擔憂白色恐怖時期反共思維的延續，仍制約著我們對於五〇年代「受難者」的扁平化認識。《返校》敘事結構，選擇性地遺忘受難者的「中共」身分，及其顛覆黨國的歷史行動，所留下的是「沒來由的惡」¹⁴，可能加深了我們對於歷史的扁平化理解，這也正是陳柏謙的擔憂所在。本文的研究主題，正是建立在這股近年所興起的研究思潮之下。

本論文以台灣文學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探討自解嚴裡來，台灣文學如何介入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重塑及其發展。在台灣文學史的脈絡中，自 1980 年代中期以來，隨著解嚴與民主化的進程，台灣文學興起了記憶風潮，書寫者們試圖挖掘在高壓政治下被壓抑的記憶，試圖再現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文學書寫者也開始出現。但與此同時，「中共」——作為外部的侵略者，對台灣的威脅不減反增。在這個民主化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以及重新定義台灣群體認同的關鍵時刻，當「白色恐怖」的記憶遇上「中共」的身份，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與發展？而文學作品作為乘載「記憶」的社會形式，又扮演了什麼角色？本文主要聚焦於台灣文學的材料，並輔以其他文化敘事（包括電影、報紙、歷史書寫）作為兼論材料。台灣文學究竟是反抗「扁平化」理解的逆流，還是助長了當代「扁平化」理解的文化因素？文學是否有助於當前對歷史認識的「複雜化」訴求？這些思考是我問題意識的最初起源。

¹² 林傳凱：〈再思台灣脈絡中「政治受害者」與「傷」的本地意涵〉，《本土心理學研究》第 57 期（2022 年 6 月），頁 103-118。

¹³ 陳柏謙：《激進 1949：白色恐怖郵電案紀實》（新北：黑體，2022 年 6 月），頁 209-222。

¹⁴ 這個詞彙來自於陳柏謙的一篇短文，該詞彙指稱他所觀察早年與近年的口述文集，往往強調受難者中心的「苦難史」，而忽略了「苦難從何而來」的呈現，反而制約了我們對於白色恐怖的想法，落入國家暴力「沒來由的惡」的陷阱之中。參見陳柏謙：〈挖掘、拼湊歷史過程中遺忘「歷史」的陷阱——一個「白色恐怖」口述史入門工作者的自我意義探求〉，《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103 期（2016 年 6 月），頁 191-199。

本論文依據政治社會事件的發展分期，從文學史的研究視角，將研究劃分為三個階段（對應至二至四章）：1987 年的解嚴、2000 年的政黨輪替，以及 2010 年代學運世代的興起背景。本研究認為，在不同階段，由於外在形式的制約與限制不同，台灣文學在書寫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記憶時，所展現的抵抗對象及其策略並不相同。在這一脈絡下，對應至二至四章，本文提出以下三項問題：

- A. 解嚴以來，迎向了本土轉向的時代潮流，藉由回溯台灣苦難與悲情歷史，重塑抵抗外來政權的台灣主體性。在既有的反共框架以及新興的抵抗外部侵略者的框架形成之際，一前一後的夾擊，都不是一個有利於言說中共地下黨受難者的外在環境。來自於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白色恐怖的倖存者們，如何透過文學的形式，創造更多言說空間，以書寫中共地下黨的受難故事？
- B. 2000 年以後，是文學書寫者繼承九〇年代口述史奠基的「冤假錯」敘事結構的時刻，文學書寫者如何在作品中與這些「遺產」對話？又是如何透過文學獨特的「反敘事」策略，抵抗這種既定的主流敘事結構？
- C. 自 2010 年代學運世代興起以來，文化領域愈加重視「實用性」目的。新時代的類型化審美趨勢在大眾市場和實用性間權衡，旨在進入市場之際，並轉譯普及文史知識。然而，市場導向的類型化審美在呈現複雜歷史和人性時不可避免地妥協，這些敘事如何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記憶中留下空白？這種「留白」趨勢如何激化對立？文學如何回應這種對立？

綜上，本研究嘗試刻劃了台灣文學在不同階段中，抵抗集體記憶同質化的軌跡。以下，先進行前行研究回顧，而後論述本研究的研究方法。

第二節、前行研究回顧

因本文主要關注台灣文學作品對於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中共地下黨記憶的再現，在前行研究中與本文有關者，可以分為以下「史實派」與「詮釋派」二類回顧，即為「歷史性研究」與「敘事性研究」兩大研究取向。

另外，在正式回顧之前，先說明本文所採用的名詞如下。為求前後指稱明確與統一，本文以「**中共地下黨**」一詞統一指稱五〇年代涉關中共的白色恐怖政治

案件。從既有研究中，學者們指稱該歷史事件時所採用的名詞有所分歧，因其各自所關注的對象並不相同。舉凡「五〇年代左翼地下黨」、「1950年代左翼政治案件」、或泛稱「五〇年代政治案件」等，又或以組織或事件名稱稱之，諸如「省工委」、「省工委會」、「學委會」、「重整省工委」、「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台盟」、「鹿窟事件」等，皆有各自的考量。而本文為求指稱明確與前後一致，以「五〇年代中共地下黨」或僅簡稱「中共地下黨」專指稱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所牽涉的有關於省工委會、重整省工委會、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等政治案件。

一、歷史性研究的評述：關於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中共地下黨的政治案件

首先是關於歷史研究本身，這部分的研究已然具有一定成果。儘管本文並不從事歷史事實的研究，但對於這部分研究的重點回顧仍有助釐清本文所欲聚焦的對象，以及關注範圍的輪廓。回顧解嚴以前，身處於海外的學者王育德，於1964年出版的《台灣：苦悶するその歴史》是早期較具系統性的台灣史著作之一，書中即簡述戰後中共所派遣的蔡孝乾，以及於香港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謝雪紅二人於台灣指揮地下運動。¹⁵王育德作為經歷過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學者，得力於身處海外的條件，能夠在解嚴以前高壓的社會與政治條件限制之下，留下少數涉關五〇年代中共地下黨政治案件的簡述。

隨著解嚴與民主化的發展，投入相關研究的人數增加，檔案資料也漸趨公開。這些研究對於整理或挖掘史料、探索歷史事實具有相當大的貢獻，無論是聚焦於涉案人物、特定事件，或是整體勾勒中共地下黨政治案件的始末，都對釐清史實真相、發展脈絡有所建樹。然而，這些研究仍未能充分應對本文探討「記憶與記憶鬥爭」的視角與主題。以及在以下的回顧中，將對這類型的研究簡要評述，分為三個類型。

第一，是關於人物個案研究，例如歐素英對省工委李媽兜的研究，勾勒他自早年以來至戰後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過程，及其領導台南市工委會之發展與瓦解挫

¹⁵ 王育德：《台灣：苦悶するその歴史》（東京：弘文堂，1964），頁145-147。

敗等軌跡¹⁶；李淑君則聚焦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左翼地下黨有關的女性受難者——許金玉、張金爵、馮守娥、許月里，指出其由政治思考至社會行動的開展，與其女性身分與生命經驗密切相關，並從中勾勒出女性情誼與政治系譜的連結。¹⁷

第二，是以事件作為聚焦的研究。例如曾建元與曾薰慧在針對台灣大學戰後的政治事件研究中，也論及所屬省工委會的台大地下黨組織，由「學委會」所領導，並建置法學院、醫學院以及本部工學院三個支部的政治案件¹⁸；亦有對於台灣省工委之學委會組織、工作及其後續國民黨對其整肅的專論¹⁹；而薛月順則分析以陳本江為首的中共地下黨員建立山上鹿窟基地之始末，及其事件爆發之成因。

20

第三，是對於五〇年代年代中共地下黨政治案件始末與整體輪廓的勾勒。尤以林正慧勾勒較為全面的視角。她從《歷年辦理匪案彙編》中歸納涉案的中共組織，勾勒出左翼政治案件與台籍人士相關的主要情況。其中，以中共中央派遣蔡孝乾等人組建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為主，次要則是由謝雪紅在二二八事件後逃亡至香港成立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案件。林正慧試圖解釋省工委與台盟案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主要有以下三項的發現：她在少數與台盟相關的案件中發現，在謝雪紅逃往香港（1948）並赴北京（1949）這段短暫期間中，確實少數案件與謝雪紅之台盟有實際聯繫；而更多的案件中有兩種可能，其一是省工委組織運用謝雪紅之號召力，作為吸收成員的省工委外圍組織，實際與台盟無關，其二為黨國特務一向將台盟視作省工委之外圍組織，以羅織罪名。²¹經「保密局」破

¹⁶ 歐素瑛：〈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以李媽兜案為例〉，《台灣史研究》第 15 卷第 2 期（2008 年 6 月），頁 135-172。

¹⁷ 李淑君：〈一九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左翼女性政治受難者：女性身份、女性系譜、政治行動〉，《台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18 卷第 2 期（2021 年 12 月），頁 75-148。

¹⁸ 曾建元、曾薰慧：〈青春戰鬥曲：戰後國立台灣大學政治事件之研究（1945—1955）〉，《文化實踐與社會變遷》第 2 期（2017 年 6 月），頁 37-105。

¹⁹ 葉宗鑫：《戰後初期台灣省工委會學委會之研究（1946—1950）》，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年。

²⁰ 薛月順：〈溫萬金與鹿窟事件的爆發〉，《國史館館刊》第 77 期（2023 年 9 月），頁 1-43。

²¹ 林正慧，〈1950 年代左翼政治案件探討——以省工委會及台盟相關案件為中心〉，《台灣文獻》，第 60 卷第 1 期（2009 年），頁 395-478。

獲上層幹部後，省工委已於 1950 年間大幅瓦解；然而，「調查局」又於 1952 年間破獲代號「老洪」（陳福星）領導的「重整後台灣省工委」。林正慧又於另一篇近著中重新聚焦調查局破獲「重整台灣省工委會」案件的過程，及調查局採用的辦案方式與策略：從赤柯山水泥廠的案件起點，調查局建立了內部線人，成功滲透並打入組織內部，並促使部分成員自新自首，最終他們成功佈線逮捕了組織的領導人「老洪」。此外，林正慧也從史料中釐清「重整省委組織」的實際狀況，她認為：調查局將陳福星所領導的組織定調為「重整省工委」，實際上是通過「拉高層級」的方式來強化殘餘共產黨勢力的影響力；這可能是情治單位之間互相競爭的結果：調查局為了與保密局（負責偵破「省工委」的情治單位）競爭「戰績」，而採取的一種策略。²²

綜觀上述三類研究成果，本文欲指出其稍有不足之處。若採用楊孟軒的分析架構，將「過去的真相」分為「史實」與「史實的詮釋」二者²³，這些研究往往僅聚焦於前者的史料真相挖掘，而對於本論文所欲探討的後者——由「詮釋」所引起的「記憶與記憶的鬥爭」則有所不同。

此類研究並無法解答鑲嵌在後續文化與政治脈絡當中，彰顯或隱藏特定記憶所造就的變數。正如 MacMillan 認為，「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的型塑更關注「現在」而非「過去」，其目的在於重新定義當前的群體形象並確認其身份。²⁴換句話說，在解嚴後的台灣社會，如何選擇歷史材料，實則與當下所欲型塑的集體記憶形象，及所欲再造的群體認同有著密切的關聯性。僅關注於歷史事實本身，對於本文所欲探討的問題意識並無太大的意義。而若要更進一步地思考敘事當中彰顯／掩蓋的影響，社會學者的敘事性研究見解更能回應本文所關注的問題。

²² 林正慧：〈由「重整後台灣省工委會」案看調查局對自首自新份子之運用〉，《國史館館刊》，第 78 期（2023 年 12 月），頁 3-68。

²³ 楊孟軒：〈歷史記憶與記憶的歷史：創傷、情感、牽連性與和解〉，許家馨編，《歷史記憶的倫理》，頁 257-298。

²⁴ Margret MacMillan 著，鄭佩嵐譯：《歷史的運用與濫用》（台北：麥田，2018 年 11 月），頁 79。

二、敘事性研究的評述：五〇年代中共地下黨的敘事研究與相關檢討

除了歷史研究外，社會學者亦有關於「如何敘事」政治事件的相關檢討，這會是本文的回顧重點。相較於歷史研究，這方面的研究較少。以下，我將檢視相關研究成果，以批判性的觀點指出既有研究成果的不足之處，以利更進一步釐清本文欲探討的問題，並清晰呈現本文論證結構。

敘事性研究中，以林傳凱的研究具有開創性。林傳凱在口述或回憶錄的文本中發現不同時間點的版本歧異現象：於九〇年代現身的見證者所生產的口述史或回憶錄文本，卻在數十餘年後的版本對照之下，發現其「自我故事」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就前者而言，口述者往往以「冤假錯案」為其主軸（例如：不知為何入獄、無辜受牽連入獄、對政治無興趣或不理解等），而後者則始漸表露其參加中國共產黨及其地下工作的經驗；於是林傳凱思考這些敘事生產的時空背景，並指出影響其「說」與「不說」的四層因素，分別是：廣遠的文化層次、（九〇年代平反制度）制度化的層次、私人網路與親密關係層次。²⁵林傳凱的研究以受難者的口述史或回憶錄撰寫為對象，並透過版本分歧的現象思考「冤假錯」敘事生產的社會條件。最後，林也認為，自九〇年代以來，各種作品（如電影、音樂、畫展、小說、詩歌和散文）描述五〇年代白色恐怖，通常依賴於九〇年代的口述史或回憶錄，這導致後世對白色恐怖的想像被「冤假錯」敘事所限制。

林邑軒與林傳凱相似，卻稍有不同。他同樣從「省工委」的田野調查出發，所意識到的問題與林傳凱相似——皆涉及口述文本版本分歧的現象。他提問：「為何以『人的苦難經驗』為初衷的**發聲與記述**，最後，經常有意無意略去了受苦之外的其他經驗。」（頁6）林邑軒的解釋側重於外在「政治布局」對「知識生產」的影響：前者衍生後者，而後者的生產又反過來強化前者。他總結了三項「結構性視角的歷史——政治脈絡」觀點來解答上述問題，分別是：白色恐怖研究的反威權起源、現實政治力量的折衝，以及民族主義對歷史的民族化（台灣民族主義

²⁵ 林傳凱：〈「大眾傷痕」的「實」與「幻」——探索「1950年代白色恐怖『見證』」的版本歧異〉，《歷史台灣》第8期（2014年11月），頁35-81。

或中國民族主義史觀)的要求。²⁶與林傳凱從微觀分析視角不同，林邑軒的解釋則更為宏觀，嘗試將來自口述史文本的洞見推行至「以『人的苦難經驗』為初衷的發聲與記述」；換句話說，他的解釋嘗試涵蓋受難者自我故事以外的其他文本形式，就其說法而言，「文學」文本也涵蓋在內。

葉虹靈的研究則在上述基礎上，更是進一步思考「冤假錯」敘事在人權博物館的體制化過程。她提問：儘管歷史研究中已指出，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以牽涉中共地下黨運作的政治犯為大宗，但為何國家人權博物館仍以「冤假錯」敘事仍佔據了主聲道？她的解釋回到九〇年代的脈絡指出形塑民間敘事的兩股力量，其一為「補償制度」的作用下，使當年參與地下組織的運作者的敘事自我化約、自我修飾以迎合無辜受難者的形象，另一股力量為「本土意識濃烈」的文史工作者，他們選擇性地避重就輕，淡化省工委會組織的政治性質，在這兩股力量的作用下，「冤假錯」的敘事成為民間解釋白恐案件的主流，而後因博物館外包體制進入博物館之中，又因體制本身「路徑依賴」的特性，持續制約著後續歷史敘事的空間，使「冤假錯」的觀點壟斷博物館，成為敘事主軸。²⁷她也進一步地指出博物館敘事所產生的後續影響：生產於九〇年代年代的「冤假錯」敘事進入博物館後，不僅成為難以動搖的敘事主軸，也「使無辜敘事仍持續外溢到不同場域的歷史書寫中」(頁32)。

綜合來說，上述三篇研究者皆重視九〇年代口述或回憶文本，因為這些文本對於形塑當代「冤假錯」的「集體記憶」，以及制約後續其他領域「冤假錯」敘事的生產具有關鍵的作用。可以從既有的研究成果總結出一套「冤假錯」敘事建構的解釋模型：九〇年代後在社會條件限制下所產生的口述歷史，制約了後續對該段歷史的理解，使得「冤假錯」成為主流敘事，並在後續數十年間對其他領域(包括文學在內)的歷史書寫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然而這套解釋模型是否能

²⁶ 林邑軒：「第一章 導論」，《來自彼岸的紅色浪潮：從意義中介視角重構戰後初期「省工委」的地下革命行動》，台北：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頁6-11。

²⁷ 葉虹靈：〈台灣白色恐怖創傷記憶的體制化過程：歷史制度論觀點〉，《台灣社會學》第29期(2015年6月)，頁1-42。

套用在「台灣文學」的生產機制當中？顯然，這套解釋模型並未考慮到「台灣文學」生成機制的「叛逆性格」，也未能正視台灣文學具有抵抗主流敘事的傳統。



三、文學性研究的評述：台灣文學抵抗主流敘事的傳統

上述關注於「口述史」文本的研究成果，是否能理所當然地推行到其他文本類型（例如文學文本）的生產機制，其本身就存在著相當大的疑問。這類的解釋往往未考慮不同文本類型所受到外在條件侷限程度的差異性，或簡單地將文學文本視作外在政治布局的介入、既有史料制約的產物，但並非如此。

近年來，台灣文學研究者也開始從文學研究的角度進行探討。例如，李淑君解讀小說家顧玉玲的《餘地》。²⁸李淑君首先透過顧玉玲的訪談成果，提醒我們對於小說《餘地》兩項應有的認識：顧玉玲的寫作具有強烈地回應社會「當下」的意圖；以及，儘管是「虛構」文學，《餘地》卻是動用「她一生的田野」為基礎寫就。李淑君同樣意識到當下白色恐怖書寫陷入「本土史觀的獨派案件」與「社會主義思想的左翼案件」的對立，而後者又往往輕易地被貼上「左統」的負面標籤，李淑君透過分析《餘地》，指出「《餘地》呈現本土與左翼之間並沒有斷裂的台灣本土左翼史觀」（頁 237），「對顧玉玲來說，本土與左翼的斷裂從來沒有發生，是自身對台灣本土與左翼斷裂史觀的不滿」（頁 224）。²⁹李淑君不僅指出了被普遍認為具有「虛構」成分的文體形式中的事實基礎，她的研究還強調，台灣文學作品並非僅僅是既有文化制約的產物——在察覺到左翼政治案件被貼上負面標籤的情況下，顧玉玲的《餘地》嘗試縫補本土與左翼之間的斷裂與對立，即為這種實踐。

在台灣文學的書寫領域中，與顧玉玲類似的狀況並不少見。一般咸認為具有虛構色彩的「小說」，其本身往往對於「現實」或「歷史」的追尋有其執著，透過「小說」挑戰既有主流歷史認識、歷史詮釋的主聲道，在台灣文學史中可謂是

²⁸ 順帶一提，《餘地》作為入圍 2022 年台灣文學金典獎的作品，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關注。

²⁹ 李淑君：〈零餘地與間隙者：《餘地》的多重史觀與敘述〉，陳芷凡等人主編，《台灣文學的來世》（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3 年 11 月），頁 215-237。

一項常見的「傳統」³⁰，我們不宜將其簡單視作虛構文本看待，或簡單地從歷史視角中排除（當然，也不宜將其輕易地等同於歷史本身）。台灣文學的生產機制，並不總是外部政治佈局對於知識生產介入的產物，台灣文學的寫作更常反其道而行之，不論是過去台灣文學對於中國史觀收編的反抗，又或是李淑君此處所揭露的，《餘地》本身並不滿足於左翼白色恐怖案件的負面標籤皆為映證。簡而言之，從台灣文學史的角度而言，台灣文學書寫者往往不滿足於既定的成見與歷史詮釋的主聲道。

綜上所述，社會學的研究者已然從九〇年代口述史或回憶錄的研究，發現「冤假錯」的敘事大量出現，以及「冤假錯」敘事卻與後續的版本產生嚴重分歧的現象。不論是刻意的「策略」或「非意圖」的結果，究悉其敘事的隱匿／外顯之成因，社會學者們也各自提出其解釋。但這些解釋，在思考當代對於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中「冤假錯」的主流印象時，所提出的理解模型，多指出九〇年代的口述史或回憶錄制約後續數十年間其他領域的歷史書寫；又或者從巨觀角度解釋政治佈局介入對於知識生產者的影響。我並不打算否定這些既有研究所獲得的洞見。然而，這樣的說法並沒有正視「台灣文學」發展脈絡的特殊性，以及「文學」作為文本形式所具有反抗既有主流認知的能力。本文並不打算簡單地將台灣文學文本（尤其是歷史小說）視作外在政治布局的介入底下的產物。相反地，台灣文學中慣有的「叛逆」性格，更是「抵抗」外在政治部局介入的一股力量。於是我們不免提問：倘若我們想更理解五〇白色恐怖的敘事及其對於當代集體記憶的形塑過程，台灣文學是否真的能夠滿足於上述的解釋模型？倘若不能，那麼，台灣文學文本作為「記憶領域」（以下說明）的一環，又是以何種姿態介入集體記憶的形塑？

³⁰ 舉例而言，早在楊逵的年代裡，即有以下的創作表述：「台灣有 1896 年所制定的六三法，台灣總督府跟明治憲法毫無關係地可以單獨發出具有法律效率的命令。基於這六三法，擬定嚴峻的〈匪賊刑罰令〉；簡言之，組成結社團體對日本統治申辯有異議的人，以自由心證當作叛亂罪皆處以死刑的法令。總之，我讀了《台灣匪誌》產生了很大的疑問，**為了糾正被歪曲的歷史，希望透過小說寫出真相**。（粗體為我所加，表示強調）」引自戴國輝、內村剛介訪問，葉石濤譯，〈一個台灣作家的 77 年〉，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 第十四卷·資料卷》（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 年），頁 246。原刊《台灣時報》，1983 年 3 月 2-3 日。

以下，本文嘗試提出並解決的問題：本文依據政治與社會條件，將解嚴後的台灣社會劃分為三個文學階段；不同時期所書寫的文學文本，將因書寫者為所身處時代的感覺結構不同（來自於當下政治氛圍的形塑）而呈現不同的面貌；但共通點在於，文學抵抗了「同質化」的集體記憶，反而乘載了一股「複雜化」歷史的艱難使命。我將試圖指出文學作為「反記憶」的一股力量，並將此論點建立在本論文的實證研究結果之上。於是，該視角提供給我們觀看「記憶與記憶鬥爭」的文學史研究視角，文學作為複雜化歷史認識的一股力量，對於當代轉型正義議程的啟示，除了揭示記憶本身的社會建構意義之外，同時也揭露台灣文學具有同理框架以外生命的潛能，化解記憶板塊對立的僵局。

第三節、研究理論與研究方法

承續上節所論，本文涉及集體記憶理論、記憶領域、感覺結構與反記憶等概念，而文學在其中扮演何種角色，又是如何抵抗「同質化」和促進歷史認識複雜化的作用？本節將從集體記憶理論切入，並借用「記憶的歷史」的概念作為劃分文學階段的理論視角。以下依序說明本論文採取的理論之概念界定與研究方法。

一、「集體記憶」與「記憶領域」（兼論研究範圍）

一般而言，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的概念被認為由 M. Halbwachs 提出，作為 Durkheim 的學生，「集體記憶」這個術語本身即含有 Durkheim 集體意識（conscience collective）的概念，Halbwachs 認為集體記憶不僅僅是指個體記憶的總和，而是一個社會框架（social frameworks）下的文化遺產，反映了群體對過去的共同理解和意義；Halbwachs 凸顯了個體記憶與社會框架之間的相互作用，指出即使最初是由個人構建的記憶，也是在社會框架下被塑造。³¹

法國歷史學者 Pierre Nora，在 Halbwachs 的基礎上持續推演集體記憶的概念，他在歷史中尋找法國國家認同的建構線索中，提出了「記憶領域」（Lieux de

³¹ Olick, Jeffrey K. *The politics of regret: On collective memory and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Routledge, 2013. Pp. 5-7.

mémoire) 的概念。他首先透過與「歷史」的對照，勾勒「記憶」的意涵：「記憶」受遺忘的辯證所影響，可能無意識地 (unconscious) 被扭曲，或以各種形式被占據或操控；記憶也是有選擇性地只接納適合它的事實，並容易受到轉移、審查與情感投射等作用；相對而言，歷史是對於不再存在事物的重建，對 Nora 而言，歷史則更是一種智力的 (intellectual)、非宗教的 (nonreligious) 的活動，需要分析和批判的論述³²。

他認為，當代的記憶並非「自發記憶」(spontaneous memory)，而是被視為一種來自外在的「義務」。現代記憶大量的外部檔案存儲，使得記憶被歷史化。參與其中的人，從過去的主要來源 (例如大家族、教會、國家) 到現代成為每一個人的責任，如同施加了「必須記住的義務」，並在這種記憶中成為個人屬於特定群體、展現身分的根源。於是「記憶領域」(Lieux de mémoire) 因而產生，正因為自發記憶的失落，所以我們必須建立記憶領域，包括歌曲、文學、檔案、紀念碑，組織慶典活動、宣讀悼詞等，不斷地提醒著我們記住的義務，召喚我們集體身分的圖騰，與共同群體的意識。³³ 在某種意義上，Nora 的集體記憶理論揭露了現代國家如何透過「記憶領域」的佈局而建構民族群體的概念；而此過程的揭露，正如同 Lawrence D. Kritzman 在 *Realms of Memory* 書序中所說，該書喚起了法國內部的象徵性分歧，揭示出「法蘭西」概念是如何基於記憶的想像建構；而 Nora 等人也暗示一種新的批評模式：國家如何透過重組 (rearrange) 「記憶領域」的邏輯，重新發現 (rediscover) 其身分的方式。³⁴

本文採用集體記憶的概念，指出記憶本身的社會建構特性；同時也採用記憶領域的視角，將文學納入集體記憶建構的視角當中。因此，本文將廣泛採用台灣文學的研究材料，諸如第二章的《台灣男子簡阿淘》、《番薯仔哀歌》，以及第三

³² 事實上 Nora 對於記憶與歷史的區分並不令人滿意，相對於記憶而言，他的說法預設了某種得以全然客觀觀看歷史的方式存在。然而本處因著重於 Nora 對於「集體記憶」的論點，因此對此不詳加反駁。

³³ Nora, Pierre. "General introduction: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Realms of memory: rethinking the French past* 1 (1996): 1-20.

³⁴ Kritzman, Lawrence D. "In Remembrance of Things French" *Realms of memory: rethinking the French past* 1 (1996): IX-XIV.

章中《藤纏樹》、《海神家族》、《朝顏時光》，以及第四章中《台北城裡妖魔跋扈》、《餘地》等，也兼採（同樣作為記憶領域範疇的）歷史書寫、電影、報紙、報導文學作為輔助材料，如第四章中所採用的《返校》電影、《流麻溝十五號》與《春天》等，皆在記憶領域的範疇中一併納入研究材料當中。

針對所選用的文本之研究範圍進一步地說明如下。

從上述選用的文本可知，本文特別著重於「小說」的文體形式。之所以會側重「小說」的文體形式，是來自 Natalie Zemon Davis 研究的啟發。在 Devis 的研究中，她探討十六世紀法國以底層人民為中心集體創作的「赦免狀」，分析底層人民如何運用敘事策略來說服君王和法院批准赦免。為求赦免成功，「赦免狀」是經由人為修飾(artifice)與潤色，並運用說故事的技巧呈現有利於自己的陳述，以期贏得赦罪。³⁵Devis 研究赦免狀的敘事技巧，並將赦免狀與文學小說、私人日記等其他文體比較，固然，赦免狀使用了許多文學小說的技法，但這兩者間終究存在著本質上的區別——它們不必尋求君王的赦免，因此對於事件的紀錄，不必受制於呈現對求救者有利的陳述。³⁶上述的概念，提醒我各文體所預設的目的、對象有所不同，對於事件的呈現所欲掩蓋／彰顯的敘事結構則相不一致，而「小說」相較於其他文體而言，更具備自由言說的有利條件。本論文在探討中共地下黨時，既有的研究著重於口述史、回憶錄，這些文本可能具有爭取補償的意圖；然而，台灣文學當中的「小說」並無這樣的意圖，且小說橫跨在虛／實間所創造的曖昧距離，反而為其開拓更多的言說空間，藉此創作出有別於主流的敘事結構。基於上述原因，本文特別著重於「小說」文體的分析。

至於關於為何選擇「這些」文本而非「其他」文本的問題。由於白色恐怖相關文學作品數量眾多，且橫跨不同時代與多樣的案件，因此本文選擇的標準是聚焦於書寫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中共地下黨案件為主題，且「在文本中明確提及」

³⁵ Natalie Zemon Davis 著，楊逸鴻譯：《檔案中的虛構：十六世紀法國司法檔案中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敘述者》，台北：麥田出版，2001 年 11 月。Natalie Zemon Davis. *Fiction in the archives: Pardon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³⁶ 例如 1556 年里昂的一位布商在私人日記中記錄的一場狂歡節遊戲中的意外暴力事件。詳見《檔案中的虛構》，頁 92-93。

中共地下黨（例如省工委、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等）。因此，像郭松棻的〈月印〉、陳映真的〈山路〉等，儘管是白恐小說的經典之作，但不符合本文研究範疇的選定標準，故未納入研究範圍。



二、「記憶的歷史」作為方法

Nora 對於「記憶領域」的解讀，提供給本論文基本的切入點。而若要進一步理解台灣的狀況，「記憶領域」作為象徵符號的競爭場所可能更貼近於實際狀況。

汪宏倫指出東亞的戰爭及戰爭遺緒所製造出的「認識框架」，仍持續性地影響當代東亞的「歷史認識」(history perception)，即如何詮釋戰爭、記憶歷史。因此，他認為「戰爭從未結束，只是從軍事場域進入到符號象徵場域」(頁 7)。³⁷不同的歷史認識框架也造就了當前台灣集體記憶典範的分歧——他進一步地指出，當前台灣具有兩種既「不可共量」也「不可共存」的記憶典範。³⁸不同記憶典範間互不相容的特徵，及其彼此爭奪與競爭的關係，造成當代轉型正義推動的困境。

楊孟軒提出「記憶的歷史」的研究方法，試圖回應當下轉型正義所遇到的困境。他將「過去的真相」區分為「歷史事實」與「歷史詮釋」二部份，並聚焦在後者，他發現：台灣由於重層殖民複雜的歷史，加上民主社會多元認同文化的價值，產生了對過去歷史多元的詮釋與想像。儘管圍繞著相同的歷史事實，但不同的詮釋卻形成了「各自的邏輯與道德框架」(頁 264)，而當不同「記憶群體」(mnemonic community) 產生衝突的時候（例如特定群體所珍視的歷史敘事，變成另一群體苦難的源頭），彼此的怨恨與負面情緒則無益於轉型正義的歷史工作的進行。於是，楊孟軒提出「記憶的歷史」作為方法，此方法關注特定「歷史記憶論述」作為集體性的歷史詮釋，及圍繞此論述／詮釋的「記憶群體」(mnemonic

³⁷ 汪宏倫：〈東亞的戰爭之框與國族問題：對日本、中國、台灣的考察〉，汪宏倫主編，《戰爭與社會》(台北：聯經，2014年7月)，頁 159-225。

³⁸ 汪宏倫：〈我們能和解共生嗎？：反思台灣的轉型正義與集體記憶〉，《思想》第 42 期(2021年4月)，頁 1-61。

community)，在歷史上的生成與演變，並注重不同記憶論述與其相對社群在歷史時空中的互動（頁 259、268）。他說：

明明是選擇的、建構的，甚至有時候完全虛構的歷史記憶，但是為何總有這麼多人特定的情況和時空下對這個記憶如此強烈的情感投射、虔誠膜拜、堅信不移；又在事過境遷後，在另一個歷史時期，對同樣的東西棄之敝屣，感到索然無味，轉身相信和關注其他東西，或對這記憶中其他之前未注意到的部份給予關注。（頁 269）

而所採用的研究材料並非歷史事件的材料本身，是「關於歷史事件的想像、論述、再呈現，包括小說、電影、連續劇、網誌、YouTube 影片、紀念碑、紀念館的歷史探討」（頁 271），其實也呼應上述 Nora 記憶領域的理論視角。楊孟軒認為，透過理解特定記憶詮釋／論述對應的記憶群體的形成，有助於開展同理不同記憶群體的可能性，也有助於回應台灣轉型正義無法建立共同集體記憶的困境。³⁹而楊孟軒「記憶的歷史」方法，可以視作他在《逃離中國》一書方法的延伸。他在書中講述「外省人」緣於回應「社會創傷」（social trauma）而投入三波「受歷史與文化制約」的「記憶體系」（mnemonic regime）的生產熱潮，時間橫跨從 1950 年代至 1990 年代台灣民主化以後，這三波分別對應到「戰時過客」、「文化鄉愁」與「講述大出走」三個階段。⁴⁰

本論文所採取之結構與楊孟軒相似的路徑，卻也有所不同，以下依次說明其相似與不同之處。

相似之處，本論文借用「記憶的歷史」概念，強調特定記憶論述在歷史過程中的動態變化，需鑲嵌於該段歷史脈絡中，以理解這些記憶論述的生產。因此，在後續的論述中，除了揭示各階段記憶論述的動態變化之外，本論文亦會將台灣文學中的記憶生產，鑲嵌於該段歷史脈絡中一併解讀。基於上述理由，本論文闡述了三波由外在政治與社會條件引發的記憶生產熱潮，這三波熱潮對應幾個關鍵

³⁹ 楊孟軒：〈歷史記憶與記憶的歷史：創傷、情感、牽連性與和解〉，許家馨編，《歷史記憶的倫理》，頁 257-298。

⁴⁰ 楊孟軒：《逃離中國：現代台灣的創傷、記憶與認同》（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23 年 1 月），頁 37。

的社會與政治事件，分別是 1987 年的解嚴、2000 年的政黨輪替及 2010 年代的學運世代。這些社會政治事件在台灣文學中引發了關於五〇年代中共地下黨的記憶生產熱潮，在不同的文學階段呈現出各自的集體趨勢。這將在本論文的第二章至第四章中分別論證。

至於相異之處，有必要釐清說明如下。

第一，楊孟軒關注「記憶群體」的生成與演變，以及「記憶群體」與特定記憶論述的互動關係，但「記憶群體」的概念並不全然適用於本文之論題。有別於外省群體投入自身記憶體系的生產，五〇年代中共地下黨之受難者不能單純以「群體」的角度看待。一方面，中共受難者往往因為刑訊受難而斷絕、或不願承認其身分，因此其「群體」邊界不明確；另一方面，中共地下黨受難者的記憶生產也未必來自其「群體」自身，許多時候是置於更大脈絡的「白色恐怖」框架中，作為「白色恐怖」記憶生產的一環，因而衍伸出上述葉虹靈所謂「本土意識濃厚」的文史工作者淡化五〇年代受難者「中共」身分的問題。因此，與其說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中共受難者作為「記憶群體」生產自身的記憶，不如說這段記憶作為更居某種特殊的「主流位置」⁴¹的白色恐怖敘事之一部分，在各個社會階段受控於政治、社會的現實需求被「使用」與「改編」。因此，不宜單純以「群體」概念視之。

第二，楊孟軒的外省族群研究中，三個階段的記憶熱潮生產，是受外在歷史與文化所制約；但本文以台灣文學作為主要觀察對象，更欲強調台灣文學的「叛逆性格」，時常以「反記憶」、「反歷史與文化制約」的形式與當下主流記憶典範、敘事結構對話／抗出現。本文藉由三個文學階段的論述，指出台灣文學書寫者具有反抗「白色恐怖」記憶內部「同質化」的傾向，產生三波複雜化歷史、複雜化白色恐怖記憶本身的書寫行動。

綜上所述，本文借用「記憶的歷史」理論概念中所揭示的，特定記憶論述鑲嵌在歷史過程中的動態變化關係，但並不以特定「群體」的概念關注中共受難者

⁴¹ 此處的「主流」是要被打上引號的。因為通常講「主流」一詞，會有壓抑其它發聲形式的負面聯想，但本處並不欲使讀者產生這方面的聯想。本處想強調白色恐怖內部異質性高，不同政治案件類型所受關注的程度有別，所謂的「主流」是「相對性」的概念，不可忘記這些白色恐怖記憶相較於國民黨威權統治的記憶而言，都處於弱勢，皆需要被聽見、被訴說、被強調。

記憶的生產，而是以「台灣文學」為主要的觀察範疇，並指出台灣文學具有的「反歷史與文化制約」的生產機制，作為抵抗外在主流制約、複雜化白色恐怖記憶的一股力量。



三、台灣文學作為「反記憶」的力量

歷史學者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提出「複線歷史」(bifurcated history) 的觀點，藉此拆解現代民族國家「線性歷史」中的看似單純的話語，揭示其背後實際上是基於當下需求而對過去意義的利用。來自於傅柯 (Michel Foucault) 「反記憶」(counter-memory) 概念的運用，杜贊奇將歷史視作為兼具「散失」與「傳承」的複線運動，而佔優勢的話語時常壓抑同時代其他競爭者的聲音；而他認為，該概念同時也應用至那些具「變動」與「爭議」的身份認同起源敘事，因為當下具優勢的身分群體，容易在敘事其起源的歷史敘事當中，壓抑其他或掩蓋其他身份。杜贊奇複線歷史的觀點，透過尋找有別於主流歷史之外的「反記憶」，嘗試拆解了現代民族國家線性史觀的結構，並批判其內部民族統一性與純潔性的訴求。⁴²

不僅止於民族國家的歷史具有「統一性與純潔性」的訴求，「集體記憶」內部本身也具有同質化、消解異物的傾向。如同前述 Nora 所表明「集體記憶」本身的「選擇性」特質；或如同與「集體記憶」密切相關的「紀念活動」的研究中，指出該種活動往往迴避模糊性，並從單一的角度（從屬於特定群體的詮釋框架）來呈現過去，如同「神殿」(temple) 一般的同質化隱喻⁴³；又或如小坂井敏晶所揭示，當集體記憶既存世界觀與「異物」衝突，伴隨「無意識」的扭曲、改造、

⁴² 杜贊奇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2月），頁39-72。

⁴³ James V. Wertsch 將集體記憶與歷史的分析區分為一張簡明的表格，十分具有啟示性。Wertsch 以「神殿」隱喻集體記憶；相對而言，他以「論壇」(forum) 隱喻歷史，這意味著歷史相對於集體記憶而言，更具批判性與反思性的立場。詳見 James V. Wertsch. *Voices of collective remember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42-44.

主動統合的社會心理過程等⁴⁴。綜合上述理論所獲悉的洞見，集體記憶伴隨著內部的「同質化」、消解「異物」傾向。

「台灣文學」能夠作為反記憶的力量，源自於「文學」與「台灣文學」二項的特殊性。就「文學」而言，社會學中的敘事研究已然指明，文學的敘事能以獨特的企圖和創意呈現，用「反敘事」的方法打破人們的既有認知⁴⁵，這反映出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的「文學」，具有打破人們既定認知形式的潛力。就「台灣文學」的角度而言，由於台灣重層殖民的歷史，台灣文學的書寫實踐，往往成為作家們關懷邊緣群體、批判權力運作與不平等結構的場域。正如陳芳明在《台灣新文學史》中所言：「從一九二〇年代發軔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先天就帶有強烈的抵抗與批判，而且也與生俱來就是要追求自主與開放」⁴⁶，台灣文學中「先天」帶有這種抵抗與批判的「叛逆性格」，本文透過「反記憶」的理論概念將其具體化⁴⁷。在觀察台灣文學如何書寫白色恐怖五〇年代的中共地下黨的主題上，本文認為：台灣文學作家將書寫視為一種「反記憶」的行動，這種行動反映了台灣文學「反歷史與文化制約」的特質——他們不僅不滿足於當下趨向「同質化」的集體記憶或歷史詮釋，而且以書寫作為複雜化歷史與集體記憶一次又一次的實踐過程。

本文透過重新挖掘台灣文學當中的反記憶／反敘事元素，作為促進異質記憶群體間彼此理解、包容的社會意義。Richard Delgado 的論文認為「反敘事」能夠速使對立群體間相互包容與理解的積極性意義。Delgado 指出，邊緣群體通過講述自己的故事，不僅可以實現心理自我保護，還能減少自身的從屬地位；也可以打破社會的自滿，並促進對種族和階級不平等的理解。Delgado 分析了「主流敘

⁴⁴ 小坂井敏晶：《增補民族という虚構》（東京：筑摩書房，2011），頁 146-147。

⁴⁵ 蕭阿勤：〈敘事分析〉，瞿海源、畢恆達、劉長萱、楊國樞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質性研究法》（台北：東華書局，2015 年 5 月），頁 165。

⁴⁶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上）》（台北：聯經，2020 年 10 月），頁 6。

⁴⁷ 這種概念的應用，在台灣文學研究中已有前例。例如劉亮雅以李昂《鴛鴦春膳》和吳明益《睡眠的航線》文本為觀察，說明該文本的「反記憶」以對日治時期重新的記憶，轉化為以日治時期文化的多元混雜，作為台灣認同的基礎。參見劉亮雅：〈近期小說對日治時期的重新記憶：以《鴛鴦春膳》與《睡眠的航線》中的反記憶、認同與混雜為例〉，《清華學報》第 45 卷第 3 期（2015 年 9 月），頁 457-486。

事」如何合理化現狀，並通過具體案例展示了不同敘事的影響，以及「反敘事」如何動搖主導群體的自滿，引導讀者重新評估自己的世界觀。因此，反敘事在挑戰現狀和促進多元社會具有積極的作用。⁴⁸借用上述觀點，在記憶異質與分歧的白色恐怖場域中，雖然「反敘事」並非直接產自邊緣群體（中共地下黨受難者）自身，文學書寫者卻透過「反敘事」的實踐，挑戰主流敘事的框架。他們不滿足於既定的世界觀，並不斷跨越邊界，探索那些非主流者被埋沒的聲音，尋求兼容、包容與同理的可能性。

此外，本文對於「真實」的研究立場是：應避免陷入特定觀看歷史敘事的「真實幻覺」。杜贊奇已然提醒我們任何歷史敘事都受到書寫者所欲「凸顯」與「掩蓋」的變數所影響。書寫者想要「凸顯」什麼、「淡化」什麼，與書寫者的意圖、身處的社會條件有著密切的關聯性。另外，對於「歷史主義」較為激進的反駁者，例如大森莊藏，也透過應用康德的「物自身」概念至歷史事實的反省後，進一步地否定了康德的立場，他認為「過去自身」僅是一種「錯覺」；而小坂井敏晶則認為，就算「過去物自身」存在，我們也找不到任何一種方法可以看到其「真實」的樣貌。⁴⁹因此，本文所關注的是文學在三個階段中，關注其共同的敘事現象（但這並不代表以所選用的書寫者具有全然客觀、逼進歷史事實的立場），各階段之所以會產生共同的（反）敘事現象，與各階段書寫者所身處的社會外在條件限制有關，而台灣文學書寫者則透過書寫行動回應外在的社會條件限制（也就是前述的「反歷史與文化制約」）。值得回應的是，本章卷首借用了林傳凱所指出「當代與當代」「再現機制」競逐關係的闡述，而林傳凱認為我們應秉棄無辜與烈士敘事的二元對立，從而「逼進」歷史真實的研究曲徑⁵⁰；但正如上述所提供的理由，本文並不欲從事何種敘事較「逼進」歷史真實的研究工作，而是觀察各個時期的「敘事現象」。

⁴⁸ Delgado, R. (1989). Storytelling for oppositionists and others: A plea for narrative. *Michigan law review*, 87(8), 2411-2441.

⁴⁹ 小坂井敏晶：《增補民族という虚構》，頁 165。

⁵⁰ 林傳凱：〈「白色恐怖」中的女性政治犯——重思「歷史真實」與「再現」的政治〉，《性別平等教育月刊》第 101 期（2023 年 6 月），頁 16-29。

四、中共受難者作為台灣「歷史認識」的特殊位置

既然本文試圖說明文學作為「反歷史與文化制約」的特點，究竟是反抗何種制約仍須有具體化的分析框架。此處我將借重汪宏倫的框架分析對此展開論述。汪宏倫借用 Judith Butler 「戰爭之框」(frames of war) 之名與「可哀悼性」(grievability) 劃分框架內／外的概念⁵¹，以及 Erving Goffman 「框架分析」、「識框」(cognitive frame) 之社會學理論，重新賦予其所謂「戰爭之框」兩層涵義，包括：「戰爭所創造出來的結構框架」以及「戰爭的認知框架」(頁 163)，透過該種「認知框架」引導我們詮釋與記憶戰爭。在此基礎上，他將台灣劃分為「三個」所謂「多重交錯、矛盾互斥的戰爭之框」，這些框架存在著相互矛盾、相互轉化的弔詭關係⁵²，而這項劃定的理論性嘗試，有助於本論文分析五〇年代中共受難者作為台灣「歷史認識」特殊位置，以及理解不同時期書寫者，寫作當下與主流框架的對抗對象。

根據汪宏倫的分析，台灣具有的「戰爭之框」為：(破碎的)「大東亞戰爭之框」、「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之框」、「『反抗外來政權』與『反侵略／併吞』的戰爭之框」三者，本文所關照的五〇年代中共受難者的書寫，涉及到後二框架彼此間在象徵領域的爭奪，以下就二者進行說明。⁵³首先，就第二框架而言，所代表者為國民黨撤退來台的戰爭詮釋框架，該框架以「國共內戰」的框架合理化在台

⁵¹ 汪借用 Butler 對於「生命」在戰爭框架下所引發的思考。Butler 認為我們對於生命的規範運作，進而使框架內外對「肯認」(recognition) 形成差別分配。Butler 認為，因為生命本身是「危脆的」(precarious)，因此「可哀悼性」(grievability) 是重視生命的「前提」(presupposition)。該研究顯然是 Butler 延續其前著《危脆生命》(*Precarious Life*) 的思考軌跡。參見 Judith Butler. *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 Verso Books, 2009. 部分中譯術語參考 Judith Butler 著，申昫晏譯：《戰爭的框架》(台北：麥田，2022 年 1 月)。但此處汪宏倫「戰爭之框」的蓋念顯然已不同於 Butler 的概念。

⁵² 汪宏倫：〈東亞的戰爭之框與國族問題：對日本、中國、台灣的考察〉，汪宏倫主編，《戰爭與社會》，頁 159-225。

⁵³ 至於第一個框架，正如同汪宏倫論文中自言，該框架「在台灣並非主流」(頁 201)，「台灣所留下的大東亞戰爭之框，並不具有現實的實踐意涵，而主要是對於過去的記憶與詮釋」(頁 199)，並對日後「反抗中國」的戰爭之框形成有所幫助；該框架也與本文所論並不太大關聯，因此簡述於此，暫且不加入討論。

統治威權的正當性，而本文所論之白色恐怖之中共地下黨人，理所當然地直接成為其所欲「消滅」的對象；其次，就第三框架而言，如同汪文所指出，該框架為伴隨九〇年代後隨著台灣民主化產生，著眼於台灣長久的外來政權（包括國民黨），以及中共威脅應運而生，既承襲並轉化過去國民黨「反共、仇中」的框架，又予以重新定調的「反抗外來政權」與「反侵略／併吞」的戰爭之框。在此脈絡之下，「二二八」、「白色恐怖」等歷史事件成為推翻國民黨統治正當性的事件。於是，從上述框架分析的基礎上可以發現，「受難者」受到的平反與紀念，作為推翻國民黨統治正當性的行動，然而「中共」的敏感身分，又弔詭地嫁接到「反共、仇中」的既有結構，似乎在此間發現了一個既不屬於任何框架、「不可哀悼」的生命主體，而此主體在「雙重排除」之下，成為雙重弱勢的「零餘主體」，在歷史詮釋當中受到各種外力的被迫消音、收編、隱匿與改造，而這項結構的分析，也多少呼應到上述林傳凱的微觀分析或林邑軒的巨觀分析。

本文認為，「歷史與文化制約」形成的外在框架，將書寫置於特定的「感覺結構」（structures of feeling）之中，進而驅使書寫者形成某種「反歷史與文化制約」的集體趨勢。「感覺結構」這一概念源自 Raymond Williams，他關注某些社會慣例的可接受性，並質疑 Gramsci 的「霸權」（hegemony）概念。Williams 認為，「霸權」作為特定時代或地點的主流思維不可能完全實現，因為內在動力必然會促使新思想形式出現；感覺結構指的是同時代下出現的不同思維方式。⁵⁴ 本文根據政治事件劃分出三個不同階段，各階段的書寫者受感覺結構影響，並在文化作品中反映出不同於慣例或霸權的書寫內涵。將在下節當中，簡述各章所劃分的時代意義，以及採用的文本材料與各章的主要內涵。

總結而言，本文關注解嚴前後以來，再現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中共地下黨有關之政治案件的文學文本，「記憶領域」作為象徵符號的競爭場域，文學總是挑戰著主流的集體記憶、歷史詮釋。我將嘗試分為三個階段討論，以「記憶的歷史」為研究方法，勾勒三個階段文學如何以書寫行動，抵抗外在的主流結構，展現出「反記憶」、「反歷史與文化制約」的特質。本論文試圖勾勒這三個階段文學與主流歷史記憶拮抗的軌跡：這樣的軌跡需正視兩股力道間彼此的衝突與拉扯，本文

⁵⁴ Ian Buchanan. *A dictionary of critical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電子書頁數 1241。

將正視文學文本作為複雜化歷史的艱難任務，具有不滿足於現狀的「叛逆性格」。最終，台灣文學的這項使命，將有助於回應當前台灣轉型正義議程所面臨記憶板塊衝突困局⁵⁵的一項研究視角的努力——指認台灣文學透過不斷複雜化歷史、突破既有的歷史詮釋框架、探索遺落在主流記憶板塊之外的零餘主體，台灣文學實有助於同理框架以外的生命，並打破對立的僵局可能。而文學作為複雜化歷史的書寫行動，也呼應近年國際轉型正義理論中對於「文化領域」更顯著重的一項國際趨勢⁵⁶——因為藝術，具有複雜化觀看者對於歷史、正義／不正義的思考的巨大潛力。

⁵⁵ 許家馨在其主編的《歷史記憶的倫理》一書導論中指出，「對話」仍是「轉型正義」核心工作，而「對話」的是為了解決歷史記憶的典範衝突。詳見許家馨：〈導論：從轉型正義的反思到歷史記憶的倫理〉，《歷史記憶的倫理：從轉型正義到超克過去》，許家馨編，《歷史記憶的倫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24年3月），頁22。

⁵⁶ 例如 Micheal Newman 認為，「文化領域在理解正義和不正義方面提供了豐富的資源，通過展示正義、不正義和轉變的多重層面，文化領域確實可以豐富轉型正義的內涵。因此，國內和國際當局促進藝術努力將是有益的」，但轉型正義不應以「工具主義」的形式使用或控制藝術來推動特定敘事，轉型正義納入官方或制度或的機制中應避免類似的危險性。Michael Newman. *Transitional Justice: Contending with the Past*. John Wiley & Sons, 2019.

第二章

倖存者的證言（1987-2000）：見證文學的寫實層面



縱令他們的主張和理論有些是歷史的謬誤，但是他們為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的解放所做的打拚和犧牲，乃構成了台灣民眾抗議活動的重要部分。

——葉石濤《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

這段文字來自 1991 年 9 月出版的《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⁵⁷。在書中，葉石濤回憶起五〇年代那些因政治因素而被捕的難友，試圖向世人傳達他們應得的認可與尊重。若細想，葉石濤的語句間似乎隱含著某種焦慮，在解嚴後初期，這個民主化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裡，這句話已然預設了人們明瞭「抗議活動」的價值所在。然而葉石濤這番話語間，似乎暗示了某些人被遺忘，或基於某些主張的「謬誤」而被刻意排除在肯認的範圍之外。因此，他試圖透過這段文字重新向世人傳達這些被忽略者的重要性。那麼，葉石濤究竟意識到什麼？「他們」又是誰？而他的焦慮又是從何而來？

九〇年代，是重塑台灣主體性的時刻，而悲情的歷史是良好的資源。這也反映在文學史的發展趨勢。八〇年代以後，隨著言論自由的擴大，一些具有歷史使命感的作家，趁機開拓歷史小的書寫領域，他們將寫作題材擴展至四〇、五〇年代的政治環境，揭發政治迫害的現實，甚至出現了直書政治犯獄中生活的作品。

⁵⁷ 早在 1990 年前衛出版的《台灣男子簡阿淘》中，即附有「〈代序言〉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為本篇的前身。內容有些微更改，1991 年的版本更完整，因此選用 1991 年版。

⁵⁸本該是一個言說自身受難經驗的時刻，然而葉石濤意識到，五〇年代「中共地下黨」的記憶，似乎與當下作為外在侵略者的「中共」有所重疊。他的焦慮源於一個不利於表達自身記憶、充滿矛盾的外在環境。無論是戒嚴時期以來的「國共內戰」官方框架，還是九〇年代前後興起的以台灣為主體的「反侵略／併吞」框架，都未能為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記憶的陳述提供充分的空間。

在本章中，將會指出此時期來自於五〇年代的倖存者們，如何回應外在與自身的矛盾與掙扎，以及他們如何透過「自傳小說」的文體，巧妙地開創言說空間，即為本章所謂倖存者見證文學獨特的寫實層面。

本章關注的是：五〇年代中共地下黨受難者的形象在早期文本中的再現與演繹。作為記憶領域的一環，我想提問，解嚴後初期文學是如何介入集體記憶的形塑？透過觀察葉石濤與蔡德本於此一時期的文學活動，試圖回應上述的提問。本章所討論的文學文本，前者為〈紅鞋子〉、〈鹿窟哀歌〉、〈約談〉三篇短篇小說，發表於 1988 至 1989 年間，後二篇收錄於 1990 年出版的《台灣男子簡阿陶》⁵⁹中；後者為蔡德本的長篇小說《番薯仔哀歌》，出版於 1995 年。可以發現此一時期的書寫者同時具備了「倖存者」的身分，皆在五〇年代擁有牢獄經驗，且不約而同地採用「自傳小說」的文體，這樣的共通點值得留意。「自傳小說」意味著文學文本相當程度地表述了作者自身的經驗，卻同時得益於「小說」文體的特性使然——與現實指涉之間微妙曖昧的關係，反而為書寫者創造出更自由的言說空間⁶⁰，可更靈活地擺脫了當事者私人與親密關係網路的條件限制；同時，不同於

⁵⁸ 葉石濤著；原島利郎、澤井律之日譯本註解；彭萱漢譯：《台灣文學史綱（日譯註解版）》（高雄：春暉，2010 年 7 月），頁 250-251。

⁵⁹ 葉石濤：《台灣男子簡阿陶》，台北：前衛，1990 年 5 月初版第一刷。而〈紅鞋子〉收錄於 1989 年自立出版的《紅鞋子》中，後續也收錄至 1996 年由草根出版的《台灣男子簡阿陶》中。由於兩版本的《台灣男子簡阿陶》所收錄的文本不同，因此在以下論證過程中可能交錯引用，但會標明出版年以利於區分。

⁶⁰ 不論是葉石濤之於簡阿陶、蔡德本之於蔡佑德，作者皆保留了一定程度的曖昧關係，一方面保留了作者講述自身牢獄經驗的代表性，一方面也強調二者並不同，無形之中形成了自我保護的機制。此外，Oja 也點出該類文體的其他優勢，例如在他對於 Solzhenitsyn 的 *The Gulag Archipelago* 以及 Danilo Kig 的 *A Tomb for Boris Davidovich* 這類「並不完全虛構」卻也非「嚴格的歷史」的

當事者口述歷史的生產機制具有爭取補償的策略性訴求，自傳小說未必為了迎合公眾期待、補償制度的制約而自我修飾。在稍後的分析中，可以發現此一時期的倖存者們，在解嚴最後初期的時刻裡，反而透過自傳小說的文學特色，創造出許多言說自身經驗的有利條件。

在既有的台灣文學研究中，倖存者見證文學的理論概念已被提出，且多著重於其現代主義藝術特徵；然而，本文試圖與此觀點區隔，進一步揭示見證文學中另一種寫實主義的面向。湯舒雯在《史的暴力，詩的壟斷》中，透過集體記憶、文化創傷等理論基礎，交織出「見證文學」的概念，並對應「癥候閱讀」的方法論。聚焦於「倖存者」及其記憶為主的「見證文學」，湯關注於文學如何成為歷史中無法發聲的早熟見證，以及文學的表現形式中模擬「創傷」的形式與癥候；從「癥候式閱讀」的方法著眼，她更顯把握了文本中的「不可見」之處，也就是文本中的空白、沉默等諸樣態⁶¹。她在「『匱乏』與『迷態』——台灣白色恐怖見證小說的『症候式閱讀』」一章中，透過對葉石濤、陳映真、李渝與郭松棻的小說文本展開精彩的文本分析，指出敘事與歷史本該相互保存的互動，卻為「『匱乏』與『迷態』的指涉」，那麼「我們所能見證的，無疑就是一個『歷史於文學中無證』的特殊時代」，並指出「台灣白色恐怖小說讓我們看見的是：『遺忘』正是『記憶』的一部份；只是『記憶』往往並非主題，『遺忘』才是」⁶²的觀點。然而，本章將會對此觀點提出不同的見解。

得力於湯舒雯的文本分析，我們得以窺探見證文學當中那些「能言」而「未言」之處、不完整與（如現代主義一般）神秘化「詩意」般的語言，它既名為「證言」也屬創傷癥候的「沉默」，也正是湯舒雯對於「台灣白色恐怖見證文學」所

文學研究中，Oja 指出：文學家之所以採取這種「文學混合體」(literary hybrid)，一方面由於涉及高壓政治背景下的資料稀缺，這種形式更能夠彌補書面歷史的空白；另一方面，與嚴格的歷史資料相比，虛構化敘述的介入，似乎更適合向讀者傳遞心理或經歷的真正理解。Oja, Matt F. "Fiction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fiction: Solzhenitsyn and Kiš as exemplars." *History and Theory* (1988): 111-124.

⁶¹ 湯舒雯：「第一章 緒論」，《史的暴力，詩的壟斷——台灣白色恐怖的文學見證、癥候閱讀與文化創傷》，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年，頁10-23、27-31。

⁶² 湯舒雯：「第二章『匱乏』與『迷態』——台灣白色恐怖見證小說的『症候式閱讀』」，《史的暴力，詩的壟斷——台灣白色恐怖的文學見證、癥候閱讀與文化創傷》，頁61。

下的精確註解：「見證的時代反而變成歷史無證的特殊時代」⁶³。然而，與之相對，我也想指出作為「倖存者」「見證」的另一個重要面向：透過「中共地下黨」受難者文本的聚焦探討，並考量到寫作者書寫當下的社會侷限的背景之下，本研究發現其實際上也具有另一種極具「寫實」的面相，而這種寫實，一方面激起作者國族立場的思考，一方面也是當下試圖以書寫突破意識形態框架的努力。

在此之前，若要理解「中共地下黨」解嚴後台灣社會所面臨的艱難處境，我們有必要先交代「中共」一詞在解嚴前後的發展脈絡，及其艱難處境。以下，我嘗試說明，「中共」被「雙重排除」的概念，是如何在台灣歷史發展脈絡中被建構而成。

第一節、台灣戰後至 1990 年代「台共」與「中共」的意義流變

本節從歷史認識論的視角，探討戰後至 1990 年代期間「台共」與「中共」的意義流變。聚焦於公眾如何理解這兩個詞彙。需要注意的是，歷史認識的邊界未必等同於歷史事實本身，而是具有其特定的文化建構與側重。

「台共」這個詞彙的指涉在現今已有基本的共識，所指的是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通常會與隸屬於「中共」的系統（例如「省工委」）進行區別。然而，這樣的區分該念最早出現在 1980 年代末期，實際上自戰後以來，「台共」一詞的意義有所轉變，以下分為三階段論述：第一，在戰後初期，「台共」並不是一個嚴謹的詞彙，而是被用來泛稱「在台地區的共產黨員」。第二，從 1980 年代起，「台共」一詞開始出現意義上的歧異，既保留了原有的「在台共產黨」含義，也可能指稱日治時期的台灣共產黨。第三，真正使「中共」與「台共」之間產生明確區隔的，是 1990 年代以來的發展。不僅在於「中共」代表「中國共產黨」、「台共」代表「台灣共產黨」的字面意義，更在於兩者各自衍生出的文化意義建構。1990 年代初期對謝雪紅的重新關注，以及 1996 年選舉期間圍繞李登輝的事件，均在公眾輿論的推波助瀾下，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區隔。可以肯定的是，「台共」與「中

⁶³ 湯舒雯：「第二章『匱缺』與『迷態』——台灣白色恐怖見證小說的『症候式閱讀』」，《史的暴力，詩的壟斷——台灣白色恐怖的文學見證、癥候閱讀與文化創傷》，頁 59。

共」詞彙意義開始產生區分的意識，是隨著台灣意識的興起而發生的；相較於「台共」而言，「中共」更是被「雙重排除」、成為「不可哀悼」(ungrievable)的對象。



一、戰後初期：作為「在台」的「共產黨」泛稱

觀察戰後初期的報刊雜誌，較少直接使用「台共」一詞，多以其他詞彙指涉中共地下黨的運作。例如以「潛台匪黨」指金瓜山支部案件⁶⁴、以「潛台匪共」稱「民主自治同盟」⁶⁵，再如洪國式小組的案件，同樣以「潛台共匪」組織案件稱之⁶⁶，就既有的資料中，較少發現戰後初期直接使用「台共」一詞的例子。

戰後初期，若有使用「台共」一詞，多是指稱「在台共產黨」的意涵。例如1952年，一篇署名為「黎明華、劉興炎、林希鵬、王子英、黃樹滋、廖學信、郭維芬、彭欽嗣、王顯明等『台共』各級幹部及黨員」自新後的公開信，標題為「『台共』自動宣布解散各級組織」⁶⁷，該信完全是以國民黨官方立場寫成，在一番對國民黨「德政」的追捧之後，指出「台共」終將必敗，因此「自動議決宣布重整後『台灣省委員會』及所屬各級組織一律解散」。值得注意的是，該信中所謂的「台共」，並非現代所指認的「台灣共產黨」，而是指時值「重整工作委員會」案件。以上列提及的「黎明華」為例，即為中國共產黨員，與日治時期的「台灣共產黨」未有太大的關聯⁶⁸；而「台共」於此處之意義接近於「在台匪共」或「潛台匪共」組織的意涵。五〇年代後期，在中央日報中所刊載的一篇「蔡孝乾對謝

⁶⁴ 聯合報：「潛台匪黨金瓜山支部 全台組織被我破獲 匪首兩名昨晨正法 於兩犯分別判處徒刑發監執行」第七版，1951年10月8日。

⁶⁵ 聯合報：「桃園地區匪幫組織 當局業已全部摧毀 主要匪犯林秋祥等七人昨正法 餘犯十九名均已分別判處徒刑」第三版，1951年10月9日。報紙引文如下：「匪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桃園支部，所謂『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實際上就是潛台匪共的化身（按潛台匪共因鑒於「二二八」事變失敗的教訓，乃加強所謂「統一戰線」的工作，成立了「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無非巧立名目，以虛偽欺騙的手段引誘本省同胞為其利用而已）」

⁶⁶ 中央日報：「潛台共匪組織瓦解 自首者四三六人」第一版，1950年9月28日。

⁶⁷ 中央日報：「『台共』自動宣布解散各級組織」第四版，1953年1月7日。

⁶⁸ 藍博洲：《紅色客家人》（台中：晨星出版，2003年12月），23-105。

雪紅指名廣播」中，也同樣稱省工委的領導人蔡孝乾為「前『台共』負責人」⁶⁹，但由於蔡孝乾本身兼具雙重身分——1928年於台灣共產黨組建於上海之際，獲選為中央委員，同時也是台灣省工委會的領導人物。由上述可知，此時期的「台共」一詞未具有嚴謹的指稱對象。

從以上例證可以認為，戰後「台共」一詞的概念作為「在台的中共」的意涵，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項原因解釋：第一，戰後國民黨處於國共內戰的背景，並受到國際冷戰結構的影響，因此關於「匪諜」或「共產黨」的概念都被籠統地歸入定罪的大傘下，並無必要細分「共產黨」的種類。第二，儘管從今日的觀點來看，「台共」與「中共」有不同之處，但兩者在成員組成上卻有所重疊（蔡孝乾本身也重疊這兩者身分），這又進一步模糊了區分它們的界線⁷⁰。第三，戰後的國民黨自認為正統中國政權，其所謂的「台共」只具有地域層面的意涵，指的是「潛台」或「在台」的地理概念，意味著「在台」地區且具有「共產黨」身分的一切泛稱。

直到1965年，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同樣的現象。李勇在《聯合報》上所發表了短篇小說〈赤手伏魔記〉。〈赤手伏魔記〉是一篇早期以偵破台共武裝地下組織為主題、並基於官方立場所撰寫的作品。小說的副標題為「中國情報人員工作實錄」及「牛角山招降台共武裝組織詳情」，小說描繪了調查局破獲在台的匪諜組織後，循線繼續偵查由「老黃」所領導、位於台北縣牛角山的武裝組織。小說顯然貼合了國民黨的官方立場，作者透過描寫匪諜人物在「幡然悔悟」前後的變化，凸顯組織成員誤信「匪黨」的宣傳，並讚揚了政府是如何寬容地接納自新份子。小說最後，得力於調查局「俞課長」「膽識、口才、身手、槍法」的行動，台共組織在不流血的情況下被成功瓦解，其成員心服口服地改邪歸正。⁷¹調查局利用

⁶⁹ 中央日報：「蔡孝乾對謝雪紅指名廣播」第四版，1958年1月28日。

⁷⁰ 例如根據檔案「蔡孝乾之訊問筆錄」，蔡孝乾於1946年來台發展組織時，距離前次離開台灣（民國十七年）已有十六年的時間，因此對台狀況不慎熟悉，亦因怕暴露身分而未找親戚朋友；於是，蔡孝乾從日治時期的共產黨著手，命張志忠著手進行，聯繫到謝雪紅、王添強、楊克煌、林樑材、簡吉等人，又透過牽線，繼而有台中醫生林糊、李媽兜等。見國家檔案資料網：「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案號：A305050000C/0036/0410.9/44904440）。

⁷¹ 李勇：〈赤手伏魔記〉，聯合報，1965年2月13日，第十版。

被捕後自新的前台共首腦「老 K」勸降「老黃」，說：「過去，我們都錯了，誤聽匪黨的宣傳，受了他們的蠱惑」，並告訴他政府對自新台共成員如何既往不咎。小說情節與破獲省工委案件的過程相似，儘管小說中並未明言「台共」等同於「中共在台所發展的組織」；然而，從上下文來看，小說極可能是以破獲省工委情節作為創作題材。換句話說，本文所提及的「台共」，實際上可能指的是中共在台灣發展的組織。

二、1980 年代：是「台灣共產黨」還是「中國共產黨」？

至於「台共」的意義開始產生內部分歧，最早出現在 1980 年代末期。這一發展的原因在於，傾向官方立場者透過強調日治時期台共人士的抗日行動，來打擊當時漸趨興起的台獨勢力，尤其反映在《聯合報》的輿論上。一般而言，《聯合報》被認為是親國民黨官方立場的報紙，尤其在批判台獨方面保持著一貫的立場。⁷²1988 年 5 月 28 日與 29 日，《聯合報》連續兩天報導了關於「台共」的新聞，標題分別為「前『台共』被請出來當『證據』 統獨之爭 更趨複雜」⁷³與「台獨講古 抗戰時期維護民族獨立 台共主張與今大不相同」⁷⁴；事件起因於 5 月 28 日「台灣史研究會」邀請多位日治時期的抗日運動者演講，其中包括「台灣共產黨」幹部莊春火和莊守等人。報導著重強調：日治時期「台共」所主張的台獨是基於漢民族的立場，以反抗日本統治，而這與當時興起的台獨運動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但若要更深層次地理解此報導的內涵（「台共」與「台獨」有何關係？），可能還需近一步的說明稍早以前的時代脈絡。

⁷² 彭明輝：〈《聯合報》社論對台灣重大政治事件的立場與觀點（1950-1995）〉，《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18 期（2001 年 5 月），頁 277-308。另一方面，黃秀端透過報紙研究不同階段對於二二八事件詮釋時，也認為可以透過觀察聯合報，看出解嚴前執政者欲灌輸給民眾關於二二八的集體記憶，由此可推知聯合報的立場傾向。黃秀端：〈政治權力與集體記憶的競逐——從報紙之報導來看對二二八的詮釋〉，《台灣民主季刊》第 5 卷第 4 期（2008 年 12 月），頁 9-10。

⁷³ 聯合報：「前『台共』被請出來當『證據』 統獨之爭 更趨複雜」第三版，1988 年 5 月 28 日。

⁷⁴ 聯合報：「台獨講古 抗戰時期維護民族獨立 台共主張與今大不相同」第二版，1988 年 5 月 29 日。

實際上，早在 1970 年代晚期，即有「反台獨」人士將「台獨運動」與「中共」連結；如果用今天的話來比喻，就是將「台獨運動」「抹紅」的一種政治手段。1979 年 3 月，聯合副刊一連七天刊載林志雄〈顯微鏡下的「台獨」〉⁷⁵一文，便大肆將「台獨」扣上紅帽子，文中更直接指出：

台獨已淪落為台共，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中，如果有人說「台獨」是中共統戰工具，或說他是「毛化」的台獨，許多「台獨人士」是死也不肯認帳的，說這是他們「扣紅帽子」，現在他們自己提出的「社會主義台獨的理論」，完全是「毛澤東思想」的翻版……「台獨」實質上已成了「台共」。

又接著解釋「台獨」變成「台共」的理由：

一方面是中共積極的滲透，業已掌握了台獨；一方面是由於台獨自感其前途灰黯而賣身投共，成為中共的統戰工具。

從這些資料來看，林志雄將台獨運動「抹紅」，並且利用既有的反共思維，來打擊當時正在興起的台獨勢力。值得一提的是，林志雄的文章當時獲得廣大的回響，更進一步地印制成冊，在坊間推出諸多印製版本⁷⁶，很難不讓人相信這背後有著國民黨官方力量的推波助瀾。

如果從這個脈絡來看待 1988 年 5 月的兩篇關於「台共」的報導，我們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幾個更深層的暗示。首先，日治時期的莊春火與莊守和今日的「台獨人士」都被稱為「台共」，但前者是「台灣共產黨」，後者則被視為「中共」「統戰」的影武者。其次，雖然他們都主張「台獨」，但前者的台獨是忠誠於漢民族的抗日行動，而後者的台獨則被視為對漢民族的背叛，因為他們背離了代表「正統」中國的國民黨政權，並被「匪共」所利用。當然，這樣的報導在今天看來顯得滑稽不堪，顯然背離事實，但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觀察結論：在 1980 年代末期，在台獨興起的趨勢、官方反台獨的提倡之下，「台共」一詞的內部意義產生

⁷⁵ 林志雄：〈顯微鏡下的「台獨」〉，《聯合副刊》第十二版，1979 年 3 月 10 日-16 日。

⁷⁶ 詳見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網典藏查詢。林志雄：《顯微鏡下的台獨》（私立僑光科技大學印製，1979 年 6 月）<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20.032.0072>

了分歧，究竟是指日治時期的「台灣共產黨」，還是竊取國民黨權力版圖的「中國共產黨」，已產生對立。



三、1996年：是「中共」不是「台共」！

1990年代適逢台灣主體的建構之際，「謝雪紅」議題也開始受到更多的關注。作為台灣人的謝雪紅，曾於日治時期參與「台灣共產黨」，並於戰後二二八事件中指揮台中地區武裝的抵抗行動；二二八事件後逃至香港，先後成立台灣再解放同盟與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儘管謝雪紅後來參與了中國共產黨，但仍然勇於批判中共錯誤的對台政策，主張台灣應高度自治，反抗中共中央堅持主張的「以中國治台灣」，而這也使謝雪紅慘遭到中共的公開鬥爭⁷⁷。正如陳芳明所評述的：「謝雪紅是一位與台灣現代史牢牢結合的女性」⁷⁸，在這個政治轉型的關鍵時機點，歷史學者從歷史的灰燼中重新發掘了一位與台灣歷史深刻結合的歷史人物，對她的評價有待重新評估；再加上她的生平的幾個關鍵詞——二二八事件抵抗暴政、抵抗中共政策等，無疑是1990年代建構台灣主體性論述所需的歷史資源；而她的女性身份，也很容易與同一年代中興起的性別與國族議題緊密交織的思考方向相互應和。而這些種種因素，使得謝雪紅在90年代初期成為受關注的歷史人物，絕非偶然，謝雪紅所代表的「台共」一詞的輪廓也在此過程中逐漸清晰起來。

1991年，陳芳明完成了《謝雪紅評傳》，此書動筆於1987年，撰寫過程中經歷了台灣戒嚴與解嚴過度的政治變遷。陳芳明的著作引起一定程度的迴響。受到陳芳明著作的啟發，田啟元於1994年創作劇本《一個隱藏於歷史背後的女人》；然而，這部劇本的演出計畫似乎並不順利，根據《聯合報》專訪陳芳明的報導，原本該劇應於台北國立藝術館（今日「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演出，卻因館方認為謝雪紅是一名「壞女人」而遭封禁，最終只能在台南演出⁷⁹；該篇報導中也強調了幾項謝雪紅的經歷，包括：1928年成立台灣共產黨、遭日人拘捕、二二八

⁷⁷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台北：麥田，2009年2月），頁424-431。

⁷⁸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21。

⁷⁹ 聯合報：「寫完「謝雪紅」發現女性主義——陳芳明 解放了自己」第35版，1994年4月13日。

事件組織二七部隊抵抗陳儀，以及雖然參加毛澤東政府，卻強調「台灣自治」而遭當權批鬥等；報導中所使用的「台共」，指的是日治時期的謝雪紅於日治時期所成立的「台灣共產黨」。而這波關於謝雪紅的討論並沒有結束，1996年1月17日，姜昉在《聯合報》刊載「謝雪紅之死」一文，文中首先即嘗試劃清「台共」與「中共」在二二八事件當中的界線，而這一討論又進一步地區別了「台共」與「中共」的概念，文中說：

一九四六年我由大陸一份刊物中，知道謝雪紅的身世和她在二二八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本來這件事和中共無關，但他們為了政治宣傳，硬說成是一手策畫和領導的，而且把失敗的原因全推到謝雪紅身上。國民黨為了推卸責任，藉口鎮壓有理，也一口咬定是中共幹的，數十年來一直真相不明。因二二八事件亡命大陸其實，謝雪紅和中共並沒有歷史淵源。她是日共台灣共產黨支部的書記……⁸⁰

關於「亡命大陸」的謝雪紅，是否如文中所述：「沒有歷史淵源」？這顯然是在公共論述更側重於謝雪紅出逃台灣以前的經歷所得到的結果。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二二八事件當中，中國共產黨實際的影響力確實有限⁸¹。從上文中可以看出此一時期對於「中共」與「台共」的區分意識也愈加強烈——人們並不苟同既往國民黨推卸責任、將一切「共產黨」歸入中共之名下，以合理化鎮壓的卸責行為，於是更欲指出「台共」不同於「中共」之所在；而謝雪紅生平的幾項關鍵經歷也在諸多公共論述中被反覆提及（二二八、與中共對抗等），這也反映了90年代在建構台灣主體性的過程中所需要的歷史論述素材。諸如上述所謂，在這波謝雪紅的討論當中，「台共」不同於「中共」的獨特性也漸趨清晰。

90年代初期的謝雪紅熱，與當時台灣民族主義的興起，以及論者對於台灣前途的盼望有關；於是「台共」一詞也逐漸成為與「中共」對立的概念。關於這

⁸⁰ 姜昉：〈謝雪紅之死〉，《聯合報》第34版，1996年1月17日。該文的副標題為：「謝雪紅批評毛澤東單純的軍事『解放台灣』觀點，尤其對毛澤東解放台灣後，三分之一鎮壓、三分之一勞改、三分之一管制的方法批評激烈。」該文也凸顯了謝雪紅與中共對抗的歷史事蹟。

⁸¹ 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新北：衛城，2017年2月），頁240-248。

樣的文化建構，林瓊華有所批評，林瓊華認為，陳芳明著作中所強調的「台獨形象」的謝雪紅，及受其著作影響的台灣讀者，其實是深受當時台灣集體意識（也就是對於台灣前途的集體盼望）影響，而投射在「謝雪紅」身上的結果。⁸²換句話說，這種形象的建構，與當時所興起的台灣民族主義，以及台灣人集體對於未來的嚮往有關——實際上「獨立」並不是謝雪紅的意思，但這一點也不重要。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之下，「台共」一詞——作為對立於「中共」的文化符碼，它的範疇與邊界逐間清晰起來。

另一項使「中共」與「台共」進一步區分的關鍵事件，是 1996 年第一次總統直選。這還須從選舉前的一場政治風暴說起。1996 年 3 月 2 日，距離選舉投票僅剩下半月餘的時間，以無黨籍參選的林洋港與郝柏村（即「林郝配」）上午召開記者會，表示握有李登輝曾參與過共產黨的人證；同時，林郝也由《歷年辦理匪案彙編》中的「匪台灣省工委會台大法學院支部葉城松等叛亂案」裡，找出李登輝曾參與組織活動的紀錄⁸³。隨後，與彭明敏搭當參選的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謝長廷也呼籲民間組成調查團（即「彭謝配」），如果李登輝真的參加過共產黨，則應退選；若無，林郝配即應因說謊而退選。⁸⁴ 3 月 14 日，彭謝總部發布新聞稿，題為：「你相信一個曾賣友求生的總統能夠帶領台灣走出危機嗎？」質疑李登輝在葉城松叛亂案中「賣友求生」；然而總統府至此一時間，仍回應檔案中的「李登輝」僅是與其「同名同姓」的巧合。⁸⁵

幾日後，林郝競總邀請當年辦理匪諜案的谷正文現身指證。谷正文表示，李登輝當年確實曾參與共產黨，儘管總統府一再否認這樣的傳聞，但谷正文指證歷歷，仍堅稱李登輝總統就是葉城松案件中的「李登輝」；隨後，李登輝競總嚴詞

⁸² 林瓊華：〈左獨、左統與民主自治：台灣社會主義者謝雪紅的政治認同與實踐困境〉，《文史台灣學報》第 12 期（2018 年 9 月），頁 105-129。

⁸³ 聯合晚報：「李登輝參加過共產黨？林郝將請證人現身說法」第二版，1996 年 3 月 2 日。

⁸⁴ 聯合報：「是否參加過共產黨？謝長廷要求調查李登輝」第六版，1996 年 3 月 11 日。

⁸⁵ 聯合報：「共產黨員？賣友求生？彭謝促李清楚交代政治資歷」第六版，1996 年 3 月 15 日。

駁斥，並決定對林郝陣營的抹黑行為採取法律行動^{86、87}。根據 3 月 18 日的聯合晚報，谷正文說：「李登輝是在民國 36 年加入共產黨，參加的不是台共，而是中共由上海派蔡孝乾來發展的組織」⁸⁸，谷正文的這番話語被報紙反覆刊載；3 月 19 日，聯合報又重新轉述了谷正文的話，再次強調：「李登輝在民國三十六年加入共產黨，但不是台共謝雪紅系統，而是中共由上海派蔡孝乾來台發展的組織」⁸⁹；同日，民生報也轉載：「李登輝在民國三十六年加入共產黨，不過，他參加的不是謝雪紅的台共組織，而是中共上海東南局蔡孝乾來台成立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學生運動委員會」。⁹⁰然而，關於李登輝是否參與共產黨的傳聞，並未因其採取法律行動而終止，3 月 20 日郝柏村參與電視節目時又批評：「李登輝不敢面對曾加入共產黨的事實」⁹¹；3 月 22 日彭明敏也表示：「李登輝究竟是否參加共產黨是很嚴重的問題」，並「應親自公開說明，不應只是透過身邊的人放話」⁹²。可以這樣認為：選前的這場政治風暴，再次引發公眾對共產黨議題的討論；而谷正文的這番話語，一方面延續了此前由謝雪紅代表的「台共」熱潮，又更進一步地區分了「台共」與「中共」，他所透露出隱藏於其中的意涵是：「台共」不同於「中共」，且相較於「台共」的謝雪紅系統而言，「中共」更是不可原諒、不可哀悼的身分屬性。透過李登輝事件的公眾討論，又進一步地強化了二者在意義上的區別。

可以從以上三個階段的考察得出以下的小結。

⁸⁶ 聯合晚報：「入共黨案再掀波 老將軍現身談 谷正文：宋心濂要我不能說出秘密 林陣營：忠誠上的污點 不可原諒！ 李陣營：採取法律行動」第四版，1996 年 3 月 18 日。

⁸⁷ 民生報：「『谷正文明顯遭人利用』 李陣營嚴詞質疑」第十八版，1996 年 3 月 19 日。

⁸⁸ 聯合晚報：「入共黨案再掀波 老將軍現身談 谷正文：宋心濂要我不能說出秘密 林陣營：忠誠上的污點 不可原諒！ 李陣營：採取法律行動」第四版，1996 年 3 月 18 日。

⁸⁹ 聯合報：「李登輝曾否參加共黨 谷正文昨天細說往事 谷出面指證：此李登輝 即彼李登輝；李總部律師：若李是匪諜 谷何以錯放」第五版，1996 年 3 月 19 日。

⁹⁰ 民生報：「『李登輝曾參加共產黨、向調查局自新、出賣很多人』 谷正文出面證實」第十八版，1996 年 3 月 19 日。

⁹¹ 聯合晚報：「郝柏村：中南部李登輝情結是利用省籍挑起的 不能選共產黨當領導人」第二版，1996 年 3 月 20 日。

⁹² 聯合晚報：「李登輝是否共黨員 彭明敏：應親自公開說明」第五版，1996 年 3 月 22 日。

第一，在台灣戰後，「台共」與「中共」並不是被明確區分的概念，「台共」被用來泛稱在台地區的共產黨員，並非必定如同今日所指稱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

第二，「台共」一詞產生內部分歧始於 1980 年代末，隨著台灣主體性的上升，台獨勢力的漸起，國民黨官方為了打壓正趨興起的台獨勢力，重新提起日治時期心向祖國抗日的「台共」；此時期的「台共」才開始被「強調」其指涉對象為日治時期的「台灣共產黨」，從而產生了早期區別「台共」與「中共」的意識。

第三，真正使「台共」與「中共」二者被明確區分則待 90 年代：90 年代初期隨著台灣主體性的建構熱潮，重新注意到了日治時期建立「台灣共產黨」的謝雪紅，謝雪紅生命經驗與台灣重層殖民的歷史息息相關，故而被重新提起，並掀起了一股「謝雪紅熱潮」；謝雪紅所代表的「台共」與「中共」開始產生對立，這固然是參與論者側重於謝雪紅出逃台灣前經驗的結果；再加上 1996 年第一次總統直選中爆發的李登輝事件，「台共」與「中共」的意義更是在公眾輿論中被明確的區分開來。

總結而言，本文著重探討公眾如何理解「台共」與「中共」的意義，並指出歷史認識的邊界未必等同於歷史事實本身，而是具有其特定的側重面向。例如，儘管謝雪紅與蔡孝乾各自與台灣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皆有其歷史淵源，但在 1990 年代的輿論脈絡下，逐漸被建構為「台共—台灣共產黨—謝雪紅—台灣主體性」與「中共—中國共產黨—蔡孝乾—中國侵略者」的二元對立。這一建構在公眾輿論中，尤以引用谷正文話語的情境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台共」一詞在歷史建構的過程中，逐漸與「中共」的概念分道揚鑣，走向了截然不同的路徑；這一分化的進程與台灣主體性的興起密切相關。自 1980 年代末期以來，「台共」被建構為一個「可哀悼」的對象，而這與「中共」始終作為「不可哀悼」的對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第二節、解嚴後倖存者的感覺結構

延續著上述的脈絡，單就李登輝事件而言，我們就可以大抵勾勒出 1990 年代台灣社會對於「中共地下黨」的接受程度仍然十分有限——或可謂，幾乎沒有生存的空間，因為無論是來自傳統國民黨色彩的林郝陣營（脫離國民黨以無黨籍參選），或新興且具有台獨傾向的彭謝陣營，皆不約而同地對此事投以非難。而政治局勢與台灣文學的發展具有密切的互動與交織的關係，本節嘗試勾勒解嚴後倖存者的感覺結構，以作為稍後理解葉石濤與蔡德本的書寫行動的切入點。

一、解嚴後初期台灣文學的發展

回顧台灣文學的發展脈絡，1970 年代以來的黨外運動，以及美麗島事件的後續激化，也促使著台灣文學的發展在 1980 年代前半葉發展出政治化的傾向；蕭阿勤指出，1980 年代上半葉所興起的「台灣意識論戰」的交鋒，其對象不僅是對國民黨的「中國意識」，也包括左傾政治異議人士（例如陳映真）所主張的「中國意識」；而 1986 年之後隨著民主進步黨的正式成立，台灣民族主義也得以顯著發展；與此同時，一種「去中國化」、再民族化的民族文化論述成長，這也迎向建立民族文學的關鍵時期，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也在該「書寫台灣人的文學史」時代脈絡底下生產。⁹³除此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影響台灣的變數仍不可忽略：儘管自 1987 年以來的諸多徵兆似乎暗示了即將結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戰」狀態，但由於中國對台強硬的「回歸祖國」政策方針，更使得台灣民族主義論者，更欲凸顯兩方文化差異的重要性⁹⁴。可以發現，這前與後的一去一來，無論是為了「內戰」還是「外患」，雖然其意義有所不同，但「反共」這一關鍵詞卻意外地成為兩者光譜交會的共同點。不可否認的是，面對台灣民族主義興起的潮流，儘管以文學揭露政治黑暗題材的風氣更顯勃興，然而在此潮流之中，似乎也沒有為五〇年代涉關中共地下黨的政治受難者留有太多的表述經驗的空

⁹³ 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2012 年 12 月），頁 180-216。

⁹⁴ 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頁 216-219。

間⁹⁵，雙重意識形態框架的對抗之下，這些受難者成為了遭「雙重排除」的「雙重弱勢」狀態。



二、葉石濤與蔡德本的自白

一方面，不論是葉石濤或蔡德本，他們都迎向了本土轉向的時代潮流，藉由回溯台灣苦難與悲情歷史，重塑抵抗外來政權的台灣主體性。例如蔡德本在《番薯仔哀歌》的「自序」中即陳述了台灣作為外來者政權統治的歷史，其中尤以「白色恐怖」的戒嚴時期「最為悲切」：

近世代台灣的歷史，可說是外來政權統治下的歷史。……因此，可歌可泣的反抗和犧牲不斷地發生，數百年來島上的哀歌也不絕於耳。尤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全台各地發出的哀歌，最為悲切，也最為長久。哀音綿綿，長達四十年之久。⁹⁶

而在葉石濤的《台灣男子簡阿淘》中，也藉由小說刻劃簡阿淘自戰後「重新尋覓自我的定位」過程的思辯證後，「確立台灣為主體的自由、民主思想」⁹⁷的過程。書寫者們迎向了本土轉向的時代潮流，而挖掘台灣「悲切」的歷史，這也是形塑台灣主體性的行動之一。

但另一方面，葉石濤與蔡德本似乎也意識到，挖掘（他們所親身經歷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記憶，難免牽涉到「中共地下黨」的敏感身分，而這與當下現實政治及其背後所代表的意識形態間隱含著緊張關係。葉石濤已經表達了某種憂慮：

縱令他們的主張和理論有些是歷史的謬誤，但是他們為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的解放所做的打拚和犧牲，乃構成了台灣民眾抗議活動的重要部分。……無數的純潔台灣青年知識分子為台灣的解放所做的奉獻，是我們

⁹⁵ 例如林傳凱指出，在台灣民族主義的史觀中，這些人所參與的組織或政黨，時常被歸類為「敵人」的一方所看待。林傳凱：〈「大眾傷痕」的「實」與「幻」——探索「1950年代白色恐怖」見證〉的版本歧異〉，《歷史台灣》第7期（2014年11月），頁61。

⁹⁶ 蔡德本：《番薯仔哀歌》（台北：遠景，1995年11月），頁11。

⁹⁷ 葉石濤：《台灣男子簡阿淘》（台北：草根，1996年9月），頁4。

歷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現在抨擊他們의思想和意識形態而有所忌諱，並非是正確的做法；他們已經是台灣歷史的一部份，不能讓他們永遠埋葬在被侮辱的抨擊中。⁹⁸

葉石濤早已注意到這群人在兩股強力的意識形態碰撞下，所身處的歷史盲點；他不僅主張發掘這段被淹沒的歷史，除了肯定其為台灣社會運動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外，也強調不應因意識形態而有所忌諱，將他們埋沒在歷史的批評與侮辱中。蔡德本也有類似的主張，他也認為「**不論其政治立場如何**，無人能否定在這島上確實存在過一段令人慌慄的恐怖政治」，我們不應隱沒這段白色恐怖的「政治實態」，也不應「誤把可憐的犧牲者視為惡人」。⁹⁹而上述葉石濤與蔡德本的主張，也將成為他們在小說創作的實踐中一個可予以關注的面向。

綜合來說，可以大致勾勒出作為做為五〇年代的倖存者，也同時身為見證者的蔡德本與葉石濤，於解嚴後初期的感覺結構。他們迎上了本土轉向的時代浪潮，將挖掘台灣「悲切」的記憶作為抵抗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正當性，這也是重塑台灣主體性的一項文化民族主義行動。然而，兩位書寫者同時注意到，那些具有「中共」身分牽涉的受難者，在當下社會政治現實弔詭嫁接後所引發的問題。因此，他們皆不約而同地主張，不應因其身分屬性而忽略或抹滅其在威權政體下從事社會運動、抵抗恐怖政治的事實。而在此階段，文學所對抗的是一前一後框架轉換間的雙重夾擊，試圖在此夾縫中重構曾經消失、雙重排除的邊緣記憶。換句話說，兩人皆透過書寫，試圖呈現這些受難者的身影，作為一種雙重抵抗（「國共內戰框架」與「反侵略／併吞框架」）的書寫行動。我們將會看到，在這個政治轉型的關鍵時刻點，二人不約而同地採取「自傳小說」的文體形式，將開創出倖存者見證文學獨特的寫實層面。

⁹⁸ 葉石濤：《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台北：前衛，1991年9月），頁98-99。

⁹⁹ 蔡德本：《番薯仔哀歌》，頁11。

第三節、自傳小說的寫實性：關於葉石濤與蔡德本

本節以葉石濤以及蔡德本的小說為例。他們不約而同地採用「自傳小說」講述五〇年代自身的白色恐怖記憶。此部分嘗試說明此文體在狹縫中所創造出的言說空間，以及倖存者見證文學獨特的寫實層面。



一、「旁觀者清」？葉石濤及其自傳小說

官方是如何記載葉石濤入獄的始末？1953年9月，葉石濤因「明知為匪諜而不報告檢舉」被判刑。根據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的判決，葉石濤受押（1951年收押）之緣由，為1946年曾向黃添才購閱禁書刊物，並經由黃添才介紹認識陳福星，軍法庭認為葉石濤知匪不報。雖然葉石濤解釋稱不知黃與陳系為匪諜，但判決認為葉石濤曾向黃購買禁書，且陳曾至其家宣講「反動言論」，再加上二二八事件發生翌日，陳曾向葉石濤聯絡並告知台北發生之事件，因此並不採信葉石濤的辯解，並以「明知為匪諜而不報告檢舉」被判有期徒刑五年。¹⁰⁰從檔案中可以看出判決所記載的官方說法。

葉石濤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牢獄經歷？從他在回憶錄《一個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中可見其有關說法。〈白色恐怖的來臨〉文中述及了他被捕前後的時間脈絡，但卻十分簡略，幾乎無法單從其中得知其被捕事件的緣由，他說：

一九五一年的秋天某一天深夜，我終於被捕了；但是出於意料之外，我被捕的案件和六月下旬被捕的任何一位好友是扯不上關係的。最荒謬的是，我竟然是因戰後第二年，也就是二二八發生的前一年一九四六的瑣屑事件而被捕的。說實在的，一九五一年的秋天，與一九四六年春天之間已隔了五年多的歲月，我早就把戰後那一段日子的生活細節忘得一乾二淨了。

101

¹⁰⁰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蔡秀榮等叛亂案。1953年11月19日。檔號：B3750187701/0042/1571/44902099/119/065。

¹⁰¹ 葉石濤：《一個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頁65。

文中並沒有具體地敘述自己被捕的原因，而是以「忘得一乾二淨」帶過。而在〈細說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中〉也僅約略提及戰後與「老洪」先生的交往經驗（文中使用「陳芾興」的化名，並註記「姑隱其名」，對照之下可知指的是重整委員會的領導人陳福星）。老洪是葉石濤戰後初期左翼知識的啟蒙者，後因理念不合而漸行漸遠，遂斷絕往來；直到 1952 年被捕，才在牢獄中聽遇有轉述陳氏是蔡孝乾領導組織下的重要幹部。¹⁰²從葉石濤自身的說法，對照判決書所記載的內容，較明顯的出入在於：判決認定葉石濤知匪不報，而葉石濤本人直到被捕後、在獄中聽聞獄友轉述之前，都不知他的友人與地下黨運作有關。

葉石濤的回憶錄並沒有系統性地講述自己入獄的原因，多數是在講述其他主題時順帶提及。而稍早之前，葉石濤根據其自身經歷寫改編的小說〈紅鞋子〉，反而詳細地交代了「簡阿淘」被捕的經歷、定罪的過程，甚至仿擬了簡阿淘的判決書（若與上述葉石濤的判決書相對照，可知簡阿淘的判決書是仿擬自己的判決書所寫成）。而葉石濤也曾直言「簡阿淘」是自己的「投射」，「多篇小說裏簡阿淘的遭遇也就是我底遭遇」¹⁰³，可支持上述的說法。

短篇小說〈紅鞋子〉描述了簡阿淘被逮捕並判刑的時代背景與過程。小說一開始介紹了簡阿淘閱讀左翼書籍的背景，以及他與小說人物——阿才、老洪先生、辜雅琴、龔梨花、李本順等人的交友網路。而小說中，轉折點出現在一個深夜，簡阿淘因楊雙冬（國民學校的剃頭匠）的出賣而被警方漏夜逮捕與審問。軍法庭上，簡阿淘被指控「叛國」、擔任重整工作委員會「吳多星」的秘書，這樣的指控來自於阿才、李本順與龔梨花等人的交友關係，但簡阿淘抗辯並不知吳多星的身分，且他與阿才等人也僅是「認識」而已，跟本不算是朋友，偶爾買書、聊天，不僅稱不上熟識，更否認了參與組織的運作。但法庭並不採信簡阿淘的抗辯，最終仍以「明知匪諜而不告密檢舉」定案。在〈約談〉中，簡阿淘又完整的直接重述被捕的原因，再次提及了中學時期的老學長「吳多星」，儘管與他有交友往來，但簡阿淘根本不知道吳多星是「重整工作委員會」的首腦、是在台中共的「新領袖」，因此簡阿淘無論如何抗辯都不被採信，最終「被冤枉關了三年多」（頁 121）。

¹⁰² 葉石濤：《一個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頁 92-94。

¹⁰³ 葉石濤：《台灣男子簡阿淘》（台北：草根，1996 年 9 月），頁 4。

對照葉石濤與簡阿淘的經歷，可以發現兩者具有高度的互文關係。小說中，「吳多星」顯然指的正是重整委員會的領導人陳福星，而陳福星也確實是葉石濤就讀中學時期的學長。而「阿才」則明顯地暗指黃添才，葉石濤也確實曾向黃天才購買左翼禁書刊物，這也成為其被定罪的原因之一。葉石濤曾解釋，早在台南二中的少年時代，即透過閱讀河上肇等左翼書籍汲取思想養分¹⁰⁴，雖然後續也結交許多左傾朋友，但他的政治主張卻與「左統」格格不入，他試圖在國共爭霸之外尋求「台灣民眾真正當家作主的政治體制」¹⁰⁵，即便他與左傾友人結交，卻仍被視為「圈外人」或「異己份子」，因此並未參與也不曾理解其實際推行的活動¹⁰⁶。可以認為，葉石濤對於自身冤案的理解與詮釋，投射到了「簡阿淘」之上，而簡阿淘作為貫穿各篇小說的主軸，其位置於對小說讀者理解小說而言，具有聚焦的核心作用。¹⁰⁷讀者很容易放大此一焦點，認為小說是以「冤」作為核心的論調。實際上，在諸多的前人觀點中已然看到類似的評論軌跡。

例如，學者余昭玟以典型對五〇年代政治犯的理解：「大多屬冤、假、錯犧牲者」的詮釋框架帶過以理解小說本身¹⁰⁸。但若根據葉石濤的論述，作為倖存者的他，卻從未將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定調在「冤假錯」的扁平化想像：他認為，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被捕的民眾，主要來自沒落小地主家庭的知識份子，因為這個階級擁有優越的教育背景與實踐能力；儘管這些人擁有各自不同的世界觀和性格，卻走向了不同的「叛亂」途徑¹⁰⁹。葉石濤使用「叛亂」一詞，實際上已經暗示了這些「受難者」本身具有某種有別於「無辜受難」行動，這與葉石濤的經歷有著根本的差別，換句話說，葉石濤並不是這些被捕民眾的「典型」。而如

¹⁰⁴ 葉石濤：《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頁 39。

¹⁰⁵ 葉石濤：《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頁 62。有關於葉石濤的政治主張在小說〈紅鞋子〉中也可見對應，但這部分已經有許多人指出，就不再贅述。

¹⁰⁶ 葉石濤：《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頁 62。

¹⁰⁷ Dixon, Peter, and Marisa Bortolussi. "Literary communication: Effects of reader-narrator cooperation." *Poetics* 23, no. 6 (1996): 405-430.

¹⁰⁸ 余昭玟：《從鍾肇政到葉石濤——台灣小說家研究論文集》（台北：五南，2013 年 2 月），頁 112。

¹⁰⁹ 葉石濤：《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頁 105-106。

果我們聚焦在小說中簡阿淘「旁觀」的視角，對純粹地冤案懷有隱含地猜測，我們可以將它理解為葉石濤如何回應上述「憂慮」的實踐。

短篇小說〈鹿窟哀歌〉以旁觀者的視角敘述了簡阿淘在獄中遇到的一批來自鹿窟的農民冤獄事件。小說中，省工委組織遭破壞後，台北市委組織在鹿窟建立游擊基地，小說中呈現鹿窟的農民始終處於無知與被蒙騙的狀態，例如省工委的人偽裝「分配肥料」的文件為「參加造反入黨文件」並讓農民簽署、以「義勇軍進行曲」偽裝成「國歌」教育農民傳唱，也指「有鐮刀圖案」的旗幟為「國旗」使農民相信，小說中的農民即便入獄，也全然不知自己為何入獄。¹¹⁰有趣的是，當農民們在獄中辯解自己全然不知時，小說以全知的敘述者刻劃簡阿淘隱約的質疑，小說如是說：

（按：農民說）「什麼造反？我不懂。只是農會的陳先生曾拿名冊叫我蓋章，說是要分配肥料，哪裡知道這名冊竟出了什麼紕漏？在名冊上曾蓋過章的統統進來了。」

一絲絲狡猾的暗影略過了這樸實的老農夫臉上。簡阿淘知道受到台共訓練的勞動人民都善於偽裝自己，其實他們都懷有堅定的信念和不可動搖的決心，因為他們窮的一無所有，不怕犧牲自己生命。

顯然地，「簡阿淘」對其「完全不知情」的狀態是抱持懷疑的，葉石濤也藉小說隱約表示受難者的證言似乎並沒有表面上所看的單純。不同於林傳凱認為葉石濤帶有「閃躲」的態度¹¹¹，若從本章脈絡考量葉石濤的書寫環境，將其解讀為透過文學展現的一種微小抵抗，或許更為適切。但葉石濤在小說中如此隱諱的表態，似乎沒有引起太大的注目，這與「鹿窟事件」進入公眾視野後的主流定調有很大的不同。如果進行簡單的考察，可以發現鹿窟事件出現在公眾視野，來自於 1994 年 7 月 8 日的一場座談會。由水返腳文史工作室主辦的「鹿窟事件遺老座談會」，邀集當年負責圍剿鹿窟基地的指揮官谷正文，以及鹿窟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對談，

¹¹⁰ 葉石濤：《台灣男子簡阿淘》（台北：前衛，1990 年 5 月），頁 116-118。

¹¹¹ 林傳凱：〈左翼、地下、血的預感——五〇年代給青年的邀請函〉，「報導者」（2020 年 9 月 17 日）。檢索日期：2025 年 2 月 3 日。<https://www.twreporter.org/a/bookreview-taiwan-white-terror-novel-1-guide>。

座談的內容由幾名倖存者指出，鹿窟被捕居民主要是沒有受過教育、且沒有足夠知識的鄉下人，谷正文也表示：「鹿窟事件根本非什麼武裝基地，其實就是責人陳本江為了求賞，出賣當地無知的村民，製造叛黨名冊。」¹¹²村民始終處於被蒙蔽、無知、純粹冤枉的說法，對於後續鹿窟事件的理解有著很大的制約作用。1999年，由於「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適用條件過嚴格，因此時任立委施明德舉辦鹿窟事件公聽會，期望放寬補償條件。其中，谷正文與夏長功坦承：「鹿窟居民當年確實是被冤枉的，他們多不識字，怎會知道甚麼是共產主義，何謂是新中國。」¹¹³同樣也再次強調了村民的「無知」與「被動受害」的說法。

因此，一般所認為「鹿窟事件」作為台灣五〇年代「冤案」的代表性案件，小說此處的質疑顯然與後續的主流說法背道而馳。2012年，林傳凱的田野調查發現：受難者「陳皆得」口述指出，村民們「不知道共產黨」、以為「蓋手印就能分土地」就「傻傻蓋下去」的說法並不是事實，是在當時為了爭取補償、「一切為了平反」的脈絡下產生。¹¹⁴而這也可以應證本文的觀點：相較於受難者的回憶錄或口述史而言，小說透過與現實曖昧的指涉關係，較能脫離外在條件的制約，小說文體的特殊性，反而創造了更多的言說空間，為早期創傷見證的文學書寫留下獨特的寫實紀錄。

葉石濤曾自言：「我是一個懦弱與膽小怕事的人。我不怕死，但我怕『事』，所以我一向是採取『旁觀者清』立場的人。」¹¹⁵因此即便葉石濤否認參與地下黨的運作，也不同意左統友人的政治主張，但葉石濤「旁觀者清」的立場，也影響小說的布局——「簡阿淘」以一個旁觀者的視角，記錄下左統支持的理念與行動。這些人物包括〈紅鞋子〉中主張團結「祖國」群眾與台灣群眾推翻舊軍閥的台人「辜雅琴」、「老洪先生」、被捕入獄的「龔梨花」，以及其餘小說中明示或暗示參與地下黨組織運作的小說人物。如此，「旁觀者」不再「清」，這意味著原先

¹¹² 聯合報：「42年前圍剿鹿窟叛變 指揮官：錯了」第六版，1994年7月9日。

¹¹³ 聯合晚報：「鹿窟受難者 現身爭補償」第十二版，1999年7月30日。

¹¹⁴ 林傳凱：〈「大眾傷痕」的「實」與「幻」——探索「1950年代白色恐怖『見證』」的版本歧異〉，《歷史台灣》第7期（2014年11月），頁35-81。上述引用訪談的口述內容出自於頁56-57。

¹¹⁵ 葉石濤：《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頁57。

的「旁觀者」展開書寫，其行動本身即是具「選擇」的言說行動。書寫行動本身，已不再是如同表面上所見之「保持距離」、「置身事外」，而是由被動轉為積極，以實踐其立場主張的方式，體現了作者以文學形式積極介入並重塑集體記憶的一次嘗試，可以作為回應葉石濤自身「憂慮」的實踐。



二、重返記憶領域：蔡德本及其自傳小說

1994年，蔡德本先以《台湾のいもっ子》於日本出版¹¹⁶，隔年，才由台灣遠景出版社出版中文本《蕃薯仔哀歌》¹¹⁷，這是蔡德本自戰後噤聲以來，重新返回文壇的一次努力。作為倖存者，他選擇以自傳小說的形式記錄下親歷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記憶。在第六屆府城文學獎（2000年）的得獎感言中，蔡德本述說了他自戰後以來，因白色恐怖而中斷創作的歲月，以及在七十歲時重新執筆完成《番薯仔哀歌》重返文壇的歷程。與葉石濤相同，蔡德本也作為跨語世代的作家，曾於五〇年代因牽涉地下黨政治案件而入獄；身處在戰後日語創作空間的禁絕，以及白色恐怖的肅殺氛圍中，他曾一度成為了「文學的逃兵」。受到葉石濤的鼓舞：「文學沒有永遠的逃兵」；終於，這位「逃兵」重返回營，再次投身於台灣文學的創作領域中。¹¹⁸九〇年代之後，蔡德本以自傳小說的形式投入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記憶的生產。

回顧蔡德本受難的經歷。1954年9月，蔡德本從美國公費留學回台後任教於東石中學，隔月，10月3日即被逮捕。蔡德本被捕的原因與1954年2月被捕的張璧坤與葉松城等人的「台大法學院支部」案有關。蔡德本與張璧坤同鄉，根據蔡德本的「主觀推測」，可能是自新辦法，使得張璧坤指出蔡德本曾於其家中

¹¹⁶ 蔡德本：《台湾のいもっ子：日本語で書かれた戦後台湾本省人(いもっ子)の隠された悲劇》（東京：集英社，1994）。

¹¹⁷ 蔡德本：《蕃薯仔哀歌》，台北：遠景，1995年11月。

¹¹⁸ 蔡德本：〈第六屆府城文學得獎感言〉，《番薯仔哀歌》（台北：草根，2008年4月），頁548-549。本書原出版於1995年。蔡德本：《番薯仔哀歌》（台北：遠景，1995年11月）。本書主要採後者最早之版本。

觀看毛澤東書籍，後來才改口，因此蔡德本才得以被「輕判」十三個月。¹¹⁹《蕃薯仔哀歌》與葉石濤的小說的狀況相似，「蔡祐德」同樣作為蔡德本的小說投射：「本書不過是根據個人的親身體驗，以小說形式描述出其中的一部份」¹²⁰，據蔡德本的口述史料，不難發現小說本身與蔡德本的遭遇具有高度的自我經驗的指涉。包括「蔡祐德」師院組織的「台語劇社」的始末、公費留美經歷、上述遭遇「栽贓」的過程；小說中與現實同名的人物，如同鄉「李水井」（「學委會」案之李水井）、「周慎源」（四六事件前師大學生自治會長）；以及影射現實的小說人物，例如牽連「蔡祐德」入獄的「張玉坤」（影射張璧坤，為「省工委會台大法學院支部案」涉案人）等。這些情節內容、小說人物與其自身的口述史本身並沒有太大的出入；然而，小說的出版卻比其口述史的公開早了數年之久。

《蕃薯仔哀歌》對於地下黨的呈現，包括其思想與行動、受難者內心說／不說的掙扎，以及複雜化「受難者」的概念。以下分述三項。

其一，小說並不避諱地呈現其「共產黨」之身分與經驗。觀察小說如何再現後世認為是五〇年代「冤案」典型的「鹿窟事件」：

有一天，幾個被特務追捕的青年，逃到了這小小的世外桃源。親切純樸的村民，給他們住，又給他們食物吃。……日久以後，逃來這裡的人數急遽增加。可是這些逃亡者並不是只白吃飯，他們和村民在田里工作，在生活上打成一片。在智識上，也有不少貢獻。村民對這些逃亡青年抱有好感。尤其是，他們為了更好的國家而努力奮鬥甘願犧牲的熱情，更使村民們感動。

逃亡者中有一些積極活動的人，對村民講解平易的馬克思主義，並開始吸收村民加入共產黨。黨員數目成幾何級數的激增，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

¹¹⁹ 藍博洲：〈一刑下去沒有也變有——蔡德本訪談錄〉，《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師院部分）》（台中：晨星，2000年4月），頁253-283。本處討論蔡德本的自傳小說，援用其說，但此處亦強調這是蔡德本的「主觀推測」，因此這樣的說法可能是片面的。關於張璧坤的部分，請參照許雪姬、楊麗祝訪問；林建廷、林志晟、柯庭如、辛佩青、辛佩宜、洪瑋伶、游淑如記錄：《承擔家變：白色恐怖下的朴子張家》，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2020年7月。

¹²⁰ 蔡德本：《蕃薯仔哀歌》，頁11。

很快地把全村赤化了。村長、校長、教員、農民以及當地唯一的一個駐警也加入了共產黨。連那個智障兒陳石也被勸誘參加。

伐木工人周水也加入了。他年輕力壯，成為青年團的中堅分子而積極的活動。此外，他又是武裝保衛隊的先鋒隊員。(頁 209-210)



小說中所述的鹿窟事件不同於普遍認為的村民處於無知、被動的狀態。相較於葉石濤前作中以「懷疑」的角度來看，小說更直接探討了村民在鹿窟事件中加入共產黨的動機、意願及其行動。

其二，小說也呈現受難者內心說／不說的掙扎。小說暗示，受難者以「冤」定調的說詞，實際上包含了他們試圖掩藏的部分，因此這些說詞並不完全可靠。例如小說中的黃金火在軍法處與蔡祐德同囚房，並向他解釋其入獄的原因：

「排錯鉛字，變成反共投俄。」

佑得聽不懂其意，還是劉龍頭替他說明：

「他把反共抗俄的『抗』字誤植為『投』字，變成反共投俄。他被控到處張貼反共投俄的宣傳單。」

「只是這樣……」

佑德似乎難以相信，只誤植一個字就被送到軍法處來。

可是金火默默地點頭肯定。(頁 233)

此處小說凸顯了白色恐怖是「多麼的荒唐」；然而，作者似乎在小說中以「金火默默地點頭肯定」作為隱諱異常的描寫，預留下了伏筆。直至黃金火被處刑，造成「難友很大的衝擊」，「以為最輕不致於死的人，現在也不能放心了」(頁 327)；小說後來才透過周水的說明解開金火所掩蓋的內幕：

「金火的父母早就過世。有一個哥哥，常常毆打金火。阿龍哥像父母一樣地照顧金火，雖然年紀只比金火大不了十歲……」

此人可能是最疼愛金火的人了，難過他成為金火的偶像。他說什麼，金火就做什麼。

「阿龍哥以後自己開了一家印刷店，當然金火跟他走。然而，有人託他印了反政府的傳單。」

如佑德所料，金火不只是排錯鉛字而已。他以第四條幫助罪起訴的疑問也解開了。(頁 276-277)



小說在此處凸顯受難者自身解釋的不完全可靠性，作者透過小說呈現受難者內心「說」與「不說」的掙扎，暗示讀者：這些看似簡單的解釋背後，可能隱藏著更多被刻意掩蓋的部分。小說以然暗示「純冤」為定調的說詞並不全然可靠。

其三，蔡德本的小說顯然更加深刻地思考了「受難者」這一概念。小說中呈現的「受難者」身份、入獄原因和形象更加多樣化。不同於常見論述中，時常將戰後加入地下黨的人簡單地定調為「理想主義者」，小說並不僅僅呈現「共產黨人」的理想性，而是進一步拒絕將所有共產黨員等同於理想主義者的盲目崇拜，並且抗拒對他們的本質化認識的刻板印象。例如：小說的彭姓政治犯「彭龍頭」，作為「從大陸冒著生命危險來台工作的地下人員」(頁 149)，相較於貪汙腐敗的國民黨而言，「更富有正義感，也更有愛國的熱情」(頁 152)。然而，小說也不僅止於呈現「共產黨」身分者的理想主義色彩，並拒絕同質化五〇年代「共產黨」等同於理想主義者的刻板連結。例如小說也呈現「共產黨」員也具有投機者：小說呈現作為共產黨的「間諜法官」，透過故意判死自己的共產黨員同志，使「人們怨恨政府」(頁 240)。因此，小說透過「蔡祐德」指出，並非所有加入「共產黨」者皆作為理想主義者：「任何黨都有好人，也有壞人」(頁 242)。顯然地，小說中所呈現的「受難者」形象並不滿足於既有的「理想主義者」的主流定位，而呈現出更具有多樣性和複雜性的個體及其動機。

《蕃薯仔哀歌》在呈現受難者的樣貌可謂是更加的複雜，彰顯受難者游移在說與不說的心理掙扎，同時也促使讀者複雜化一切「受難者」等同於「理想主義」者的扁平化思考。

小結

本章從首先勾勒「台共」與「中共」一詞在台灣戰後至 1990 年代的發展與轉換，此一過程說明了「中共」在發展過程中，逐步地與「台共」區別，並隨著台灣主體性的興起，自 1980 年代末期以來，「台共」一詞逐漸被建構為「可哀悼」

的對象，而這與「中共」始終為「不可哀悼」者、被「雙重排除」的生命截然不同。循此背景，聚焦在葉石濤「簡阿淘」系列的部分文本與蔡德本《番薯仔哀歌》，這兩部作品作為解嚴後初期呈現中共地下黨的小說文本，首先勾勒出其時代的感覺結構——離「國共內戰」框架未遠，並逐漸形成「反併吞／侵略」框架的過渡階段。在挖掘台灣悲情歷史、重塑抵抗外來政權的台灣主體性的關鍵時刻，兩人皆意識到：其親身經歷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和目睹的中共地下黨案件中的諸多受難者，卻與當下被視為「敵人」的中共身份交織；本文也透過兩人的創作動機分析，顯示他們意識到了這種緊張關係。相較於前行研究中指稱口述史或回憶錄中因外在社會條件制約而可能出現的自我修飾、避重就輕，本文透過文學作品的聚焦，發現自傳性小說得力於與現實間曖昧的指涉關係，反而創造了更多作者表述自身經驗和目睹場景的言述空間。換句話說，文學作品在此刻成為反抗集體記憶同質化和「冤假錯」扁平化認識的一股逆流。無論是簡阿淘在《台灣男子簡阿淘》中隱約對「鹿窟事件」作為冤假錯案的懷疑，還是《番薯仔哀歌》中直指鹿窟事件中村民參與共產黨的意願與行動，這些說法皆與後世所普遍認為「鹿窟事件」是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冤假錯代表案件的歷史認識背道而馳，並與後來林傳凱透過田野調查所發現的結果遙相呼應。這也印證了本章起初的主張：倖存者見證文學具有獨特的寫實層面。

劉亮雅對於賴香吟小說的文本分析，藉由來自史畢瓦克的啟示，指出有別於七〇年代白色恐怖既有關注的「英雄敘事」，賴香吟重新關注缺乏敘事權、被消音的「底層人民」，她指出賴香吟小說刻劃了「在後殖民國家主義和殖民體制舊勢力兩邊陣營內部的差異、由後者轉向前者的可能或不可能、以及兩邊中間的模糊地帶」(頁 39)¹²¹；同樣地，可以認為處葉石濤與蔡德本的小說，以「旁觀者」的角度，記述了這些被「雙重排除」、無法發聲、被剝奪敘事權的「底層人民」受難者。自傳小說的文體在此階段拓展了逸出於現實的言說空間，文學於此一時期得力於現實與文學作品的曖昧性，反而促使倖存者得以留下現實中未必能言的早期見證，這種獨特的寫實層面須考量到文學鑲嵌於與現實社會中框架轉換間的

¹²¹ 劉亮雅：〈遲來的後殖民：賴香吟解嚴小說中的知識菁英和底層人民〉，《中外文學》第 39 期第 4 卷 (2010 年 12 月)，頁 7-43。

雙重對抗關係，並進一步揭示了此一時期文學在介入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記憶中的重要作用。

此時期的自傳性小說文本具有一個共同點：小說的主角往往是無辜被牽連的人物，且這名主角與作者本人有高度的互相指涉關係，這不僅是本文通過對比作者的口述和小說情節所得出的結論，也是作者本人所承認的事實。然而，我們可以做出以下推測，指出這一現象至少給予讀者幾項「意外」的心理暗示：作為小說貫穿的主軸，它在讀者理解小說時具有聚焦的核心作用，而這可能是導致前行研究多以「大多屬冤、假、錯犧牲者」的詮釋框架來理解小說本身，從而忽略了旁觀者見證其他人自願加入共產黨的身份與行動等原因。此外，貫穿小說的主角敘事主軸，已經顯現出早期冤假錯敘事結構的雛型：不論是簡阿淘還是蔡祐德，他們被無故帶走、被迫認罪、經他人定罪等情節，都能在小說中得到應證；而小說以「簡阿淘」而非「葉石濤」、「蔡祐德」而非「蔡德本」作為主要敘事軸線，模糊了代表作者本人的受難經驗的獨特性，並在某種程度上暗示了同時代人的普遍經歷，一種「冤假錯」的普遍性暗示。

考慮到葉石濤與蔡德本的作品在當時獲獎與群眾支持的背景，這些作品作為具有影響力的文本，或許在九〇年代冤假錯敘事的生成上奠定了一定的基礎。這種側重於「冤假錯」主軸的小說關注層面，也在書寫當下的時代脈絡——台灣主體建構的過程中得到強化與鞏固。往後，隨著 2000 年後政黨輪替的政局發展，書寫者們同樣意識到「冤假錯」作為主聲道並逐漸體制化的趨勢，回應了台灣歷史書寫的新反省與檢討。這也將是我下一章探討的內容——台灣文學書寫者肩負起複線化思考台灣重層殖民歷史、既定敘事結構的使命，這也開啟了一個嶄新的文學趨勢。

第三章

敘事遺產的繼承與反思（2000-2010）：

多線性文學的反敘事策略



2000 年是一個關鍵的歷史時刻，也是台灣文學史中重要的分節點。

就政治事件而言，中共對台的威脅與日俱增。三月十八日，陳水扁與呂秀蓮當選第十任總統及副總統，民進黨首度成為執政黨。這也象徵著台灣民主政治邁入新的階段——新興民主體制首次政權交替，而國民黨支配性的地位可能也走入了歷史。¹²²然而，中共對台威脅不減反增。朱雲漢的觀察指出，當時北京領導人對於民進黨的「台獨」定性已經相當牢固，故在此變局中兩岸關係的發展並不容樂觀。¹²³有跡可循的是，早在選前三日（3 月 15 日），中共總理朱鎔基即針對台灣總統大選及陳水扁候選人發表強力且嚴厲的警告，表示中共不容許任何形式的台灣獨立，我方陸委會反駁中共無權對我總統選舉指指點點¹²⁴。這也顯示了中共對台灣總統大選的不安，而試圖以恫嚇的方式干預選舉的結果。此時期，當談論文學中的「中共地下黨」時，不能遺忘中共威脅與日俱增的外在環境。

就台灣文學史的發展脈絡而言，在既有的台灣文學史論述中，雖然部分論者選擇以 2000 年或新世紀作為分界點，但以政黨輪替之政治事件作為觀察視角的闡述尚不多見。¹²⁵但多已指出了 2000 年後台灣主體性意識高漲，出現許多以地

¹²² 朱雲漢：〈台灣民主新的紀元 兩岸不確定的未來〉，《聯合報》（2000 年 3 月 19 日），第十五版。

¹²³ 朱雲漢：〈台灣民主新的紀元 兩岸不確定的未來〉，《聯合報》（2000 年 3 月 19 日），第十五版。

¹²⁴ 聯合報：「一周大事」第六版，2000 年 3 月 19 日。

¹²⁵ 例如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中，在最末一節「迎接新世紀的文學盛世」中，雖然論及了新世紀台灣文學的發展，但僅聚焦在出生在 1980 年以後的年輕世代作家，2000 年的意義在於其展露頭角的時刻，而未提及政黨輪替一事。但構成新世紀台灣文學樣貌的內涵，不僅僅是這些年輕作家，傳統文學書寫者的創作仍然不輟，然而對於 2000 年後傳統文學書寫者所經歷的轉折影響，

誌書寫、國族寓言，以探討台灣土地上百年歷史記憶的「鄉土小說」（或稱之為「新鄉土」、「後鄉土」）¹²⁶——這些作家經歷本土化、政黨輪替與後學思想的洗禮，轉以更為後設、魔幻寫實的筆法呈現出新的文化及美學樣貌。¹²⁷可以認為，2000 年後台灣文學的書寫場域迎來了一系列本土化的轉折，探討台灣百年歷史記憶的小說開始蔚為盛行，而 2000 年的政治事件之政黨輪替具有標誌性的意義，作為本處劃分文學階段的重要標誌。這項主要的特徵，也反映到本章所選用的小說文本——不論是《藤纏樹》、《海神家族》、《朝顏時光》，這些小說都不約而同地由「當下」的某項契機追溯過往，並以「百年」台灣歷史作為其主要書寫方向。

在本文所關注的「中共地下黨」議題中，文學發展有另一項重要的轉變——這個時期是接收前人「遺產」的時刻，也就是奠基於九〇年代年代口述史和回憶錄所提供的資源。從小說中，可以看到文學書寫者有意識地與前人所遺留的歷史材料對話，《朝顏時光》中提及《白色恐怖黑暗時代》、《白色恐怖受難者自述》、《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白色恐怖受難者手記》；《藤纏樹》中提及的《幌馬車之歌》、《安全局機密文件》；以及陳玉慧自言，在撰寫《海神家族》時「我必須自己找資料，也使我讀了許多台灣民俗及歷史、人物回顧」。在上述的材料當中，不少屬於一般認為的口述史的材料，而這些材料又被認為複製了某種相似的敘事結構。本章將指出，文學書寫者並不滿足於繼承這些「遺產」的敘事結構，並發

討論較為缺乏。陳芳明認為，新世紀登上台灣文學舞台的年輕世代作家（1980 年代出生）所具有的共同特質，包括出生於網路時代、晚期資本主義階段的消費文化、以及民主文化臻於成熟的背景；加上少子化卸去了傳統家族情感的包袱，因此「無論是歷史意識或政治意識，都沒有像從前的經歷那樣沉重壓在他們的生命」，「在他們的思考中，並不把統獨對立、藍綠對決視為生活的重心」。而這些特質反映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表現出屬於該世代獨特的人生觀與世界觀。然而，自 2010 年以來，隨著太陽花學運等政治事件，下一個文學階段的面貌將有別於陳芳明此處的觀察，關於這一點將留待下章探討。參見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下）》（新北：聯經，2020 年 10 月），頁 796。

¹²⁶ 例如劉亮雅：〈女性、鄉土、國族——以賴香吟的〈島〉與〈熱蘭遮〉以及李昂《看得見的鬼》為例〉，《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9 期（2009 年 10 月），頁 7-36。也可以參見范銘如：〈後鄉土小說初探〉，《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11 期（2007 年 12 月），頁 21-50。

¹²⁷ 涂書偉：〈新世紀台灣文學的展望〉，洪淑玲等人，《台灣文學史讀本》（台北：五南，2024 年 4 月），頁 282-283。

展出獨特的「反敘事」策略，分別為：後設小說、複眼敘事、穿越時空三項（分別對應至本章一至三節），是為以書寫形式抵抗既定敘事結構、複雜化歷史的一次挑戰行動。本章以「多線性文學」指稱上述類型的小說，因其在小說中皆透過多層次、多視角的藝術特徵，作為抵抗既有敘事結構的策略。

針對上述所謂奠基於九〇年代敘事結構——作為文學書寫者的反抗對象，可以更具體的說明如下。林邑軒藉由九〇年代口述史文本指出，那些在五〇年代以「參加叛亂組織」或「意圖顛覆政府而著手執行」為案由的政治案件，其本省籍受難者的口述歷史具有高度雷同的敘事結構與事件排列，一種「冤假錯」的敘事結構。這些事件排列包含：光復後的期待與幻滅、二二八的鎮壓與不滿，隨即跳到五〇年代後，「莫名其妙」被叫去問話、刑訊逼問是否加入共產黨、強制認罪、經由他人定罪、出獄重回社會後被戴紅帽子等。¹²⁸這樣的冤假錯敘事結構在九〇年代的口述史文本中反覆出現並逐漸奠定，然而也伴隨著其自身的盲點。文學書寫者一方面繼承這些口述史的敘事遺產，一方面也欲與此既定的結構對話／抗。

在初步掌握這段時期的背景後，能更清楚地理解當時文學書寫者所欲對抗／話的對象。本章欲提問，當台灣主體意識的高漲、中共威脅上升的 2000 年代，對於那些書寫百年歷史的文學書寫者而言，當觸及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中關於中共地下黨的政治案件時，會於文學作品中如何呈現？是否同於既有的解釋模型——僅是受制於自九〇年代以來逐漸體制化的「冤假錯」敘事？抑或以文學的獨特的敘事模式，試圖抵抗、複雜化歷史本身，以介入集體記憶的型塑？本章所選擇的文學文本：藍博洲《藤纏樹》（2002）、陳玉慧《海神家族》（2004）以及米果的《朝顏時光》（2008），皆是在這個背景下所生產的小說。本文認為，若回顧 2000 年後台灣文學的歷史書寫，有別於既有的解釋模型，諸多文學書寫者早已意識到上述體制化「冤假錯」的扁平化歷史敘事的問題，文學反而乘載著複雜化歷史、肯定異質受難者的積極使命，各自在文學實踐中嘗試著「反敘事」策略。這些小說的共通點在於：文學書寫者往往透過某種「當代」的契機回顧並檢討歷史敘事，

¹²⁸ 林邑軒：「第一章 導論」，《來自彼岸的紅色浪潮：從意義中介視角重構戰後初期「省工委」的地下革命行動》，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頁 8。

並各自發展出獨特的「反敘事」策略，分別為後設小說、複眼敘事、穿越時空三項策略，藉此抵抗線性、單一的敘事模式。



第一節、後設小說：藍博洲《藤纏樹》的多層對應關係

藍博洲的《藤纏樹》¹²⁹是他第一本出版的長篇小說，「後設小說」是小說敘事的特色。「後設」意指小說中多層次的文本結構，呈現「書中書」的敘事形式。

《藤纏樹》的內容，是以青年「阿里」尋訪竹頭庄的歷史作為起點。阿里為竹頭庄人，但已然定居在台北十餘年。一次，受到好友「阿立」（竹頭庄文史工作室負責人）村史寫作計畫的邀請，才在數隔十餘年之後重返竹頭庄，並展開了客家山歌的調查工作。然而，在調查的過程中，阿里意外透過鄉村耆老之口，得知五〇年代「林明華」因涉匪諜案而遭銃殺的歷史事件，心生好奇，轉而調查起該案件的始末原由。阿里透過訪談事件相關倖存者及其遺族，決定將林明華的生命故事寫成小說「藤纏樹」¹³⁰。整本《藤纏樹》共分文三大章，分別是尋訪、閉關與終場，「尋訪」為阿里進行田野調查的紀錄，「閉關」為阿里正式投身寫作「藤纏樹」的過程，「終場」為阿里寫成以後，在竹頭庄發表的情景。整本《藤纏樹》除了以阿里調查事件作為全書主軸外，在「閉關」一章當中，也穿插著阿里所寫、共四十一節，與本書書名相同的小說「藤纏樹」，整體而言，呈現「書中書」的敘事形式。

一、藍博洲的後設小說：是「逼近」真實？還是「看似」真實？

藍博洲的《藤纏樹》，很直覺地令人聯想到「後設小說」的創作手法。一般而言，「後設小說」會呈現高度文體的自反性（*reflexivity*），亦即創造一則「小說」的同時，又對這個小說的「創作過程」進行陳述，換句話說，後設小說是一種自

¹²⁹ 藍博洲：《藤纏樹》，台北：印刻，2002年6月。

¹³⁰ 為了便於區隔作為藍博洲作品的《藤纏樹》與小說中阿里所寫的小說「藤纏樹」，以下以標點符號做為區隔：《藤纏樹》表達前者，「藤纏樹」表達後者。

覺地強調小說作為人工製品 (artefact) 的寫作形式¹³¹。後設小說伴隨後現代理論盛行而成熟,因此後設小說在文學形式的意義而言,是對於寫實主義小說客觀「再現」(representation) 的反諷與嘲諷¹³²。但藍博洲小說獨特之處,如須文蔚所說,「藍博洲顛覆了後設小說的主旨,執意要透過小說逼近真實」,《藤纏樹》在後設敘事當中暴露「現實」的建構過程,也討論小說創作、報導文學、口述資料蒐集的技巧與倫理,並批評被政治現實左右的地方文史工作;於是,須文蔚評論《藤纏樹》這部作品「超脫了政治的羈絆,穿透了台灣的歷史時空」,須文蔚的評論彰顯了《藤纏樹》逼近歷史真實、超脫政治框架的一般性解讀。¹³³這樣的說法其實並不少見,范宜如也肯定《藤纏樹》的藝術手法,得以超越意識形態框架,呈現人性更真實的面貌。¹³⁴這些評述既已指出《藤纏樹》的後設手法,卻同時肯定《藤纏樹》超脫意識形態框架的面向。然而,這樣的說法尚值得重新商榷。

實際上,早在九〇年代,陳芳明早已指出藍博洲的寫作存在「意識先行」的問題,在藍博洲的筆下,不僅「在歷史事實中,有文學想像;在田野調查裡,有虛構的情節」,且他筆下的英雄人物都具固定的思考框架,都是民族主義者,且支持中共社會主義路線的政治運動者;而藍博洲也刻意忽略中國的紅色恐怖政策,這是他的意識形態或主觀觀點先行於事實本身,影響了對事實的選擇和詮釋。¹³⁵雖然《藤纏樹》在陳芳明評論時尚未出版,但陳芳明的判斷準確,透過以下的文本分析,我們仍能強烈地在《藤纏樹》中看見類似的問題。以下文本分析說明。

小說中的阿里先是經由田野調查,才將「林明華」的故事寫成「藤纏樹」,並易名為「邱明華」。在「藤纏樹」中,邱明華出生在日治時期為被地主剝削的佃農家庭,他的父親邱天送積極投入台灣農民組合的左翼抗日運動,最終因刑訊

¹³¹ Patricia Waugh. *Metafic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lf-conscious fiction*. Routledge, 2002.

¹³² 黃清順:《「後設小說」的理論建構與在台發展:以 1983-2002 年作為觀察主軸》(高雄:麗文, 2011 年 12 月),頁 454。

¹³³ 須文蔚:〈從後設中見現實糾葛〉,《中央日報》第十七版,2004 年 2 月 19 日。

¹³⁴ 范宜如:〈邊緣發聲:藍博洲《藤纏樹》的書寫策略及其意涵〉,《人文集刊》第 5 期(2007 年 7 月),頁 141-159。

¹³⁵ 陳芳明:〈白色歷史與白色文學——葉石濤與藍博洲筆下的台灣五〇年代〉,《文學台灣》第 4 期(1992 年 9 月),頁 233-240。

過度死於牢獄中。儘管邱明華從小與父親疏遠，但他成長在佃農家庭，加上學校教育中受到日人歧視的經驗，「藤纏樹」透過上述描寫，即早就為邱明華日後思想左傾、參加中共地下黨、投入階級鬥爭的「人設」做了早期的鋪墊。《藤纏樹》中，在阿里寄給阿靜的信件，有對於上述邱明華的角色設定進行說明——事實上，這樣的角色設定並不是阿里最初的構想，最初的構想是「兩條平行線」的敘事手法：

一條線是工作室執筆者「我」的採訪記事，以及「我」針對各種材料的分析、討論與感想；另一條線則是各種歷史見證者的口述證言，以及他們因為回憶往事而觸動的主觀感情的波動……。（頁 202）

隨後，阿里摘要了最初構想、總計二十章的初版「藤纏樹」大綱¹³⁶。在這個最初版本中，「藤纏樹」中所呈現邱明華／林明華的故事，更接近《藤纏樹》「尋訪」一章中，阿里所採集的田野資料。然而，阿里很快放棄了原先的構想，選擇以「寫實主義」的筆法重新寫作，才出現上述「藤纏樹」版本中邱明華的人物設定：

現在，我把原先寫了大約三萬字的稿子統統撕毀；同時決定放棄原先的結構。就按照傳統寫實主義小說的寫法，從小說主角邱明華的出生寫起（與此同時，我把他的出生背景放在一個抗日的佃農家庭——他的父親邱天送曾經參加農民組合，後來病死於日本人的監獄當中。）然後，就按照編年，逐步描寫邱明華的成長、求學、反日……等不同歷史階段的生活。（頁 218）

有趣的是，如果將阿里在「尋訪」一章所蒐集關於林明華的田調資料，與阿里所寫「藤纏樹」中關於邱明華的形象相互對照，我們完全找不到任何支撐「藤纏樹」中描述邱明華的父親經歷（參與抗日）、童年身分（佃農子弟）的任何證據，甚至「藤纏樹」中描述童年的邱明華曾拿爛泥攻擊地主父子的情節（頁 232），更是完全基於阿里的想像。

這樣的落差值得思考。為何阿里（或藍博洲）會期待「林明華」這樣的角色是出生在貧窮、遭受地主剝削的家庭？這有兩種可能：第一，考量到「後設小說」

¹³⁶ 最初的「藤纏樹」各章綱要，請參照《藤纏樹》頁 206-211 的部分。

的形式，作家可能刻意安排了這個落差，以嘲諷寫實主義小說再現歷史的能力。但這樣的說法似乎無法得到證實，不僅在既有的研究當中已然指出《藤纏樹》具有藍博洲本人濃厚的自傳色彩¹³⁷（「阿里」是其從事歷史工作的縮影），而且在小說中也找不到任何嘲諷寫實主義小說再現能力的證據；相反地，小說中的後設敘事也表現出阿里極力地讓「藤纏樹」貼近歷史、表現真實，以及強調「寫實主義」小說價值性的一面。

那麼，只可能是第二種。實際上，藍博洲對於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書寫，從日治時期「被剝削」的生命寫起，是他「慣用」的敘事「公式」。如果翻閱藍博洲的著作，包括《幌馬車之歌》、《台灣好女人》乃至於後期的《春天》等，藍博洲的歷史書寫往往存在一個既定的模式：「在殖民地被剝削而覺醒左翼民族意識的台灣人→國軍撤台由歡喜轉而幻滅的台灣人→得知尚有另一個紅色『祖國』而自願加入中共地下黨革命運動的台灣人」，藍博洲的歷史書寫往往強調上述三項敘事的內在邏輯，這也正是藍博洲架構史觀的基本元素。於是，阿里作為藍博洲在小說中的替身，依循著一套相同的敘事邏輯，架構著林明華的生命故事，就顯得不足為奇——儘管完全沒有任何基於「林明華」童年家庭的田野調查資訊也無所謂。換句話說，在這套藍博洲所熟悉、期待的敘事邏輯作用下，他期待邱明華／林明華擁有某些「日據時期受壓迫」的經驗，從而成為逐漸啟蒙左翼思想的英雄人物，便得到了合理的解釋。

隨著時間推移，我們似乎看到更多人權記憶的相關資料。當我們得知林明華／邱明華的歷史原型是「第六機械廠小組傅慶華等案」時，更應證了上述文本分析的觀點。根據國家人權記憶庫的資料，傅慶華的「父親是自耕農，家境小康」¹³⁸，根本不是佃農子弟，家境也不貧困。這應證了前述陳芳明的批評，藍博洲「在歷史事實中，有文學想像；在田野調查裡，有虛構的情節」；此處，還可以進一步指出，藍博洲的《藤纏樹》，只不過是在田野調查裡得知了某些歷史素材之後，

¹³⁷ 可以參考范淑雲的碩士論文，她將「《藤纏樹》的寫作模式視為藍博洲早期田野調查歷史的身影，透過小說主角阿里的情感矛盾，投射於藍博洲自身曾遭遇過的困難，以為藍博洲將自身問題外化的一個故事」。范淑雲：《藍博洲及其作品研究：從小說創作到歷史書寫》，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頁138。

¹³⁸ 國家人權記憶庫：傅慶華。<https://memory.nhrm.gov.tw/TopicExploration/Person/Detail/3750>

再將這些不完整的素材套入自己所期待的敘事邏輯當中，彷彿「套公式」一般。因此，前述須文蔚等人所說，《藤纏樹》的寫作手法得以逼近歷史、擺脫歷史框架的說法，可能還需要稍作調整：與其說《藤纏樹》的寫作手法得以「逼近真實」，不如說是「看似真實」更為恰當，作者透過在後設敘事當中引入史料與田野調查的描寫，藉此增加「說服力」，而使讀者感受到「看似真實」的效果；另一方面，藍博洲也根本沒有掙脫意識形態框架的束縛，他反而陷入了自己所期待的、另一個意識形態框架之中而已。

二、何以「後設」？遁入多重錯位與虛實交錯

儘管藍博洲的歷史敘事未必完全反映真實，書中改寫過後的判決書，與保安司令部的歷史檔案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意味著藍博洲的歷史書寫亦有所本，想必他也掌握了某些歷史材料，但也難掩他自身鮮明且過度介入的歷史觀點。

儘管如此，《藤纏樹》獨特的敘事手法仍然值得注意。如果藍博洲只是想讓文本「看似真實」，他完全可以採用其他文體形式（例如他熟悉的報導文學）。之所以選擇這種形式，是因為「中共」受難者的敏感身份有關：藍博洲通過使用「後設」文本，使小說人物在多重對應、錯位的改編中拉開與現實政治的距離，從而更好地呈現他所欲傳達的歷史敘事。

關於「直接」陳述一段中共受難者故事的困難，在《藤纏樹》中有所交代。

其一，是撰寫調查五〇年代的故事，不見容當時正趨興起的黨外勢力與公眾視野。小說透過阿立與阿里的對照，暗示了讀者這點。小說中的阿立（竹頭庄文史工作室負責人）擁有濃厚的「黨外」色彩，高中輟學以後就在黨外雜誌工作，也靠著幫助黨外候選人設計文宣賺取生活費，阿立也隨著「認識台灣」的風潮，開始挖掘家鄉歷史的資料（頁 40）。在竹頭庄文史工作室申請到經費後，阿立邀請阿里前來編纂文化誌的工作。起初，當阿立聽聞林明華的故事時展現出濃厚的興致¹³⁹；然而，當阿里在工作室匯報調查成果，阿立得知林明華為共產黨員後，

¹³⁹ 阿立與阿里強調了兩次可以透過村史的寫作機會，「順便查訪一下有關於林明華的事情」。分別在《藤纏樹》頁 32 與頁 35。

隨即「流露出一種阿里不曾見過的怪異神情」，並告訴阿里林明華的故事無法列入竹頭庄文化誌的編纂計畫中，解釋道：

你想，他是一個共產黨員；可我們的經費卻是賈明進議員募來的；他的政治立場是反共的台獨派。你認為他可能把一個共產黨員寫進他出錢支持的地方史嗎？（頁 117）

這也導致阿里日後退出文史工作室的工作，並逐漸與阿立分道揚鑣。「阿立」在小說中的設定，代表著藍博洲所「主觀」認知當時黨外文史工作者的形象：對於台灣歷史感到熱情，但當觸碰到「共產」身分時又轉而排斥的人物形象。

藍博洲也透過小說中的倖存者「余聲潤」之信件，指出五〇年代受難者不受到當時公眾的接受與理解的處境：

八〇年代以來，台灣社會對政治犯的態度跟以前比起來，的確是有著截然不同的轉變；可是不諱言，這樣的對待其實只是針對美麗島事件的部分受難人而已，並不是全面的。像我們這樣的五〇年代的政治犯，儘管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下，人們也有了相對友善的眼光；可一旦他們理解到我們當年的思想傾向的時候，我們同樣還是會遭到不被接受的排斥的！即使對方是自己的至親好友……。（頁 96）

余聲潤的信件指出，儘管社會風氣已有所轉變，但五〇年代的政治犯依然受到排斥。透過小說情節的安排，「阿里」在調查與書寫過程中所遇到的困境，作者已然勾勒出整體的書寫氛圍，我們可以得知：在這樣的背景下，直接書寫中共地下黨受難者的敘事顯得尤為困難。

其二，當書寫者毫無保留地呈現某段故事，有可能影響到當事人及其家屬現實生活中爭取補償。小說中，在阿里寫給阿靜的信裡，除了表露擔心人們因其創作「藤纏樹」而被歸類為「親共份子」之外，更擔心的是，影響到林明華的家屬申請補償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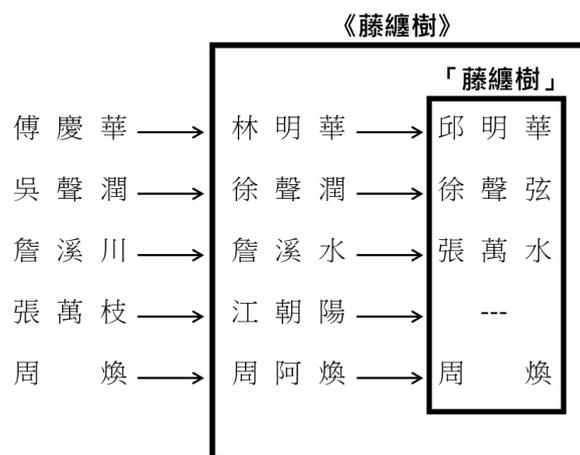
就是因為這種害怕被整個社會的集體意識排斥的想法，使得我在寫到邱明華自製手榴彈的那節時，躊躇再三，不知如何下筆。（我更擔心的是，我若

據實把它寫出來，以後影響到林明華的親屬申請即將通過的政治受難補償金。)(頁 502)

由於「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審判暨匪諜案件補償基金會」所提供的補償機制，限定對象為「冤屈者」，對於從事武裝、或參與地下黨的「確有實據」者，則不在補償的範圍之內。¹⁴⁰因此阿里在書寫其採訪林明華及相關倖存者時，對於是否該呈現出林明華／邱明華曾於赤柯山試爆手榴彈一事感到遲疑。

綜合上述兩項所述，指出當時黨外勢力與公眾視野對「共產」身份的排斥，以及書寫者基於避免阻礙當事者申請補償，而在直接書寫面臨的困境。在上述外在環境與制度因素等作用考量之下，可以更好的回應「何以後設」的這項提問。

若將小說情節與「第六機械廠小組傅慶華等案」相互參照，可以發現在多層次的文本中，人物間多層的對應關係。根據保安司令部的檔案紀錄，傅慶華在台灣鋼鐵機械公司工作期間，曾經組織工人爭取工資，並擴展組織、提高工人政治意識。1949 年，傅慶華吸收了同場技術員吳聲潤、同廠技工詹溪川，和樟腦局工廠工人周煥，以及台北鐵路局工務處的張萬枝等人加入組織，並成立支部，由傅慶華擔任書記。¹⁴¹若與《藤纏樹》的小說情節相互參照，可以整理出檔案與小說人物的對應關係，如下圖。



¹⁴⁰ 台灣人權促進會：〈不義審判 彌過唯誠 「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評論與分析〉(1998 年 12 月 21 日)，<https://www.tahr.org.tw/publication/777>。

¹⁴¹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檢呈傅君等一案卷判。1951 年 3 月 22 日。檔號：B3750187701/0039/15 71.3/1111/15/061。

藍博洲在《藤纏樹》中，透過改寫歷史檔案來創作角色，並在多層次的文本間呈現出複雜的對應關係。最直接可見的例子是余聲潤寄給阿里的判決書，該判決書完全由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的檔案改寫而來，並更改了名字¹⁴²。考量到「小說」文體本身的特殊性——並不具有爭取補償的訴求，但又擔心造成受難者爭取補償的阻礙，於是藍博洲反而透過獨特的敘事手法，設計人物多層次的文本中對應關係，使文本進入虛實交錯的曖昧情境，與現實政治保持距離，保留了更多自由言說的文本空間。無論是傅慶華、吳聲潤還是詹溪水，小說中的角色在多層次文本中形成了對應；至於張萬枝對應的江潮陽，因為阿里的採集線索中斷，資料不足，所以在「藤纏樹」中並未出現；至於周煥，小說中使用其原名（或相似於原名），若依據小說中阿里對「詹溪水」的訪談（頁 145），推測周煥已然在身分暴露後轉逃往中國大陸，因此較無上述社會現實的顧忌，但由於沒有進一步的檔案可供證實，也僅是透過小說情節，回推藍博洲所掌握的歷史資料。

綜合本節所述，藍博洲的歷史敘事具有其內在邏輯，往往為了契合他所理想的歷史模式，而在「空白」之處融入虛構的觀點。然而，透過小說與歷史檔案的對照可見，藍博洲的歷史敘事仍然基於其訪談經驗與史料掌握，具有一定的事實基礎。《藤纏樹》體現了小說文本的獨特之處：一方面小說文本並不具有爭取補償的實際訴求，一方面藍博洲也發展出獨特的敘事手法，透過人物多層次的文本中對應關係，使文本進入虛實交錯的曖昧情境，與現實政治保持距離，開創了更多自由言述空間。

第二節、複眼敘事：《海神家族》的跨時空敘事策略

如果對於《藤纏樹》的批評，是他刻意忽略中共後續的紅色恐怖，凸顯了藍博洲個人主觀意識形態的高度介入；那麼，《海神家族》所採用的敘事策略，可以說在講述五〇年代地下黨的故事之餘，又更有效地解決這項問題。相較於《藤纏樹》而言，《海神家族》在思考與呈現歷史複雜性的藝術手法又更為成熟。

¹⁴²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檢呈傅君等一案卷判。1951年3月22日。檔號：B3750187701/0039/15 71.3/1111/15/061。

《海神家族》是一部參雜虛構成分的混和式自傳小說，這從作者在小說最後所附錄的訪談內容可以映證，她說：「《海神家族》是基於我對家族真實情感，在這個基礎上做題材的增添或刪減，一部份是真實的家族故事，另一部份則在這個情感基礎上虛構出來，是一個混合式的自傳體」¹⁴³。可見小說內容具有作者本人經驗的基礎上，加以參雜虛構的部分，所構成的混合式自傳體小說。

這部小說以獨特的敘事形式引人注目。寫敘事者「我」在海外漂泊數十年後，返回台灣，挖掘並建構其家族自三〇年代以來的記憶，這些家族的成員包括：來自沖繩的外婆綾子、外公林正男、叔公林秩男、母親靜子、外省父親二馬，以及靜子的妹妹心如阿姨等。小說在不同的章節中，聚焦於不同的人物，以多重視角的形式交織起橫跨三大的家庭故事。這種獨特的敘事策略，本節稱之為「複眼敘事」。

一、《海神家族》與複眼敘事

敘事結構是這部小說的特點。在既有的論述當中，已指出小說中多線、多重視角的敘事特色。例如張瑞芬指出，小說透過不同人物呈現多線並行的敘事手法，各支線平均分布，沒有偏向任何一條線索，展現了旁觀與平等的凝視。¹⁴⁴陳芳明使用「複眼」來形容這種敘事手法，逐一描述小說中每位人物的婚姻，每條線各自發展，但在結尾產生了聯繫。¹⁴⁵陳芳明所提「複眼式」的說法可謂是十分貼切，但小說也不僅止於婚姻的描寫，各章節聚焦在不同人物的切入，同一事件呈現不同人物觀看的視角，如同「複眼」一般。就像是陳玉慧自己所描述的小說結構設計：「小說裡每個人物都像一顆寶石，我的結構便是把這些寶石串聯成一條項鍊」（頁 329），不同人物的敘事線，交錯拼湊出小說的故事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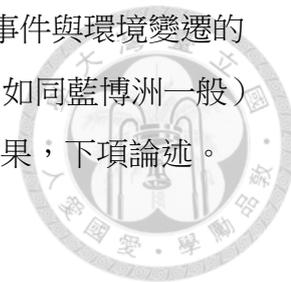
本處所謂的「複眼」可以進一步定義成兩個部分。第一，是「跨越人物視角」，第二是「跨時空視角」。前者已然前人多有論述，本處著重於後者。考慮到「中

¹⁴³ 陳玉慧：《海神家族》（台北：印刻，2004年10月），頁327。

¹⁴⁴ 張瑞芬：〈國族·家族·女性——陳玉慧、施叔青、鍾文音近期文本中的國族／家族寓意〉，《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10期（2005年6月），頁1-26。

¹⁴⁵ 陳芳明：《孤夜獨書》（台北：麥田，2005年9月），頁92-97。

共地下黨」主題的特殊性，跨時空視角揭示小說人物隨著政治事件與環境變遷的立場轉變，以及以多視角呈現「中共」的形象，從而瓦解了（如同藍博洲一般）對地下黨人的盲目崇拜。跨時間與跨空間敘事策略所達致的效果，下項論述。



二、何以「複眼」？跨時間與跨空間的敘事手法

進一步分析，所謂的「跨時空視角」，可以近一步地分成「時間」與「空間」二者，以下分別以「跨時間」與「跨空間」的敘事手法文本分析。

第一，小說以「跨時間」的手法，揭示了人物隨著政治事件與環境變遷的立場轉變。不論是人物所持有的立場，或是面對歷史創傷的態度，往往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動。小說時間跨度大，經歷戰前、終戰、二二八、白色恐怖等，直至解嚴與民主化後的台灣，政治背景不斷轉變，小說也刻劃出人物隨著政治事件與環境變遷所產生的變化。在台灣的歷史中，曾擁有地下黨經驗的人，隨著政治事件與環境的變遷，重新思考台灣的主體性，進而改變立場，成為推動變革先行者的例子並不少見。

小說中的林秩男，戰後初期參與共產黨的地下運作，在二二八事件期間加入二七武裝部隊，隨後又成為「台灣民組自治同盟」的成員。同盟中有人告訴他：「中共遲早會解放台灣，時日一到，我們便以游擊戰內應外合」(頁 113)。因此，林秩男藏身於埔里的深山，搜尋日本政府遺留在台灣的武器，為未來的革命起義做準備。之後，他輾轉逃往海外，最終定居巴西。小說細膩描寫了林秩男從「統」到「獨」的立場轉變，他在南美洲擔任「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FI) 的南美負責人(頁 303)。

小說將時空延展開來，不同於藍博洲基於主觀的「意識先行」，僅片面地呈現戰後初期混亂的政治局面，刻意凸顯「另一個祖國」的中共，卻忽略了其後來的恐怖統治。《海神家族》透過時間綿延的技巧，揭露了這些「革命者」隨著時代的變遷、視野的轉移，重新定位適用於「台灣」、具有主體性的理想變革模式。林秩男由戰後初期加入地下黨，直至海外投身反對威權運動，從「統」到「獨」的立場轉變顯而易見。《海神家族》通過「複眼」敘事，展現了戰後至民主化過

程中，投身反威權運動的有志之士，重新定位自身立場，尋求台灣主體性並發展變革的歷程。

第二，小說透過「跨空間」的手法，揭露了「中共」的恐怖統治，免去了對地下黨的英雄式盲目崇拜。小說中的「二馬」是一個良好的觀察對象。在小說中，「中共」在五〇年代許多台人的眼中，被謠傳為一股希望般的存在，他們擁有清廉、不貪污的形象，與戰後初期貪腐的國民黨政權形成鮮明的對比，於是：

「共產黨員個個清廉，來台灣的全是國民黨的貪官汙吏。」李清生告訴他，
「等著瞧吧，台灣很快便會被這些人搞垮。」

「早知如此，當初便不該來。」二馬悵悵地說。

（中略）

「共產黨是我們中國人的希望。」韓心平氣來的解釋，二馬便沒再說話……（頁 215）

韓國梁以上述說詞（清廉的共產黨員，以及作為「中國人」希望的中共）嘗試吸收二馬加入組織，這樣的說詞在戰後初期地下黨案件中並不罕見。但諷刺的是，作者隨即在下一章中，將視角轉移至二馬留在中國的親屬，描寫了同樣為五〇年代，中共統治之下的種種地主鬥爭、煽動暴力的現實，而這些現實與前者形成極端反諷——魯家為地主，二馬的母親魯桂妹在土改的浪潮中遭到村民批鬥，窮鄉親有如土匪，分割著魯家的田地、搜刮魯家的財產，將魯桂妹囚禁於家屋，二馬的妻子王冬青更住在牛棚中；土改末期，魯家遭到鬥爭，被村民批鬥與毆打，魯桂妹更險些遭到槍斃處刑，幸得王冬青趁夜裡拯救才得以逃跑。小說的安排極具諷刺性，通過對比同時代在台灣的二馬與在中國的親屬，揭示了中共統治下的殘酷現實，從而打破了對中共的盲目崇拜，強調了歷史的複雜性和多面性。

《海神家族》透過「複眼」的敘事形式，以「跨時間」與「跨空間」的策略，延展「時間」，以強調歷史與人物立場的動態性；突破「空間」的限制，揭示歷史複雜性，並拒絕對「中共」的盲目崇拜。相較於前述藍博洲的《藤纏樹》，僅將時間停留在五〇年代，片面追捧中共地下黨人的理想性，《海神家族》更是透過跨時間與跨空間的策略，凸顯了歷史的「弔詭」之處。然而，作者也並未否認或模糊化「中共」在五〇年代對部分有志於「改革」與反抗國民黨貪腐的理想青

年所產生的吸引力，小說承認了這股反抗力量在當時所具有的號召能力。這種複眼的敘事手法，使讀者得以反思不同勢力之間的交互影響，並在此過程中打破了善與惡、是與非的二元框架。



第三節、 穿越時空：米果《朝顏時光》的對比意識

米果的《朝顏時光》¹⁴⁶，入選 2007 年第七屆的皇冠大眾小說獎，2008 年一月由皇冠出版。該書以「穿越時空」為其主要的敘事特色，並涉及戰後初期中共地下黨的主題。

《朝顏時光》描述小說主角「幸子」，在姑婆「顏張翠文」的告別式上，遇到時光旅人「徐謙田」；自此，展開了幸子與徐謙田二人挖掘歷史、改變歷史的歷程。

小說中，涵蓋了戰前與戰後，牽涉到許多與「中共」相關的人物與案件。作為穿越的重要人物——徐謙田，自旗津公學校畢業後，至光華眼科當學徒。光華眼科是張席祺（戰時參加共產黨，張翠文的二哥、幸子的伯公）開設的診所，隨著張家兄弟（三男張邦傑、五男張席君）投入抗日運動，有感於日警騷擾不斷，才離開高雄並前往廈門、上海開業，並以診所作為掩護，抗戰期間從事情報工作；而徐謙田也曾赴上海光華眼科，從事情報工作。戰後返台的徐謙田，在二二八事件的動盪中，對時局混亂深感憂慮，在一次與友人的聚會後，意外遭到警方逮捕與槍決。然而，徐謙田並不理解自己被逮捕與槍決的原因。小說的另一條支線，幸子的舅舅「顏世泓」（張翠文之子）也曾於五〇年代涉入省工委「學委會」案件，曾服役於火燒島。徐謙田在被槍決之際，意外地開啟了時空穿越的能力，在與幸子相遇之後，才逐漸釐清被逮捕的歷史緣由：徐謙田戰時參與光華眼科的情報工作，由於國共合作抗日的背景，同時提供國共雙方情報資料，未料，國共日後反目成仇，反而成為徐謙田被捕的原因。

《朝顏時光》全書共展開兩次歷史的「拯救行動」，試圖透過穿越，改變歷史：第一次，二人穿越回 1950 年 6 月 20 日，也就是顏世泓因「學委會」事件被

¹⁴⁶ 米果：《朝顏時光》，台北：皇冠，2008 年 1 月。

捕的時間點，嘗試與顏世泓通風報信，但最終失敗收場，未能改變他被逮捕的命運；第二次是幸子獨自穿越回 1947 年 3 月 11 日，在徐謙田被逮捕的前一刻，協助徐謙田逃離台灣，投靠上海開業的張席祺。第二次行動成功，徐謙田免去遭槍決的命運。然而，小說最終並沒有提供正向的結局：徐謙田「躲過台灣的二二八，躲不過中國的文革」，「在台灣被當成左翼分子，在上海被當成親又走狗」，最終下放青海勞改，抑鬱終老。

一、時空錯位的書寫意義

近年來，台灣文學中「穿越」與「時空錯位」等敘事手法的意義，逐漸引起學界的關注。鄭芳婷討論楊双子《花開時節》，有別於既有的穿越作品幾乎都已回到中國古代為主題，該作品敘述一名中興大學畢業生穿越回台灣日治時期的劇情。鄭芳婷指出了「穿越」行動本身的顛覆性力量，並認為《花開時節》描繪的穿越劇情結構，無論在形式和內容上皆是對「中國穿越劇風潮的批判」，其作品使過去遭黨國意識形態隱而不談的在地歷史現身；同時，以「百合」作為主題的穿越形式，除了透過時空錯置的形式置疑並顛覆線性史觀與官方敘事之外，也以百合主題酷兒化長期反同性戀與陰性特質的官方國族意識形態。¹⁴⁷鄭芳婷指出了穿越情節的敘事模式，作為鬆動主流歷史的一種批判策略。

湯舒雯則進一步地給出更全面性的觀點，指出了千禧世代的台灣文學作家，具有偏好「時空錯位」(anachrony) 為類型的歷史書寫傾向。她追溯理論系譜，Jacques Rancière 使用「時空錯位」(anachrony) 一詞取代長久以來飽受汙名的「年代錯誤」(anachronism)，從而賦予該詞正向建構，恢復了「多重時間性」的肯認，於是，「時空錯位」一詞具有了反對線性、霸權時間觀的意義。至於千禧世代為何偏好使用「時空錯位」的歷史書寫類型，與其共通的「遲到、滯後」的時間焦慮有關，進一步地型塑千禧世代透過文學以呈現「逼真」歷史、「共情」與賦權、

¹⁴⁷ 鄭芳婷：〈打造台灣酷兒敘事學：楊双子《花開時節》作為「銳角」行動〉，《女學雜誌》第 47 期（2020 年 12 月），頁 93-126。

「問責」與啟蒙等美學型態。¹⁴⁸簡而言之，湯舒雯在整體千禧世代的歷史書寫中發現了時空錯位的整體傾向，來自於共通的成長背景，以及對時間「遲到、滯後」的焦慮。但不論是鄭芳婷或湯舒雯，都指出「時空錯置」具有積極意義——抵抗線史觀與霸權時間性，以及解構單一的官方敘事的正面意義。

《朝顏時光》的作者，並非屬於「千禧世代」的範疇（並非 1980 年代出生，該作品也非活躍於 2010 年代）。作為穿越時空題材的「先行者」，早已揭示「穿越」的意義：「穿越」是源自於對現世的不滿，轉而尋求潛能化多線歷史的可能性。幸子反覆地穿越回戰前與戰後初期的台灣社會，試圖尋找改變歷史發展軌跡的切入點：

一定有辦法找到精準的切入點，可以避免錯誤的屠殺或莫名的犧牲，只要我們找到那個切入點，也許結局就有辦法逆轉過來，許多歷史發生過的荒唐事，就可以避免，不是嗎？（頁 118）

《朝顏時光》透過文學虛構的方式，「潛能化」歷史多線發展的各種反事實的想像，而這種想像，也正是對於國民黨威權時期所奠基於線性、進步的單向的官方敘事，得以鬆動與解構策略。

不同於千禧世代「時空錯位」題材之特色在於：2010 年代的作品通常以奇幻、拼貼的方式架構歷史場景，雖然使用了許多史料元素，但在情節上重新組合，創造出具有歷史氛圍的虛構時空；而《朝顏時光》則力求忠實再現歷史事件、人物和背景，小說中運用了大量的文獻作為基礎，相較於前者顯得更加拘謹。可以說：前者的「穿越」呈現出奇想與拼貼的歷史時空，後者的「穿越」則更著重於史料的完整性與真實性，是「再脈絡化」的過程。

考慮到「中共地下黨」主題的特殊性，《朝顏時光》透過穿越於不同時代的人物，展現出高度的對比意識，使來自不同時代脈絡的穿越者相會、碰撞與交流，藉此帶出反思——強調不應以當代眼光看待五〇年代的政治事件。下項論述。

¹⁴⁸ 湯舒雯：〈「轉型（期）正義美學」：台灣千禧世代的時空錯位歷史書寫〉，陳芷凡等人主編，《台灣文學的來世》（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3 年 11 月），頁 35-61。



二、何以「穿越」？異質時空脈絡的衝撞

小說人物在穿越情節中展現了高度的對比意識，凸顯了不宜以相同眼光，看待不同年代政治抗爭的意涵。時光旅人徐謙田，從 1940 年代穿越至新世紀的台灣，在小說中扮演著兩個時代背景「異質」碰撞的關鍵角色，不斷提醒讀者不應以新世紀的眼光看待半世紀前的處境，也不宜輕易地以「叛國」、「意識形態對峙」等當代視角來解讀戰後政權交替的混亂時期及其政治抗爭運動。小說透過「穿越」情節，作為跨越時代脈絡反思的策略。

在小說當中，徐謙田與幸子相會以後，代表著不同時代的兩人的交流，他們來自不同的歷史脈絡，對於歷史的認知擁有截然不同的視角，製造出許多跨越時代脈絡反思的情節。小說第十六章，徐謙田穿越至 2000 年後的台灣，對於充滿著燈光音效的抗爭遊行、互相吵架的政論「民嘴」感到驚訝。而徐謙田對於「民嘴」講述戰後歷史時，將他們從事情報工作的行為解讀為「滲透」與「叛國行動」的說法深感憤怒：

要說終戰之後到二二八事件發生，僅僅一年半時間，當時的社會氣氛，確實有期待與失望的落差，像我和張家幾個兄弟，戰時賣命對抗日本軍國主義，多少是渴望民主太平日子到來，畢竟戰亂多年，誰都想要安穩過生活……。我不知道其他人怎麼想，我自己是膩了那種生活，要不是盧溝橋事變，中日正式宣戰，我也不會攔下台北榮町這種的眼科診所，重新返回上海，追隨張家兄弟做情報工作，要說我有什麼企圖，和我們這些人有什麼野心，如那個唱戲表演活像乩童的媒體名嘴說什麼滲透顛覆叛國的有計劃行動，簡直胡扯！（頁 177）

徐謙田作為一名穿越到當代、曾親歷二二八事件的「當事人」，覺得自身的行動被誣陷；隨後幸子省思道：「這年頭的政治抗爭有太多意識形態的對峙，許多真實會被曲解」（頁 177），即便如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詮釋，「尤其在政黨輪替後，每到了選舉，互相仇視的政敵就拿二二八事件當成籌碼……也選擇他自認為有利的角度去解讀」（頁 178）。透過兩個年代對歷史事件的解讀碰撞，引發了幸子對當

代民主化後黨派惡鬥的深刻反思。小說中的「穿越」情節，凸顯了兩個時代的不同脈絡，並強調不應以當代服從於特定立場的眼光來解讀戰後歷史事件。

小說中對於「當代」如何解讀的歷史事件，展現了高度的反省意識。當幸子計劃著下一次的穿越行動，拯救舅舅顏世泓時，遇見了學長「謝直人」，並與幸子談起了顏世泓所涉入的「學委會」案件。對於正在調查舅舅案件始末的幸子，講述了她在調查過程的心得：

要還原歷史真相，還是要些難度，我們現在所讀到的歷史，只是比較接近事實的主觀臆測與想像而已，至於真相如何，除非有機會重新回到那個年代，否則很難還原，畢竟，回憶起來都帶著痛苦與不諒解，或因為輾轉陳述而變形，不管事口述的人，還是記錄的人，甚至是閱讀的人，都帶著自己的情緒，即使是同一個事件，也會產生不同的解讀與註解，很多人都會選擇對自己有利或安心的角度，各自對歷史狂妄批判，尤其到了選舉，變成早作話題之後，就更加離譜了。（頁 94）

基於不同的立場與目的而產生的解讀，小說批評為「狂妄批判」。小說對當代如何理解白色恐怖展現了高度的自我反省，並透過上述引文強調，歷史詮釋應尊重其複雜的面向，而非以特定目的的角度簡化或扭曲。小說以「穿越」為敘事手法，讓角色在不同時代中穿梭，透過異質角色體驗並比較各個年代的社會、政治與文化脈絡，進一步引導讀者反思歷史事件的多重意義與其解讀的可能性。

總結而言，穿越形式的小說具有重新賦予歷史多線想像的正面意義，藉此拒絕霸權與線性史觀。而《朝顏時光》的獨特之處在於，作者反而透過穿越情節，重新「再脈絡化」歷史事件，並透過來自兩個不同年代人物的「異質」碰撞，重新思索如何評價身處戰後初期混亂狀況中的參與「共產黨」和「情報工作」的意義。小說所說：「謙田活在戰亂歲月，幸子生於太平年間，時間錯亂碰撞」（頁 52），小說的穿越設計，具有這種高度的「對比」意識，挑戰了單一的歷史敘事，也使得讀者在體驗角色的穿越與碰撞過程中，能夠更加深刻地理解歷史詮釋的高度複雜，所暗示讀者的內涵是：不應輕易以當代意識形態對峙的觀點，去脈絡化地評價戰後初期混亂的歷史狀態。《朝顏時光》的穿越情節，作為引導讀者跨越時代脈絡反思的手段，開啟了檢討歷史詮釋的新契機。



小結

總結而言，2000 至 2010 之間，隨著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以及中共外部侵略威脅的增加，這並不有利於講述五〇年代中共地下黨受難者故事的外在結構。此外，此時期的書寫者也是繼承九〇年代奠定的口述史傳統，其具有特定與單一的敘事結構；在此波記憶生產的浪潮中，書寫者以文學的虛構與想像，開展了各自的「反敘事」策略，本章分別以後設小說、複眼敘事、穿越時空三項策略論述，指出文學書寫者以書寫形式抵抗線性、複雜化歷史的一次挑戰行動。

藍博洲的《藤纏樹》採用後設小說的形式。不同於一般後設小說具對真實再現的反諷意味，藍博洲反而透過揭露創作過程，以「書中書」的形式營造一種「逼近真實」的效果；本節也指出，這種「逼近真實」實則參雜了諸多藍博洲的主觀期待與臆測，來填補歷史的空白。《藤纏樹》使用後設小說的形式，使小說人物在多重對應、錯位的改編中拉開與現實政治的距離，遁入虛實交錯的曖昧情境，開創更多言說空間。一方面，這種手法批判了撰寫五〇年代的故事的行動，並不見容於當時正趨興起的黨外勢力與公眾視野；另一方面，也策略性地避免影響到倖存者現實生活中爭取政治受難者的補償。

陳玉慧的《海神家族》採用複眼敘事。小說中採用人物的多重視角，並採用「跨時間」與「跨空間」的形式作為小說講述五〇年代中共地下黨受難者的策略。「跨時間」，將時間延展開來，展示人物隨著政治事件與環境變遷的立場轉變，不論是人物所持有的立場，或是面對歷史創傷的態度，往往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動。「跨空間」，並不止於對中共地下黨理想性的呈現，而是以同一時間點、另一個空間裡所發生的殘暴統治揭露對「中共」一詞的片面理解。小說並沒有模糊化五〇年代中共在反抗國民黨威權與貪腐中的號召力，以及人物投身其中的革命行動；但也不同於《藤纏樹》片面地呈現與盲目的英雄崇拜。

米果的《朝顏時光》以「穿越時空」為其主要敘事特色。小說源於對歷史創傷的挖掘與修補動機，透過讓人物「穿越」到過去，釐清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的原由，並轉而拯救受難者，尋求潛能化多線歷史的可能性。小說透過來自異質時空的人物碰撞，產生對歷史詮釋的高度反省意識。小說指出，當代對於歷史詮

釋往往「狂妄地」具有目的性，不應輕易以當代意識形態對峙的觀點，去脈絡化地評價戰後初期的混亂歷史狀態。小說的穿越作為「再脈絡化」的過程，透過還原戰後初期的歷史舞台，促使讀者重新思考如何評價身處戰後初期混亂狀況中的參與「共產黨」和「情報工作」的意義。

最後，有必要再重新勾勒本文所謂之主抵抗與被抵抗的軌跡。本章藉由三本小說所展現的反敘事策略：藍博洲《藤纏樹》的後設小說、陳玉慧《海神家族》的複眼敘事、米果《朝顏時光》的穿越時空，作為抵抗繼承九〇年代冤假錯敘事結構的策略。然而，該階段的抵抗者，在下一階段又可能成為後人所抵抗的對象，這顯示隨著時間與社會脈絡的推移，主流敘事重心的轉移，以及文學抵抗對向的多層次與動態特性。我們將會看到，在下一章中，藍博洲以更為激化的烈士敘事重新現身於台灣文學的場域，而這樣的趨勢也將興起後續反省的浪潮。

第四章

記憶對立的激化與反省（2010 年以後）



記憶是複數的，但紀念很單一，有壟斷性。照亮這個就看不見那個了。

——顧玉玲《餘地》

2010 年代活躍於台灣文壇的年輕世代，成為台灣文學新生代的中流砥柱，開啟了台灣文學史嶄新的篇章。在這個時代，「千禧世代」於台灣文學場域中展現的創作新趨勢尤為顯著，而他們的作品與其成長背景以及三一八學運有著緊密的聯繫。在此之前，有必要先勾勒 2010 年代的政治脈絡。

王濬的研究，很深刻地刻劃了 2010 年代籠罩在台灣的不安。馬政府時代，開啟了兩岸交流制度化的「新常態」，但這樣的局面卻並沒有帶來對中國的好感，反而諷刺性地釀成大規模的三一八學運。王濬指出其發展脈絡，馬政府以 ECFA 為代表的兩岸經貿政策，在 2010 年代起已然醞釀起「反中／反親中／反傾中／反併吞」的動員結構；其中，「天然獨世代」扮演著公民運動的重要角色。王濬是如此定義「天然獨世代」：

其與生俱來地擁有「民主自由價值」與「台灣獨立自主」的「天然成分」，此批 1980 年代末以後出生的世代與過往的世代相比，更不受威權統治、統派的「中國意識」或獨派的「悲情意識」所影響；而是根據其自身的國族經驗，所形成的「先天性」或「自認為是先天性」下的民主自由信仰與台灣主體意識，而上述兩者所共同建構而成的，即是「台灣是台灣人的國家」與「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族認同態度。（頁 32）

由於天然獨世代經歷了中國對台「外交打壓」的日常，並且對「中國因素」的侵略、統戰和滲透等問題擔憂的不斷累積，最終在《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黑箱通過的主因刺激下，終於全面性地引發大規模的公民運動。¹⁴⁹

如果說「天然獨世代」將他們的擔憂，轉化在公民運動的抗爭之上；那麼，擁有相似的時代／成長脈絡的「千禧世代」，也將類似的擔憂帶入了文學創作的理念之中，並以「文學」為基地的戰鬥位址，積極地面向社會大眾。詹閔旭指出，千禧世代的作家（出生於 1980 年代的，並於新世紀登上文壇），成長於重塑台灣主體認同的本土化氛圍之中，也繼承此前歷史書寫者「以歷史書寫改變歷史視野」的企圖，特別的是，他們開展了許多獨特的書寫形式，他以黃崇凱為例，指出小說《文藝春秋》（2017）使用獨特的媒介、記憶與歷史的辯證關係。¹⁵⁰「千禧世代」的概念是以其作品「作用」於台灣文壇的時間點為劃分依據，但同時也考量其出生與成長的脈絡。邱貴芬也觀察到，千禧世代的作家作品，也使台灣文學的發展在 2010 年代形成一個重要的轉折——其作品中「台灣文學」成為重要的資產，「正在催促一個以『傳承』和『台灣文學作為文化記憶』的台灣文學傳統的誕生」¹⁵¹；而湯舒雯也指出，千禧世代也經歷了三一八學運，其感覺結構也與學運事件同構，表現在作品中展現出一種「轉型（期）正義審美」，他們：

注重史料與行動主義，致力於召喚共情（無論是浪漫主義式的或寫實主義式的）、重視文史知識普及（轉譯）與文學教化功能、有意識地將文學創作活動視為積極扭轉歷史詮釋、介入政治倫理議題的一種媒介。（頁 60）

152

¹⁴⁹ 王濬：〈「天然獨」世代的「島嶼天光」？——三一八學運中的國族認同與兩岸關係〉，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 年。

¹⁵⁰ 詹閔旭：〈媒介記憶：黃崇凱《文藝春秋》與台灣千禧世代作家的歷史書寫〉，《中外文學》第 49 卷第 2 期（2020 年 6 月），頁 93-124。

¹⁵¹ 邱貴芬：〈千禧作家與新台灣文學傳統〉，《中外文學》第 50 卷第 2 期（2021 年 6 月），頁 15-46。引號內引用段落於頁 41。

¹⁵² 湯舒雯：〈「轉型（期）正義審美」：台灣千禧世代的時空錯位歷史書寫〉，陳芷凡等人主編，《台灣文學的來世》，頁 35-61。

千禧世代與「天然獨世代」擁有相似的成長背景，也同樣面對中國崛起的「他者」焦慮，他們的文學作品，與公民運動類似，積極地面向社會、介入社會，強調了文學的「實用性質」。正如湯舒雯所揭示，千禧世代的歷史書寫，嘗試透過文學的形式「啟蒙」讀者、喚起讀者的共情，並在道德上譴責歷史的不正義。這些文學書寫的行動，與公民運動者號召群眾參與及關懷的性質相似，並與其成長背景所形塑的台灣主體意識息息相關。於是，文學書寫，成為了千禧世代作家的戰鬥基地，以此作為出發點，嘗試以書寫的行動喚起大眾對於本土歷史的關懷、型塑新時代的共同體意識，以及重新「潛能化」歷史中的弱勢群體，並對於歷史中的不正義重新究責。

這些研究集中在千禧世代歷史書寫中呈現台灣歷史的獨特形式。千禧世代成長於本土意識崛起的環境中，這一點造就了他們歷史書寫的獨特性。不過，若以五〇年代的中共地下黨為對象重新聚焦，是否能夠觀察到一些共通的現象？本文依序回應：第一，它們是如何「呈現」（或「不呈現」）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記憶？第二，我們仍然不能忽略那些「非」千禧世代的作家們，他們在這個時代裡依然創作不輟。他們所受的教育與成長背景與千禧世代作家截然不同，但也經歷了三一八學運事件的洗禮。在這樣的時代氛圍裡，他們的文學書寫又是如何呈現五〇年代的中共地下黨案件？並又欲藉由「重新關注」五〇年代的中共地下黨案件訴說些什麼？世代之間的互動，或和諧或對立，反映了如何觀看歷史的世代分歧。第三，本文也發現，自 2020 年代以後，興起了一股反省上述對立激化的浪潮，反映在劇場以及小說的創作當中，至今仍持續的發展。綜上，在此階段當中，文學及其所欲抵抗對象的軌跡越趨複雜，各自擁有其相異的戰鬥位置；本文透過「中共地下黨」的聚焦，欲勾勒出新時代裡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書寫場域裡的角色關係，作為記憶與記憶的鬥爭的第三階段。

第一節、現象：歷史的那些空白

「類型化」是一個新時代的美學趨勢。「類型化」是「大眾文學」(popular literature)的美學呈現，當文學成為市場商品之後，勢必產生「類型化」，藉此「分

眾」以提供區別性的產品，滿足不同類型消費者的需求¹⁵³。湯舒雯也指出，千禧世代的歷史書寫也因崛起於台灣文學體制化以及「(純)文學之死」的交會時刻，因此著迷於「浪漫化地挖掘台灣歷史之謎」，以吸引當代讀者為要務，一方面是基於文學市場的考量，一方面是文學「實用性」的考量，希望吸引大眾，達到文史知識「普及化」的效果，藉此「教育」大眾；因此，千禧世代的歷史書寫，不同於過去「文學的純粹性」信仰，而是傾向於「類型化」的審美特質¹⁵⁴。新時代「類型化」的美學趨勢，來自於千禧世代書寫者對於文學實用性的追求，以及文學市場機制的商業考量。

在這股新時代的趨勢之下，我想拓展湯舒雯的觀點。不僅是千禧世代歷史書寫具有上述的趨勢，擁有相同成長經驗者所創作、關懷台灣文史知識的「文化商品」（例如：電影）也具有類似的趨勢，兩者的關係則更為親近，其性質界線也不再壁壘分明。就電影《返校》（2019）而言，作為票房破億的商業電影，是關懷白色恐怖歷史且受大眾矚目的優秀作品，徐漢強導演也符合上述「千禧世代」的定義，其成長背景與學運世代擁有密切的關係。徐漢強導演曾在受訪提及，電影希望傳達珍惜「我們現在擁有的這一切」的精神，畢竟「我們現在所認知的自由與生活，其實是經過非常長久的痛苦與掙扎，以及很多人的犧牲所換來的，這絕對是不能忘記的事情」¹⁵⁵，電影在商業性與實用性間的考量，與上述千禧世代書寫者的狀況，及其積極面向社會大眾、啟蒙觀眾的精神並沒有相距多少。如果我們要全面性地描述鑲嵌在這一個時代脈絡中的共通現象，不妨也將這類電影一同納入討論，藉此觀察這些敘事如何再現五〇年代的中共地下黨。

可以發現，這些敘事上呈現了一種特定形式的「空白」。

¹⁵³ 陳國偉：《類型風景：戰後台灣大眾文學》（台南：台灣文學館，2013年11月），頁18。

¹⁵⁴ 湯舒雯：〈「轉型（期）正義審美」：台灣千禧世代的時空錯位歷史書寫〉，陳芷凡等人主編，《台灣文學的來世》，頁57。

¹⁵⁵ Dominique Chiang：〈《返校》導演徐漢強：不要忘記我們現在擁有的這一切，是很多人的犧牲所換來的！〉（2019年9月17日），<https://www.elle.com/tw/entertainment/voice/a29066798/direction-director-interview/>。檢索日期：2024年11月2日。。

一、行動與思想的模糊化：《返校》「去歷史化」的敘事手法

《返校》是其中一個例子。第一章曾提到，《返校》電影中再現的歷史材料並非全是虛構。電影歷史原型的說法眾說紛紜，但最無爭議的是「省工委」之基隆中學案件之鍾浩東《光明報》事件，究其原因，除了電影角色魏仲廷的學號「501014」向鍾浩東忌日致敬的彩蛋之外，主要還是得力於「文本外」（電影外）的各式宣傳與評論（詳見第一章）；先前已然指出，電影中並沒有留下太多關於「鍾浩東」或「省工委」的實質線索。

其實，這樣的現象並非從《返校》才開始。2016年，收錄在時報出版的《幌馬車之歌》中，社會學者趙剛即觀察到：當代台灣「歷史意識」的幾項問題，使我們對於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致上一種「奇怪的沉默」，他說：當代台灣把「鍾浩東們」如何行動、思考給遺忘給予模糊化了。趙剛所說的「幾項問題」包括三項：一、大眾消費社會了產生「天然的」「歷史終結感」；二、歷史意識被狹隘的政治化（這項的意思是：台灣長久以來繼承「親美、友日、反共」的政治格局，使我們「無意識地」接受了某些歷史的觀點——例如「共產革命是暴力的」即為其中之一）；三、當代台灣所謂的「新左」，其實是基於西方知識體系和資本主義現代社會的前提，這樣的結果導致他們無法真正挑戰或突破既有的歷史框架，這些「新左」的歷史敘事經常從「解嚴」或「1950年代進口替代」等時間點開始，從而忽略了更早期的重要歷史事件和左翼運動（例如「把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模糊化處理）。¹⁵⁶趙剛會有上述的說法，是為了凸顯《幌馬車之歌》一書的「價值」所在（作為一篇稱職的「書序」而言），先不論《幌馬車之歌》本身，但趙剛所指出「奇怪的沉默」的問題，直至《返校》電影，我們仍然能看到類似的現象。

趙剛指出的「行動」與「思想」的模糊化是值得藉鑑的分析視角。

首先，是「行動」的模糊化。觀察《返校》的電影敘事，可以發現一種「非歷史化」（ahistorical）、「時代錯置」（ahistoricism）的特徵，這種特徵也模糊化人物的「行動」。Olick 指出「道德哲學與普世人權論述」是理解當代「懺悔政治」

¹⁵⁶ 趙剛：〈救贖的歷史，歷史的救贖〉，藍博洲著，《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2016年1月），頁23-31。

(politics of regret)¹⁵⁷的框架之一，二戰之後的秩序重建（例如紐倫堡審判）「普世人權」論述才成為世界政治中主導框架，而這些論述往往具有「非歷史化」（ahistorical）、「時代錯置」（ahistoricism）的特徵：雖然論述者花費了大量精力來描述人權概念的淵源，但缺乏對概念在不同歷史條件下如何發展的解釋；這導致人權被視為一個跨歷史的概念，而不是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的產物。¹⁵⁸如果我們觀察《返校》的敘事手法，可以發現這種特徵。《返校》電影起初，殷老師及魏仲庭等師生，於學校儲藏室抄寫泰戈爾禁書的畫面，並由魏仲庭的獨白，開啟了電影白恐詭譎的序幕：

人，不是應該生而自由的嗎？深信這句話的我們，曾躲在學校的儲藏室裡，一字一句地抄下那些得來不易的書，但諷刺的是，我們卻活在一個，談自由是犯罪，讀禁書攸關生死的年代。

電影是以當代「生而自由」的人權觀點作為電影開頭，凸顯了電影時空（1960年代）脈絡下「閱讀禁書」的合法性；而這是一種將當代的人權觀點潛在地移植到過去的作法。正如 Olick 所提醒，當代得以使特定的人權觀點成為普遍的可能，並不是超驗主義一般地「本然」存在，而是來自於歷史過程當中，試圖改變威權統的能動者，他們展開的種種行動藉此抵抗威權的持續性建構過程。電影敘事手法很容易傳達一種潛在訊息，即「生而自由」的價值似乎已然先天性地存在於歷史中的每一個時刻，無須經由人為爭取與建構，但這種表現形式很容易淡化抗爭者主動打破不合理束縛、與當權者對抗的意志。結果，電影中的人物被描繪為「不知為何而抗爭」、「只有純粹受難」的形象，使其「行動」被模糊化。

第二，是關於「思想」的模糊化。如果參照《幌馬車之歌》關於倖存者口述的資料，可以知道，鍾浩東任職基隆中學校長的任內，「以中共地下黨員為核心」，

¹⁵⁷ 政治合法性仰賴於「集體記憶」，Olick 觀察到，當今世界處理「過去」的集體記憶，往往呈現出「可怕的」、「令人厭惡的」，且從中「吸取歷史教訓」的特徵，這與前幾個世紀將過去視為某種「英雄時代」、或實現歷史承諾、或忠於歷史遺產的傾向截然不同，他稱之為「懺悔政治」（politics of regrets）。

¹⁵⁸ Olick, Jeffrey K. *The politics of regret: On collective memory and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Routledge, 2013. pp.121-126.

「在教職員中秘密組織學習小組，閱讀進步書籍」。¹⁵⁹與電影中以浪漫化手法參照，電影由文學《泰戈爾》「讀書會」取代鍾浩東等人的「讀書會」自印《光明報》，作為「研究馬克思主義和研討台灣時事的刊物」，從而「站在工農立場的工農意識」，達致「反帝階級教育」（頁 211）的顛覆國民黨威權與階級的歷史能動性。電影以浪漫化的文學文本為讀書會的閱讀內容，一方面想影射鍾浩東等人的歷史原形，一方面又選則性地遺忘鍾浩東等人的共產黨身分及其政治關懷，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人物本身的「思想」層面。不論是「行動」或「思想」，電影所呈現的人物都是「無意」違逆國家，卻又「平白無故」遭罪的人物形象，這種「真實無辜」的形象固然受到大眾同情、賺人熱淚，但這種審美傾向卻不免落入某種「純粹受難」的刻板印象，與真實人性有違。

二、善與惡的二元論：《流麻溝十五號》的「浪漫化」與「汙名化」

除了《返校》之外，另一部備受關注的電影《流麻溝十五號》也展現了類似的特徵。關於《流麻溝十五號》的分析，林傳凱在已然在〈「白色恐怖」中的女性政治犯——重思「歷史真實」與「再現」的政治〉¹⁶⁰一文中已然詳盡闡述。

林傳凱指出，當代的兩種主要「敘事框架」（無論統獨派的「冤假錯敘事」與「烈士敘事」）在處理真實案例中的複雜身心經驗時都存在不足，因此可能會有一些不完全或者偏離史實的地方，並透過電影《流麻溝十五號》分析當代敘事如何再現白色恐怖的女性政治犯。林傳凱的分析聚焦在「小傅」（傅如芝）與「小張」（張金爵）兩位女性身上。在今日常見的敘事中，「小傅」與「小張」時常被帶入一套「冤假錯敘事」之中：「小傅」擁有純潔的形象，卻遭國家羅織罪名；「小張」則變節、告密，並與「特務」交往才「免除判刑」。林傳凱指出，這套「冤假錯敘事」與藍博洲 2001 年收錄在《台灣好女人》的〈小傅〉一文密切相

¹⁵⁹ 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2016 年 1 月），頁 181-182。

¹⁶⁰ 林傳凱：〈「白色恐怖」中的女性政治犯——重思「歷史真實」與「再現」的政治〉，《性別平等教育季刊》第 101 期（2023 年 6 月），頁 16-29。

關，儘管藍博洲擁有訪談的調查基礎，然而參雜許多背離真實的主觀臆測¹⁶¹（懷疑「小張」告密、在未見小張判決書的狀況下推測她免刑，但實際上小張有判決書，也未被免刑），成為塑造這套「冤假錯敘事」的起源，並經由地方政府的不斷強化，從而成為電影《流麻溝十五號》的藍本。實際上，林傳凱透過新公開的檔案資料及其個人的田野調查分析後指出，真正的告密者為傅如芝，而非張金爵，儘管張金爵曾有所辯駁，卻並不怎麼有效（林傳凱分析的原因有三：張金爵高舉「共產黨」經歷而遭冤假錯敘事排除、張金爵「告密」一說流傳廣泛、張金爵本身人緣不佳且「粗曠」的女性形象不為世人所歡迎）。這樣的脈絡也反映在電影《流麻溝十五號》中，電影中「小張」被塑造成告密者的身分，最終更因不抵精神壓力而發瘋。林傳凱的論文最終想告訴讀者的是：「汙名化」使「小張」被冠上莫須有的罪名，影響了張金爵的餘生；而「浪漫化」的「小傅」也抹滅了歷史的輪廓，兩者不啻皆為「再現政治」的雙重「悲劇」。

不論是《返校》或是《流麻溝》，作為面向大眾、類型化的文化商品，皆可以從中看見浪漫化審美的再現傾向。林傳凱的形容很是生動，他說：不論是冤假錯或烈士敘事哪一種敘事，都「亟欲『再現』出一張張『乾淨』到不似人類的面孔」；它們簡單地將善與惡分立，不允許雜質參雜其間，也不允許擁有人性的那些灰色地帶。不可諱言地，在消費市場所帶動的類型化文化商品的場域運作機制當中，一張張善惡分明的臉孔顯然更受到消費大眾的青睞。其實，這也未必全是負面的，因為「青睞」很是重要，這是在這個時代當中號召更多人關注特定議題必經的過程；然而，這種「類型化」審美的傾向在呈現複雜歷史與人性方面難免有所妥協，不論是《返校》或《流麻溝》，我們皆能觀察到這樣的現象。

¹⁶¹ 這部分呼應本文第三章的觀點。藍博洲往往在資料空白之處，帶入其主觀對於情節的「期待」，因此藍博洲的敘事往往存在某種過於鮮明的善／惡刻劃。同樣的手法仍能見於第三章所分析的《藤纏樹》當中，例如：在無確實證據之下，基於主觀臆測，阿里將「鍾炳全」（「藤纏樹」中的「鍾成焜」）定為「告密者」。這是藍博洲歷史書寫中常見的手法，也是其常見的盲點。

三、「強弱翻轉」後的零餘者：千禧世代歷史小說「日治經驗」的偏重

最後，將焦點回到千禧世代的歷史書寫。藉由「浪漫化」的文學書寫打入大眾市場，以喚起公眾對於「台灣」的認識與關懷，這樣的性質在千禧世代的歷史書寫當中可以體現。其中，書寫「日治時期」的題材具有特殊的意義，對於探討在地內容與凝聚本土意識具有重要作用；而日治時期的文獻與文學，不僅是解嚴後形塑台灣文學史論述的一部分，也是 1980 年代出生的作家們重新思考在地文化、建立文學資料庫，以及與外國文學交流的一個途徑。¹⁶²楊双子《花開時節》¹⁶³的情節，描述二十二歲的女大學生穿越回日治時期 1930 年代的台灣；《台灣漫遊錄》¹⁶⁴刻劃日治後期青山千鶴子與王千鶴兩位女性的情誼；而瀟湘神的作品更是與日治時期的題材密切相關。瀟湘神提出了一種「後外地文學」的主張，這是化用自島田謹二提出的「外地文學」論，其中包含異國情調、寫實主義、鄉愁三項要素，瀟湘神借用這樣的觀點，並以小說創作者的角度，嘗試「浪漫化」的方式吸引讀者對台灣歷史產生興趣，進而關懷台灣歷史；其中，「異國情調」有助於喚起讀者的好奇與想像，而日治時期的題材即提供了良好的資源——瀟湘神以他自己的作品〈潮靈夜話〉為例，該篇小說描繪 1930 年代但「現已不可能／不存在」的地景，這些內容與當代的时间與空間產生落差，於是使讀者產生了綺麗的幻想，一種宛如「異國」的想像¹⁶⁵。瀟湘神轉化了「外地文學」概念，利用「異國情調」浪漫化的書寫策略使大眾認識「台灣性」，汲取日治時期的文化符碼作為資源：不論是《帝國大學赤雨騷亂》、《金魅殺人魔術》、《殖民地之旅》、《魔神仔：被牽走的巨人》皆與日治時期的題材密切相關；其中，《台北城裡妖魔跋扈》更是在日治時期的許多細節、人物的考證基礎上，虛構了「日本未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直到一九五〇年，台灣也在日本的統治下」¹⁶⁶的平行時空。這種「日治時期」經驗的重新偏重，是以台灣為本位的「島嶼史觀」取代既有霸權的「中華

¹⁶² 高嘉勳：〈在地妖怪的生成法：對日治歷史的想像、重建與反思〉，《淡江中文學報》第 47 期（2022 年 12 月），頁 109-142。

¹⁶³ 楊双子：《花開時節》，台北：奇異果文創，2017 年 10 月。

¹⁶⁴ 楊双子：《台灣漫遊錄》，台北：春山出版，2020 年 3 月。

¹⁶⁵ 瀟湘神：《魔神仔：被牽走的巨人》，台北：聯經出版，2021 年 1 月。

¹⁶⁶ 瀟湘神：《台北城裡妖魔跋扈》，台北：奇異果文創，2015 年 4 月。

史觀」的一項挑戰，但在這股趨勢之下可能產生另一種的問題——在強弱翻轉、賦權弱勢之後，那些僅存在於既有的「中華史觀」中的「弱者」記憶又再次的被排除在記憶板塊之外，失去其行動與思想的意義。

《台北城裡妖魔跋扈》可能是一個較為明顯的例子。這本小說沒有直接處理白色恐怖的議題，反而是以日治時期延續的世界觀，覆蓋了戰後初期台灣所發生二二八與白色恐怖事件。小說中呈現出台日妖怪間的衝突，以及台日文人間理念的辯論，這種（半）虛構的五〇年代，更是勾起讀者「另一種」歷史軌道的奇幻想像，同樣發揮了近似於「異國情調」一般「不可能／不存在」的奇幻效果——本該在白色恐怖中喪生的呂赫若，卻能夠在「另一條」（不存在的）時間線中參與文學議題的辯論。¹⁶⁷小說的世界觀不僅與既定的歷史軌跡構成落差（沒有二二八、白色恐怖的世界），並運用當代流行文化中較不熟悉的日治時期文化符碼，以及日本與台灣本土的鬼怪想像，增添「異國情調」的陌生想像，《台北城裡妖魔跋扈》可謂是非常成功勾起讀者的奇想，並抓住大眾讀者的目光。這種平行時空的小說主題，構成的流行文化元素、類型化審美的傾向。

「日治時期」題材在瀟湘神的作品當中具有策略意義，這種策略在既有的研究中已然指明。馬立軒觀察到，小說的「虛構」其實具有「現實」的隱喻關係：他認為虛構的日本殖民，其實是對國民黨政府統治（殖民）的隱喻，所暗藏的是權力的上對下關係，而小說中的內地人／本島人、日本妖怪／台灣神明也可對應戰後外省人／本省人的標籤，小說中的新日嵯峨子透過提出的「後外地文學」與

¹⁶⁷ 呂赫若在小說中沒有正式出場，但他在小說中所發表的主張，卻頻頻以「被引用」的姿態出現在各方論辯當中。例如「呂赫若以一篇〈浮華虛無的「浪費才能」〉，將未壹批得體無完膚，甚至直接將未壹視為西川一派」（頁 15）；新日與西川滿討論「外地文學」時說道：「內地文學的定義太過侷限。我這麼說，與呂赫若先生、黃得時先生他們的批評不同，我對西川滿先生的美學並無意見，不如說還十分支持。……」（頁 37）；又說：「是……我們或許不喜呂赫若先生等人的寫實主義論調，但《文藝台灣》與《台灣文學》的論戰，說到底並非唯美文學與寫實文學的論戰，而是預設讀者的落差……」（頁 37）。可見在小說中，呂赫若仍活躍於五〇年代的文壇，也對未壹的文學作品公開評論，並以被轉述的方式進入「新日沙龍」的文學論壇之中。

「灣生文學」的方式試圖化解二者對立的行動。¹⁶⁸湯舒雯也從 Gallagher 的歷史行動主義，觀察到千禧世代小說中具有「賦權」弱勢、重新「潛能化」那些「底層或少數」的群體，除了包括「日治時期常民經驗」之外，也包括原住民、女性、新移民、戒嚴時期的本土文化等，這些內涵在千禧世代「時空錯位」的書寫中，被擺放在某種適合的環境，重新予以潛能化。¹⁶⁹「日治時期」的題材作為過去被「消音」的弱勢經驗，透過（半）虛構的日治時期題材與已重新強調，也是向過去「中華史觀」霸權抵抗的一種敘事策略。但這種策略正是本節所指稱的問題所在。

這種策略賦權弱勢、強弱翻轉，使得過去被壓抑的經驗得以在小說的敘事中復活。然而，對於日治經驗的側重，反而以虛構的時間線覆蓋了原有抵抗威權的歷史軌跡。這些被「遺落」者，他們的思想與行動需置於「中華史觀」當中才有意義，在這樣的策略與翻轉當裝創造了縫隙——在中華史觀中也同樣處於「弱勢」的中共地下黨經驗，又再次地被排除在發聲的主體之外，儘管在小說中有留有少數的場景，卻僅是以被轉述聲音「偶爾」現形，他們的主要戰場——與國民黨威權抗爭的「戰後初期」，並不存在於小說虛構的敘事線當中，自然地，他們的行動以及思想也在此敘事線中缺席與模糊化。

不論在流行文化產品和電影中，以浪漫化或汙名化的方式呈現出善惡分明的面孔，做為吸引大眾的敘事手法，顯得刻劃人性灰色地帶的複雜面向有所妥協；或是，千禧世代的歷史書寫更側重於日治時期的經驗，甚至通過虛構的時間線掩蓋了五〇年代中共地下黨員的行動，這些都體現了一種「留白」的表現形式。

¹⁶⁸ 馬立軒：〈以三重模仿論看《台北城裡妖魔跋扈》〉，《嶺東通識教育研究學刊》第 9 卷第 4 期（2022 年 8 月），頁 61-84。

¹⁶⁹ 湯舒雯：〈「轉型（期）正義審美」：台灣千禧世代的時空錯位歷史書寫〉，陳芷凡等人主編，《台灣文學的來世》，頁 53。

第二節、激化：從〈許金玉〉到《春天》

在上述的政治、文化脈絡之下，藍博洲的書寫意義則有待重新評估，也較能夠觀察從 2000 年代至 2010 年代藍博洲書寫的變化。

本節指出，藍博洲的書寫展現了立場「激化」的現象：相較收錄在前作《台灣好女人》中的〈許金玉〉，在《春天》當中，雖然同樣是書寫許金玉及其夫辜金良的故事，但藍博洲顯然以更介入史料的敘事者姿態現身文本當中，作為表述自身政治立場的方式。與第三章所論的《藤纏樹》相較，在《春天》中，藍博洲更是弔詭地嫁接五〇年代地下黨的案件於當代的政治脈絡，作為建構他「統派」史觀歷史正當性的策略邏輯，這是藍博洲轉變的明顯特徵，也是他顯而易見的盲點所在。要重新理解藍博洲的激化，需置於上述大眾文化敘事中對於「中國／中共性」淡化處理的脈絡下重新評估——他的「激化」正是來自於上述「模糊化」的反動。

「還有這樣的台灣人」¹⁷⁰是藍博洲在《春天》書中所欲回應當代社會的話語，使讀者在當今「去中國化」的政治「逆流」（頁 160）下，借許辜二人「左統」的生命建構歷程，指稱這其實也是一種「台灣人的面貌」（頁 159）。他試圖創造一種與當下社會不和諧的國族認同及歷史敘述，挑戰當代認識框架。然而，這樣的主張並不意味著藍博洲擁有某種超然、客觀、超脫框架的歷史認識；相反的，研究者曾彥晏即已指出，藍博洲擁有堅定「民族」信仰的敘事內容，參雜了許多藍本身主觀的見解，他透過強勢與全知的訪談與引導，表現出急切的尋求歷史證據、蓋棺論定，進而獲得歷史的詮釋權。¹⁷¹本文並不否認這異樣的觀察，但《春天》的激化，具有衝撞主流敘事的企圖，透過再現這些被當前主流所排除在「框架」外的、倡導「左統」的受難者人物及其歷史身影，具有試圖打破既有認識框架、強調歷史脈絡的複雜性與異質性的當代訴求。然而，在分析藍博洲的敘事以前，本節先以前作《台灣好女人》與新作《春天》相較，可以發現藍博洲更積極介入

¹⁷⁰ 藍博洲：《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桃園：台灣人民出版社，2017 年 12 月），頁 157。

由於以下重複引用該書，因此僅在引用句後標註頁數，不再另行註解。

¹⁷¹ 曾彥晏：《敘事與記憶——藍博洲的報導類作品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頁 152-154。

文本的政治立場闡述，弔詭地將五〇年代地下黨嫁接當代，作為建構「統派」史觀的歷史正當性邏輯，可以將其理解為藍博洲政治立場「激化」的特徵。



一、與主流敘事衝撞的企圖：重複出版與立場的激化

許金玉的故事，藍博洲早在 2001 年《台灣好女人》¹⁷²中以專章形式公開其訪問成果。《台灣好女人》聚焦的是五名五〇年代女性政治犯受難者的故事，其中一章則以「許金玉」為題，而該章內容與《春天》書中許金玉部分具有高度的重疊性。

與《台灣好女人》不同，許金玉的丈夫辜金良過去基於個人原因未曾公開口述資料。《春天》的重新出版，不僅公開了辜金良的口述歷史，藍博洲更以「敘事者」的姿態介入文本之中，對既存的史料進行了不同以往的詮釋。《春天》採用「敘事者」、「辜金良」、「許金玉」人物交替出現的敘事形式，而《台灣好女人》的〈許金玉〉，則採以「第一人稱」的寫法，為得是「省掉許多不是必要的作者議論」¹⁷³，換句話說，藍博洲在《台灣好女人》中有意識地與口述文本保持一定的距離。然而，《春天》的「敘事者」，除了在文本中扮演著鋪展歷史背景的功能之外，在一些時刻當中，敘事者會賦予口述文本主觀的詮釋意涵，而這些詮釋目的在於批評當下的政治。簡單而言，藍博弔詭地將五〇年代地下黨去脈絡化地嫁接當代政治，作為建構「統派」史觀的歷史正當性邏輯。

以文本的例子而言：「路，還是要繼續走下去的」這句話出自於許金玉之口，而不論在《台灣好女人》或《春天》中，都是藍博洲所欲強調的口述資料，並將該句作為標題。在《台灣好女人》中，其完整段落如下：

我以為，我們過去所受的一切的苦，都沒有關係，只要大家能夠得到真正的幸福就好了。而我認為，我們要能真正得到自由，還是要等到祖國統一的那一天。我在年輕的時候，因為受到計老師的影響，從一個養女而走上

¹⁷² 藍博洲：《台灣好女人》，台北：聯合文學，2001 年 6 月。其中，該書第五章即為〈許金玉〉，頁 201-252。

¹⁷³ 藍博洲：《台灣好女人》，頁 203。

工運的這條路，現在我雖然年紀大了，可只要我能夠做到多少，我還會盡量去做的！畢竟，路，還是要繼續走下去的！¹⁷⁴

該段落強調的是許金玉個人對於「紅色統一」的政治理想，寓意著革命之「路」尚未走完。在《春天》中，同樣也引述這段許金玉的口述資料，儘管部分詞彙更動、排版的調整¹⁷⁵，但整體而言意義上並無不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敘事者將該段嫁接作為「近年來，面對島內台獨勢力囂張地宣揚『去中國化』論述的社會氣氛」（頁 18）的回應；並在《春天》最末，再次將許辜二人的口述資料，扣合重新出版後的社會氛圍，也就是藍博洲主觀認為的「台灣當局在島內刻意煽動的」、「去中國化」（頁 161）的政治時局。藍博洲的重新出版行動，充滿著他鮮明的政治立場，將舊有的口述史料挪用、扣連至當代的政治現況，並賦予其主觀的詮釋意義，強調受難者的中共身分屬性，做為建構「左統」史觀合理性的策略，也是他顯而易見的盲點。

從《台灣好女人》到《春天》，可以發現藍博洲書寫態度的變化。他從既有的訪談史料，在新版本當中移作回應時代政治氛圍的方式。藍博洲不僅文本中的介入程度顯著增加，並透過他的引導，重新強調了受難者的「中國／中共性」。這一方面可以視為藍博洲試圖衝撞社會主流敘事的書寫企圖——強調另一種被排除在公共主流視野之外的「受難者」身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個人濃厚的立場，與自〈許金玉〉到《春天》激化的變化軌跡。

二、藍博洲的「烈士敘事」

作為思想與行動「模糊化」的反動，藍博洲的書寫刻意彰顯了許辜二人的思想與行動，並且強調為理想犧牲的無怨無悔。這種「烈士敘事」同樣忽略人性灰色地帶及掙扎，藍博洲選擇以另一個極端回應當下主流的「冤假錯敘事」。

《春天》中詳述了二人自日治時期啟蒙民族與階級的「自覺」之後，逐漸左傾至社會主義、參與工人運動的思想轉變歷程。藍博洲的書寫，除了強調省工委

¹⁷⁴ 藍博洲：《台灣好女人》，頁 249。

¹⁷⁵ 藍博洲：《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頁 157。

的身分屬性外，也打破「無知」的形象，刻意強調對於投身地下行動的深思熟慮；同時，強調描寫省工委為了「紅色統一」的政治理想，從而投身顛覆黨國威權的行動也多加著墨。

省工委的計梅真，作為郵電案的國語教師，藍博洲藉許金玉之口，描述其為一股推動「歸班」運動的幕後力量。書中，描述了「光復」後的「狂喜與幻滅」，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計梅真透過國語補習班影響許金玉，「學會打破自閉的傾向，走向群眾，開始參加局裡的一些團體活動」（頁 72）。在《春天》中，不同於普遍著重的，強調這些受難者「無知」、「被統戰」的無辜「客體」狀態，藍博洲的敘事極力凸顯受難者本身經深思熟慮與選擇的過程，許金玉也在回憶與計梅真的互動中，自言：

究竟是什麼力量使我改變的呢？我想，計老師對我的整個人生觀的改變，是起著決定性作用的。是他把我的意識與潛能喚醒起來的。而我，也不過是讓他喚醒的其中之一而已。（頁 83-84）

藍博洲書寫計梅真透過「教育行動」，對於推動郵電案「歸班」運動的重大影響，透過與學生的問答：「他先是鼓勵我們用國語表達自己對一些社會問題的看法或感想，然後才給我們分析」（頁 78），傳達「自己的權益一定要自己去爭取」（頁 78）的思想，從而使許金玉等人理解所處的立場，並願意挺身投入改善本省人身處壓迫狀態的社會行動。藍博洲的敘事，衝擊了當前「冤假錯」的無辜形象，刻畫下人物思想轉變乃至付諸實踐的轉變過程。「縱然歷經磨難，卻為了理想，他們依舊堅毅的走出一條不凡之路」¹⁷⁶，即便許金玉身陷「保密局北所」，仍不改詢問計梅真「我應該要怎麼做一個好的共產黨員」（頁 127）；辜金良即便受「軍法處審判」，也「始終沒有暴露真正的組織身分」，否則「台灣地下黨的組織提早遭到全面破壞的厄運」，藍博洲評論辜「不僅敢於為了理想而鬥爭」，「還是一個意志堅強，能夠審時度勢，善於鬥爭的革命者」（頁 135）。總而言之，藍博洲的敘事強調了許辜二人思想啟蒙、參與地下黨的深思熟慮以及無怨無悔。

¹⁷⁶ 《春天》封面介紹語，內容並未出現。

「烈士敘事」實則是「冤假錯敘事」的反動與極化的對立反應。這樣的敘事並不一定都是不可取的，至少，藍博洲凸顯了「受難者」的另一個面向，也不再將其視為「無辜」的客體看待。但藍博洲選擇以「烈士敘事」的另一個極端，試圖打破現有的主流形象，《春天》也缺乏對於人性灰色地帶的描寫，而是強調許辜二人加入地下黨的果斷、無悔，這並不似真實人物的臉孔。藍博洲的盲點是顯而易見的，他忽視了不同時空脈絡的差異，弔詭地將五〇年代的地下檔事件嫁接到當——他將五〇年代因不滿國民黨而加入地下黨的行動，作為批評當代「去中國化」政治脈絡的手段，並以此奠定藍博洲鮮明的民族信仰及「紅統」政治理念的歷史正當性。總而言之，藍博洲的書寫是「冤假錯敘事」的另一個極端。

總結來說，藍博洲的書寫意義需要重新置於 2010 年代以後的台灣政治與文化脈絡中評估，才能更清楚地指出其立場變化的意義。《春天》一書重新出版和改寫的過程中，藍博洲以更介入其中的敘事者姿態，以「烈士敘事」強調受難者的中國／中共屬性，作為對流行文化敘事中「冤假錯」形象的回應，這也反映了二者對立的「激化」現象。

第三節、反省：紀念的壟斷

2010 年代以來，隨著上述對立激化的發展，2020 年代開始，也掀起了一股反省的浪潮，關注於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身處在時代「間隙」的的特殊性。

一、來自劇場的反省：《紅色青春》與《無／法／對／白》

2020 年的劇場《無／法／對／白》以及 2022 年的劇場《紅色青春》，他們皆關注於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內心的灰色空間及其世代掙扎。

《無／法／對／白》刻劃了三代人的家庭——因加入地下黨被捕的「張國棟」，成長於戒嚴時期的女兒「張瑾萱」，以及生於解嚴之後、瑾萱的兒子「敬安」。劇評人林乃文的分析，《無／法／對／白》呈現了出生於不同時代的三人之間，「無法理解」也「無法對話」的狀態。林乃文指出：劇中，瑾萱希望父親國棟根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爭取補償，但國棟認為自己的經歷不

符合受難者的冤假錯敘事，因此在多年來掙扎於虧欠女兒的期盼和自我否認之間；另一層次的掙扎，體現在母親瑾萱與兒子敬安的矛盾，母親延續了戒嚴時期的思維，反對兒子敬安熱衷於「反送中」運動，母親的恐懼帶出了無解的問題：「『反送中』的共產黨、中國，與『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的共產黨、中國，『是一樣的嗎？』」。¹⁷⁷《無／法／對／白》更注重「共產黨」與「受難者」身分之間的矛盾，並刻畫出受難者在講述自身故事與社會制度間的掙扎；這與藍博洲將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身分弔詭地嫁接到當代政治脈絡不同，劇場更促使觀眾思考這兩個時代「共產黨」不同的意義。

另一部做劇場的作品《紅色青春》。張智琦以〈我們的思想自由了嗎《紅色青春》〉為題，分析劇場《紅色青春》，並指出當前轉型正義的未竟之處。與《無／法／對／白》相似，《紅色青春》同樣描寫祖孫三代的故事，五〇年代受中共地下黨人（「國語補習班」的老師）啟蒙而加入社會運動，被以「匪諜」逮捕的月娥；成長於戒嚴時期、「匪諜」月娥的女兒愛華；以及愛華的兒子、月娥的孫子阿智。阿智作為一名大學生，訪談月娥時，曾以為月娥是被「壞人誤導」、「冤枉」的受難者，並對於月娥不申請補償一事感到不解，然而在阿智進一步地理解月娥之後，才逐漸同理她的立場與思想。張智琦指出，這部作品特別之處，在於交代了當事人「受難前」所發生的「事」（例如：與地下黨人思想交流、加入社會抗爭運動），挑戰著以「冤假錯」、抹滅受難者「行動性」、將當年共產黨「妖魔化」為主流的敘事。劇末，藉著阿智的提問「我們的思想真的自由了嗎？」，張智琦指出了當代轉型正義的未竟之處：當我們積極地恢復受難者名譽的同時，是否正視這些他們的思想脈絡？¹⁷⁸

不論是《無／法／對／白》或是《紅色青春》，皆正視五〇年代地下黨受難者的特殊性，一方面挑戰了以「純粹冤枉」或淡化其思想脈絡的主流敘述結構，另一方面，也嘗試使觀眾思考「中共」這一身份在戰後初期的混亂局面以及當代

¹⁷⁷ 吳思鋒，〈無法對話的那個什麼《無／法／對／白》〉，《表演藝術評論台》（2019年11月7日）。轉引自林乃文：〈再現「受難者」形象的漫漫長路：從《無／法／對／白》到《紅色青春》〉，《表演藝術評論台》（2022年11月1日）。除了引文為吳思鋒原文，轉引自林乃文之文章，上述劇場分析亦是參考林乃文的劇評分析。

¹⁷⁸ 張智琦：〈我們的思想自由了嗎《紅色青春》〉，《表演藝術評論台》（2021年12月）。

社會的差異所在，不宜一概而論。相較於前述所提及激化的對立脈絡：大眾文化敘事對於思想與行動的淡化，只留下一幅幅不似真人、善惡分明的臉孔；又或是藍博州激化的立場表述，弔詭地將五〇年代地下黨去脈絡化地嫁接當代，作為建構「統派」史觀的歷史正當性邏輯；不同的是，這波來自於劇場的挑戰給出了一條中間的反省路線：正視五〇年代受難者身處在時代夾縫之間零餘者的思想與行動，並將其「中共」身份與當代區隔。劇場的形式，積極地面相觀眾、強調互動性質，也具有促使觀眾重新想像受難者多重形象與樣貌的可能性。

二、來自小說家的反省：顧玉玲《餘地》中的零餘者們

來自於台灣文學的反省，顧玉玲的《餘地》¹⁷⁹以小說的形式思考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記憶的特殊性。《餘地》更關注於「間隙者」的身分，正如同李淑君指出小說中「間隙者」的三個意涵：改朝換代後成為歷史錯誤的一方、背叛同伴者、世代斷裂中的夾縫之人。¹⁸⁰顯然地，《餘地》對於「紀念」意義上有了更細緻的思考，跨越既有的邊界，關注於遺落在公眾視野之外的「零餘者」處境。

《餘地》出版於 2022 年，同年入圍台灣文學金典獎。小說描寫三個家庭、多個世代之間的交織，從出生在美國的謝真回台尋找父親展開契機，一層層地揭開了祖父輩張進善、余啟正等人所經歷白色恐怖的故事。小說中，進善在戰時到日本內地學習製造戰鬥機，被分配到廣島縣的吳市航空場；戰後返台，考入師範學院，加入詩社。詩社的老師「姜秋霞」為地下黨人，並透過課程向學生傳遞左翼思想，詩社也於暑假組織活動，接觸礦坑、工廠的民眾接觸。不久，詩社被檢舉，重要成員悉數被捕，雖然張進善並未深入參與，也不知姜師為共產黨員，但仍被抓捕審訊，並在特務的「引誘」之下招供。最終姜秋霞等人槍決，余啟正等詩社同學以八到十二年不等的刑期被服刑，而張進善也因「告密」抱憾餘生。

小說不斷複雜化讀者對於受害者與加害者二元的認識論，不將受害者化約為「單純」的理想主義者，也更立體地同理「告密者」的心理活動。當孫子輩的「小

¹⁷⁹ 顧玉玲：《餘地》，台北：印刻，2022 年 4 月。

¹⁸⁰ 李淑君：〈零餘地與間隙者：《餘地》的多重史觀與敘述〉，陳芷凡等人主編，《台灣文學的來世》，頁 215-237。

文」向余啟正問道「余爺爺你是紅色的嗎？」(頁 218)，余啟正沉思良久，以狡黠與挑釁的語氣回應：「誰的血不是紅色的？」；隨後，小說以全知的敘事者闡述了戰後余啟正思想的發展及其複雜的糾結：「當年一同參與礦坑調查的詩友們，多少受到左翼思想的啟蒙，也懵懂想過要為理想做出犧牲」，直至獄中服刑，見識到「求私利而被判，為脫罪而敗德」者，也見識到「品格正直的前輩」，對於余啟正而言「信仰已然是複雜糾結的認識，不是簡化的主義所能蓋擴」(頁 218)。此外，小說最終，在遙遠(進善的孩子)的友人詢問道「你爸出賣同志的事，得到諒解了？」遙遠的回應，一方面強調「複雜化」加害者認識的必要，但也主張不應輕易地將恩怨一筆勾銷：

我們對兇手的想像可以更複雜一點，不要只是發給他壞人卡，可以更有脈絡的，怎麼說？就是可以接受人都很軟弱，但不一定要原諒他做過的事，太容易原諒就會忘得快。(頁 348)

小說回歸到歷史脈絡中，嘗試呈現出複雜的人物樣貌，不輕易以顏色(「紅的」)、「主義」化約思想的樣貌；也立體地描繪人性灰色、軟弱的空間，並謹慎地處理原諒和遺忘的問題。

顧玉玲顯然意識到當代對於五〇年代受難者理解的侷限，小說中強調白色恐怖案件性質多元，不宜一概而論的異質特性，這從阿新與阿文的對話中可以得知：

「一人一款命啦。」阿新轉用台語說，再補充說明：「上個世紀不是有很多政治犯出獄了還參選，那時候還沒有網路，我爸說他還用免費載客去趕場聽政見咧，說台灣人欠他們一張選票什麼的，超熱血。」

「不一樣，以前出來選舉的都是七、八〇年代被關的。余爺爺是五〇年代被當作匪諜的那一群，沒有人敢碰。」(頁 225)

《餘地》本身不僅挑戰了這種「沒有人敢碰」的議題，也強調了不同世代之間，白色恐怖記憶的異質性。

張亦絢的觀察十分準確，《餘地》體現出一種對於「加速轉型正義」的焦躁，在試圖生產出容納雙方記憶核心的「第三記憶」之前，應深化第一與第二記憶的異質性，否則第三記憶的生成則過於粗糙；然而，關於白色恐怖當中「共產黨」

的問題卻是自台灣冷戰、至香港反送中、及至今日，從未清晰梳理的一條脈絡，究其原因，與台灣長年威權反共洗腦的遺緒有關；然而，《餘地》中的其中一條敘事線，便嘗試處理了這個問題¹⁸¹。這樣的意識，在小說中是清晰可見的，《餘地》中藉芬芳（進善之女）參訪德國紀念二戰的裝置時，敘事者如是說：「歷史的篩子很粗心，有意無意就篩漏了那些對當事人來說至關重要的訊息」，又說「記憶是複數的，但紀念很單一，有壟斷性。照亮這個就看不見那個了」（頁 184）小說顯然對於抵抗記憶同質化趨勢有著高度的意識。李淑君也指出，當代對白恐的社會輿論存在「獨派」案件與「左翼」案件的對立，而左翼案件又會被貼上「左統」的負面標籤；李淑君認為，顧玉玲小說一貫地具有「回應當下」、「與社會對話」的關懷，而《餘地》中嘗試化解這種對立的關係，賦予複數記憶共存的可能性——在《餘地》中「顧玉玲呈現一種結合台灣主體本土精神與左翼歷史觀共融的特點」（頁 221）。¹⁸²

如果將《餘地》放在當代如何再現五〇年代中共地下黨受難者記憶的文化脈絡來看，顧玉玲試圖回應的是「冤假錯敘事」與「烈士敘事」對立激化的當下問題；於是，小說更關注於那些溢出兩造板塊爭奪地盤的「零餘」之地——告密者、地下黨，那些屬於「紀念」的背光之處。或許，我們可以把《餘地》視為顧玉玲回應當代轉型正義議程的一種嘗試，所展現的是一種高度的「自反性」的精神——對於既有的「紀念」範疇的反思與批判，試圖擴展邊界，挖掘那些歷史中的邊緣群體和被歷史「篩子」所遺漏的部分；若如此，「地下黨人」並不是她關懷的終點，而是軸線上的中繼站。這種「自反性」提醒讀者面對歷史的謙卑，理解「框架」外的生命建構的過程及其經驗，相較於寄託未來迎向「和解」的某個時刻，她選擇專注於當下的回應方式。

¹⁸¹ 張亦鈞：〈若即若離能動性：略論《餘地》的記憶暫緩與加速〉，顧玉玲著，《餘地》（台北：印刻，2022年4月），頁11-16。

¹⁸² 李淑君：〈零餘地與間隙者：《餘地》的多重史觀與敘述〉，陳芷凡等人主編，《台灣文學的來世》，頁215-237。

小結

2010 年代以來，隨著「反中／反親中／反傾中／反併吞」動員結構的興起，以及後續三一八學運的產生，此背景也影響到文化敘事積極面向社會，強調其實用性值的策略轉向。不論是電影《返校》、《流麻溝十五號》，或是千禧世代的歷史書寫，他們都在商業性與實用性間的考量，都體現出積極面向社會大眾、啟蒙觀眾精神，試圖普及台灣文史知識。

立基於市場考量的「類型化」審美傾向以及實用性的考量，體現在此時期文化商品的敘事當中。然而，這些形式，在呈現複雜歷史與人性方面難免有所妥協。無論是《返校》中對鍾浩東等人的思想與行動的模糊化處理，還是《流麻溝十五號》所呈現的善惡二元面孔，亦或是千禧世代歷史書寫偏重日治經驗的呈現，那些本來僅存在於「中華史觀」中的中共地下黨受難者又再次被排除在外、失去意義。這些例子都揭示了敘事的留白之處。

在此脈絡中，藍博洲《春天》的重新出版以及重新詮釋的行動意義需要被重新理解。藍博洲的激化源自於上述「留白」的反動，相較於《台灣好女人》中的〈許金玉〉，《春天》以敘事者的姿態介入其中，重新詮釋既有的史料。他弔詭地嫁接五〇年代地下黨的案件於當代的政治脈絡，作為建構統派史觀的正當性邏輯。他的敘事也強調受難者的「中國／中共」屬性，以及為理想犧牲的無怨無悔。藍博洲以另一個極端——「烈士敘事」回應既有主流的「冤假錯敘事」。他的「激化」既是個人政治立場的激化，也是烈士敘事與冤假錯敘事兩者對立的激化。但不論是何者，皆具有盲點，皆缺乏對於真實人性灰色地帶及其心理掙扎的觀照。

2020 年以後，觀察到對於這股對立的激化產生反省的浪潮。劇場界的《紅色青春》和《無／法／對／白》都正視了五〇年代地下黨受難者的特殊性。一方面，它們挑戰了將受難者描繪為「純粹冤枉」或淡化其思想脈絡的主流敘述；另一方面，也試圖引導觀眾思考「中共」這一身份在戰後初期的混亂局面及當代社會中的差異，對比至當代反中共侵略的脈絡，強調者兩者的區別，不宜一概而論。至於文學界，顧玉玲的《餘地》則更關注於間隙者的特殊性，小說更關注於那些溢出兩造板塊爭奪地盤的「零餘」之地——中共地下黨，那些屬於能公開「紀念」

的背光之處。《餘地》模糊了善與惡的界限，揭示了紀念的壟斷性，《餘地》也啟示在處理歷史或轉型正義議題時，應該具備反思性和跨越邊界的探索精神。

總結而言，台灣文學及其對抗的軌跡，在此階段當中愈顯複雜。在第二階段（第三章）中，作為抵抗者的藍博洲，隨著政治、文化趨勢的變遷，在此階段展現出激化的變化趨勢，反而又成為被抵抗的對象；然而，不可忘記的是，藍博洲的激化本身，又是作為抵抗當代文化商品敘事中「空白」的一股力量。文學中抵抗與被抵抗的運作軌跡，可能同時兼具上述雙重性質的交會，這些軌跡共同構成本論文所論證的「記憶與記憶之間的鬥爭」的一環。

第五章

結論：台灣文學與那些框架以外的人和事



最後，讓我們回到緒論提到的「李媽兜事件」。湧入留言區批評的網友們，急於彰顯「省工委」等同於「中共」的關係，從一則較具代表性的留言就可以看出端倪：「……我不明白一點，這難道不是中共間諜嗎？所以在台灣當中共間諜是合法行為？不該被判死刑？這不是在鼓勵台灣人替中共刺探機密作下線？」¹⁸³那麼，「省工委」等同於「中共」嗎？我的回答是：是，也不是。省工委確實作為中共在台發展的組織，然而當代對「中共」的理解，是否可以不帶批判地適用於五〇年代的時空背景？這則留言試圖合理化白色恐怖的詮釋，將「中共地下黨」排除在其自身的紀念範疇之外。我認為，這其中體現了威權幽靈的陰魂不散：人們傾向否認事件的「過去性」，將當今的理解帶回五〇年代，重複操演著國民黨威權的潛台詞。也就是在剿滅共匪的大旗之下，「白色恐怖」真的具有正當性可言。

李媽兜事件正反映出集體記憶「非歷史的」和「反歷史的」的特質。因為集體記憶傾向於承認單一觀點，同質化了過去與現在。¹⁸⁴那麼，「台灣文學」作為承載記憶的一種外在形式，是以什麼方式回應「集體記憶」同質化的傾向？循此問題，本文在既有的社會學研究當中發現一套解釋模型：奠基於 90 年代口述史與回憶錄從而體制化的「冤假錯」敘事，制約了後續涵蓋於文學在內的歷史書寫。然而，這類的說法並沒有考慮到台灣文學生成機制的「叛逆性格」，也未能正視台灣文學具有抵抗主流敘事的傳統。由此，本文以台灣文學為範疇出發，以「中共地下黨」為關注焦點，重新觀看自解嚴後以來，台灣的文學書寫者如何回應集體記憶同質化的趨勢。本文就三波記憶的生產浪潮，以二至四章分別對應至三個

¹⁸³ 楊文理 (@楊文理)，2022 年 5 月 22 日上午 8:33，評論於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平復李媽兜、陳淑端司法不法」，Facebook，2022 年 5 月 18 日下午 6:00。

¹⁸⁴ James V. Wertsch. *Voices of collective remember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42-44.

階段，各個階段的感覺結構縱使並不相同，卻不約而同地展現出台灣文學「反歷史與文化制約」的關鍵特殊性，展現了台灣文學的「叛逆性格」。抵抗與被抵抗的系譜在不同階段間產生位移，卻又彼此交織，共同架構了本文所論之「記憶與記憶的鬥爭」的三個階段。

第二章〈倖存者的證言〉聚焦在解嚴後至 2000 年，嘗試指出倖存者見證文學獨特的寫實層面。本章首先從歷史認識論的觀點，試圖釐清五〇年代中共地下黨的記憶在解嚴後初期的處境，以及台灣文學是如何回應上述艱難的處境。在戰後初期，「台共」／「中共」並不是嚴格被區分的詞彙，由於成員多有所重疊，再加上國民黨以正統中國自居，所謂的「台」，多指地域性的概念；直至九〇年代，隨著台灣民族主義的興起，掀起一股「謝雪紅熱潮」，再加上 1996 年第一次總統直選前「李登輝事件」在公眾輿論的推波助瀾，「台共」與「中共」一詞逐漸成為對立的概念，並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命運：「台共」逐漸被建構為「可哀悼」的對象，「中共」更成為「不可哀悼」零餘者。

九〇年代適逢台灣文學本土轉向的時代潮流，書寫白色恐怖的苦難歷史成為重塑台灣主體性的歷史資源。本文發現，來自於五〇年代的倖存者們，在搭上這股時代潮流之餘，也意識到其所經歷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記憶之「中共」身分的敏感性。不論是葉石濤之於「簡阿淘」或蔡德本之於「蔡祐德」，本文於橫跨在真實與曖昧之間的「自傳小說」當中看見了言說創傷記憶的能動性。他們的自傳小說表現出對於「冤假錯」的受難者自我表述的質疑，並刻劃受難者內心言說與否的掙扎，及其抵抗威權的思想與行動。相較於既有研究中強調「見證文學」的現代主義層面——不完整、斷裂、神秘、如創傷徵候般的語言，本章透過「中共地下黨」的主題聚焦，反而指出了其獨特的寫實層面。

第三章〈敘事遺產的繼承與反思〉，將時間推移至 2000 年至 2010 年之間。隨著政黨輪替，中共對台威嚇上升，這並不是一個有利於講述白色恐怖中「中共受難者」的外在環境。此時，台灣文學探討百年歷史記憶的小說開始蔚為盛行，也是文學書寫者們繼承九〇年代奠定的口述史與回憶錄敘事「遺產」的時刻，而這些內容通常具有「冤假錯」一貫的敘事結構。本章指出，文學書寫者並不滿足既有的敘事結構，從而以文學的「反敘事」策略，試圖複雜化歷史本身。本章所

提出的三種策略：後設小說、複眼敘事、穿越時空，分別對應至《藤纏樹》、《海神家族》、《朝顏時光》三部長篇小說。

《藤纏樹》使用後設小說的形式，使小說人物在多重對應、錯位的改編中拉開與現實政治的距離，遁入虛實交錯的曖昧情境，開創更多言說空間。《海神家族》則以複眼敘事展現不同人物的多重視角，通過「跨時間」揭示立場與認同的動態性，並以「跨空間」的多視角避免對中共地下黨的盲目崇拜。《朝顏時光》的穿越時空，透過人物的「穿越」將歷史舞台「再脈絡化」。小說透過來自異質時空的人物碰撞與交流，強調了戰後初期與 2000 年後的台灣政治環境的不同，小說強調不應以當代意識形態對峙的觀點來理解戰後初期參與「地下黨」與「情報工作」的人物與行動。

第四章〈記憶對立的激化與反省〉，則關注 2010 年代以後至今，「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在文化場域當中的發展。自 2010 年代以來，隨著「反中／反親中／反傾中／反併吞」結構的興起及三一八學運的浪潮，這一背景也影響文化商品中敘事的策略轉向——類型化審美趨勢以及講求實用性的趨勢。不論是電影《返校》、《流麻溝十五號》，或是千禧世代的歷史書寫，皆體現了在商業性與實用性間的權衡，並試圖面向社會大眾、普及台灣文史知識。市場導向的「類型化」審美傾向在呈現複雜歷史與人性方面難免有所妥協，都顯示了敘事的留白之處。例如《返校》中對鍾浩東等人的模糊化處理、《流麻溝十五號》中善惡二元的面孔，以及千禧世代歷史書寫偏重日治經驗的呈現，而那些本來僅存在於「中華史觀」，又屬於弱者的中共地下黨受難者又再次被排除在外。

在這一脈絡下，藍博洲《春天》的重新出版及詮釋需被重新理解。藍博洲的「激化」反映了對上述「留白」的反動，藍博洲在既有的史料中又重新強調受難者的「中國／中共」屬性，並以極端的「烈士敘事」回應主流的「冤假錯敘事」。然而，這種對立激化也產生了盲點——缺乏對人性灰色地帶的觀照。2020 年後，反省這股「對立」的浪潮興起，台灣的劇場文本《紅色青春》和《無／法／對／白》挑戰了主流敘述，正視五〇年代地下黨受難者的特殊性，而在台灣小說方面，顧玉玲的《餘地》更關注於間隙者的特殊性，揭示了紀念的壟斷性，並啟示在處理歷史和轉型正義議題時，應具備反思和跨越既有邊界的精神。

在這三個章節的討論之後，我想藉由 Nevin Aiken 的衝突轉型（*conflict transformation*）觀點，進一步指出台灣文學挑戰主流敘事的意義。Aiken 研究分裂社會中的前敵對（*former antagonists*）群體，認為這前敵對群體對過去的理解因為極大的分歧與過度簡化的傾向，導致了彼此衝突的集體記憶；而如果不對這些敘事進行批判性檢視與挑戰，則難以促進群體間的對話與理解。¹⁸⁵而在台灣的脈絡中，鄭芳婷也提出類似的觀點：轉型正義劇場體現出邊界的不可劃定性，持續性地擴展主題，並省思自身的偏見與盲點，觀察那些尚未被關照的邊緣群體。¹⁸⁶轉型正義本身具有不斷跨越既定邊界的動態特質，也正是本研究尋找框架以外的人和事的實踐方向。

不論是來自於外國的觀點，或針對台灣劇場的總結，本文即在上述基礎進一步地推進：台灣文學對於同質化集體記憶所發起的挑戰，正是抵擋過度簡化並導致對立的一股力量。儘管各個書寫者所立基的抵抗視角、抵抗的方向與對象各有不同，但他們皆透過複雜化歷史和挑戰主流敘事的書寫行動，使台灣文學在「同理」框架之外被賦予了新的可能；同時，這些文學書寫者所發起的挑戰，為當代台灣作為分裂社會提供了對話和相互理解的資源。延續上述思路，「中共地下黨」成為我尋找那些對立集體記憶框架之外盲點的一個契機，但這並非唯一的案例。我相信，類似的盲點還有許多，有待我們重新發掘。

本文刻劃了台灣文學在不同階段中，抵抗集體記憶同質化的軌跡。這樣的研究對於當代的台灣而言有什麼意義？如果台灣轉型正義所面臨的問題，是源自於相互衝突的集體記憶板塊，而集體記憶又各自具有其所欲彰顯與遺忘的「盲點」。那麼，我認為「文學」能夠幫助我們尋找那些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人與事，也正是那些不被主流群體所關注的「盲點」。文學書寫者透過敏銳的覺察，並在文本中融入多元觀點以抵抗主流敘事，是為批判邊界、納入更多邊緣群體的書寫實踐。

¹⁸⁵ Aiken, Nevin T. "Rethinking reconciliation in divided societies: A social learning theory of transitional justice1." In *Transitional justice theories*, pp. 40-65. Routledge, 2013.

¹⁸⁶ 鄭芳婷：〈台灣當代轉型正義劇場的美學芻議與實踐困境〉，《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37 期（2023 年 10 月），頁 213-256。

文學的力量正是在於不斷挑戰轉型正義的既定修辭，引領我們重新看見那些——
框架以外的人和事。



參考文獻



一、作家作品

中、日文

- 米果：《朝顏時光》，台北：皇冠，2008年1月。
- 陳玉慧：《海神家族》，台北：印刻，2004年10月。
- 楊双子：《台灣漫遊錄》，台北：春山，2020年3月。
- 楊双子：《花開時節》，台北：奇異果文創，2017年10月。
- 葉石濤：《台灣男子簡阿淘》，台北：前衛，1990年5月。
- 葉石濤：《台灣男子簡阿淘》，台北：草根，1996年9月。
- 蔡德本：《台湾のいもっ子：日本語で書かれた戦後台湾本省人の隠された悲劇》東京：集英社，1994。
- 蔡德本：《番薯仔哀歌》，台北：遠景，1995年11月。
- 蔡德本：《番薯仔哀歌》，台北：草根，2008年4月。
- 藍博洲：《台灣好女人》，台北：聯合文學，2001年6月。
- 藍博洲：《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桃園：台灣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
- 藍博洲：《藤纏樹》，台北：印刻，2002年6月。
- 瀟湘神：《台北城裡妖魔跋扈》，台北：奇異果文創，2015年4月。
- 瀟湘神：《魔神仔：被牽走的巨人》，台北：聯經，2021年1月。
- 顧玉玲：《餘地》，台北：印刻，2022年4月。

二、專書

中、日文

- 小坂井敏晶：《增補民族という虚構》，東京：筑摩書房，2011。
- 王育德：《台湾：苦悶するその歴史》，東京：弘文堂，1964。
- 余昭玟：《從鍾肇政到葉石濤——台灣小說家研究論文集》，台北：五南，2013年2月。

許雪姬、楊麗祝訪問；林建廷、林志晟、柯庭如、辛佩青、辛佩宜、洪瑋伶、游淑如記錄：《承擔家變：白色恐怖下的朴子張家》，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2020年7月。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上）》，新北：聯經，2020年10月。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下）》，新北：聯經，2020年10月。

陳芳明：《孤夜獨書》，台北：麥田，2005年9月。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台北：麥田，2009年2月。

陳柏謙：《激進 1949：白色恐怖郵電案紀實》，新北：黑體，2022年6月。

陳國偉：《類型風景：戰後台灣大眾文學》，台南：台灣文學館，2013年11月。

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新北：衛城，2017年2月。

黃清順：《「後設小說」的理論建構與在台發展：以 1983-2002 年作為觀察主軸》，高雄：麗文，2011年12月。

楊孟軒：《逃離中國：現代台灣的創傷、記憶與認同》，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23年1月。

葉石濤：《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台北：前衛，1991年9月。

葉石濤著；原島利郎、澤井律之日譯本註解；彭萱漢譯：《台灣文學史綱（日譯註解版）》，高雄：春暉，2010年7月。

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2012年12月。

藍博洲：《紅色客家人》，台中：晨星，2003年12月。

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2016年1月。

中譯

Butler, Judith 著，申昀晏譯：《戰爭的框架》，台北：麥田，2022年1月。

Davis, Natalie Zemon 著，楊逸鴻譯：《檔案中的虛構：十六世紀法國司法檔案中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敘述者》，台北：麥田，2001年11月。

Duara, Prasenjit 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2月。

MacMillan, Margret 著，鄭佩嵐譯：《歷史的運用與濫用》，台北：麥田，2018年11月。

英文

- Buchanan, Ian. *A dictionary of critical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Butler, Judith. *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 Verso Books, 2016.
- Davis, Natalie Zemon. *Fiction in the archives: Pardon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Newman, Michael. *Transitional justice: Contending with the past*. John Wiley & Sons, 2019.
- Olick, Jeffrey K. *The politics of regret: On collective memory and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Routledge, 2013.
- Waugh, Patricia. *Metafic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lf-conscious fiction*. Routledge, 2002.
- Wertsch, James V. *Voices of Collective Remember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三、 期刊論文

中文

- 李淑君：〈一九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左翼女性政治受難者：女性身份、女性系譜、政治行動〉，《台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18 卷第 2 期（2021 年 12 月），頁 75-148。
- 汪宏倫：〈我們能和解共生嗎？：反思台灣的轉型正義與集體記憶〉，《思想》第 42 期（2021 年 4 月），頁 1-61。
- 林正慧：〈1950 年代左翼政治案件探討——以省工委會及台盟相關案件為中心〉，《台灣文獻》，第 60 卷第 1 期（2009 年），頁 395-478。
- 林正慧：〈由「重整後台灣省工委會」案看調查局對自首自新份子之運用〉，《國史館館刊》，第 78 期（2023 年 12 月），頁 3-68。
- 林傳凱：〈「大眾傷痕」的「實」與「幻」——探索「1950 年代白色恐怖『見證』」的版本歧異〉，《歷史台灣》第 8 期（2014 年 11 月），頁 35-81。
- 林傳凱：〈「白色恐怖」中的女性政治犯——重思「歷史真實」與「再現」的政治〉，《性別平等教育月刊》第 101 期（2023 年 6 月），頁 16-29。

林傳凱：〈再思台灣脈絡中「政治受害者」與「傷」的本地意涵〉，《本土心理學研究》第 57 期（2022 年 6 月），頁 103-118。

林瓊華：〈左獨、左統與民主自治：台灣社會主義者謝雪紅的政治認同與實踐困境〉，《文史台灣學報》第 12 期（2018 年 9 月），頁 105-129。

邱貴芬：〈千禧作家與新台灣文學傳統〉，《中外文學》第 50 卷第 2 期（2021 年 6 月），頁 15-46。

范宜如：〈邊緣發聲：藍博洲《藤纏樹》的書寫策略及其意涵〉，《人文集刊》第 5 期（2007 年 7 月），頁 141-159。

范銘如：〈後鄉土小說初探〉，《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11 期（2007 年 12 月），頁 21-50。

馬立軒：〈以三重模仿論看《台北城裡妖魔跋扈》〉，《嶺東通識教育研究學刊》第 9 卷第 4 期（2022 年 8 月），頁 61-84。

高嘉勵：〈在地妖怪的生成法：對日治歷史的想像、重建與反思〉，《淡江中文學報》第 47 期（2022 年 12 月），頁 109-142。

張瑞芬：〈國族·家族·女性——陳玉慧、施叔青、鍾文音近期文本中的國族／家族寓意〉，《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10 期（2005 年 6 月），頁 1-26。

陳芳明：〈白色歷史與白色文學——葉石濤與藍博洲筆下的台灣五〇年代〉，《文學台灣》第 4 期（1992 年 9 月），頁 220-221。

陳柏謙：〈挖掘、拼湊歷史過程中遺忘「歷史」的陷阱——一個「白色恐怖」口述史入門工作者的自我意義探求〉，《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103 期（2016 年 6 月），頁 191-199。

彭明輝：〈《聯合報》社論對台灣重大政治事件的立場與觀點（1950-1995）〉，《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18 期（2001 年 5 月），頁 277-308。

曾建元、曾薰慧：〈青春戰鬥曲：戰後國立台灣大學政治事件之研究（1945—1955）〉，《文化實踐與社會變遷》第 2 期（2017 年 6 月），頁 37-105。

黃秀端：〈政治權力與集體記憶的競逐——從報紙之報導來看對二二八的詮釋〉，《台灣民主季刊》第 5 卷第 4 期（2008 年 12 月），頁 9-10。

葉虹靈：〈台灣白色恐怖創傷記憶的體制化過程：歷史制度論觀點〉，《台灣社會學》第 29 期（2015 年 6 月），頁 1-42。

詹閔旭：〈媒介記憶：黃崇凱《文藝春秋》與台灣千禧世代作家的歷史書寫〉，《中外文學》第 49 卷第 2 期（2020 年 6 月），頁 93-124。

劉亮雅：〈女性、鄉土、國族——以賴香吟的〈島〉與〈熱蘭遮〉以及李昂《看得見的鬼》為例〉，《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9 期（2009 年 10 月），頁 7-36。

劉亮雅：〈近期小說對日治時期的重新記憶：以《鴛鴦春膳》與《睡眠的航線》中的反記憶、認同與混雜為例〉，《清華學報》第 45 卷第 3 期（2015 年 9 月），頁 457-486

劉亮雅：〈遲來的後殖民：賴香吟解嚴小說中的知識菁英和底層人民〉，《中外文學》第 39 期第 4 卷（2010 年 12 月），頁 7-43。

歐素瑛：〈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以李媽兜案為例〉，《台灣史研究》第 15 卷第 2 期（2008 年 6 月），頁 135-172。

鄭芳婷：〈台灣當代轉型正義劇場的美學芻議與實踐困境〉，《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37 期（2023 年 10 月），頁 213-256。

鄭芳婷：〈打造台灣酷兒敘事學：楊双子《花開時節》作為「鉅角」行動〉，《女學雜誌》第 47 期（2020 年 12 月），頁 93-126。

薛月順：〈溫萬金與鹿窟事件的爆發〉，《國史館館刊》第 77 期（2023 年 9 月），頁 1-43。

英文

Delgado, R. (1989). Storytelling for oppositionists and others: A plea for narrative. *Michigan law review*, 87(8), 2411-2441

Oja, Matt F. "Fiction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fiction: Solzhenitsyn and Kiš as exemplars." *History and Theory* (1988): 111-124.

四、單篇文章（專書）

中文

李淑君：〈零餘地與間隙者：《餘地》的多重史觀與敘述〉，陳芷凡等人主編，《台灣文學的來世》（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3 年 11 月），頁 215-237。

汪宏倫：〈東亞的戰爭之框與國族問題：對日本、中國、台灣的考察〉，汪宏倫主

- 編，《戰爭與社會》（台北：聯經，2014年7月），頁159-225。
- 涂書偉：〈新世紀台灣文學的展望〉，洪淑玲等人，《台灣文學史讀本》（台北：五南，2024年4月），頁282-283。
- 張亦絢：〈若即若離能動性：略論《餘地》的記憶暫緩與加速〉，顧玉玲著，《餘地》（台北：印刻，2022年4月），頁11-16。
- 許家馨：〈導論：從轉型正義的反思到歷史記憶的倫理〉，《歷史記憶的倫理：從轉型正義到超克過去》，許家馨編，《歷史記憶的倫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24年3月），頁1-71。
- 湯舒雯：〈「轉型（期）正義美學」：台灣千禧世代的時空錯位歷史書寫〉，陳芷凡等人主編，《台灣文學的來世》（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3年11月），頁35-61。
- 黃長玲：〈序：追求真相與和解的可能〉，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台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台北：衛城，2015年10月），頁5-16。
- 楊孟軒：〈歷史記憶與記憶的歷史：創傷、情感、牽連性與和解〉，許家馨編，《歷史記憶的倫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24年3月），頁257-298。
- 趙剛：〈救贖的歷史，歷史的救贖〉，藍博洲著，《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2016年1月），頁23-31。
- 蕭阿勤：〈敘事分析〉，瞿海源、畢恆達、劉長萱、楊國樞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質性研究法》（台北：東華書局，2015年5月），頁137-172。
- 戴國輝、內村剛介訪問，葉石濤譯，〈一個台灣作家的77年〉，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 第十四卷·資料卷》（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年），頁242-265。
- 藍博洲：〈一刑下去沒有也變有——蔡德本訪談錄〉，《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師院部分）》（台中：晨星，2000年4月），頁253-283。

英文

- Aiken, Nevin T. "Rethinking reconciliation in divided societies: A social learning theory of transitional justice1." In *Transitional justice theories*, pp. 40-65. Routledge, 2013.

Kritzman, Lawrence D. "In Remembrance of Things French" *Realms of memory: rethinking the French past 1* (1996): IX-XIV.

Nora, Pierre. "General introduction: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Realms of memory: rethinking the French past 1* (1996): 1-20.



五、報紙、雜誌

中央日報：「『台共』自動宣布解散各級組織」第四版，1953年1月7日。

中央日報：「潛台共匪組織瓦解 自首者四三六人」第一版，1950年9月28日。

中央日報：「蔡孝乾對謝雪紅指名廣播」第四版，1958年1月28日。

民生報：「『李登輝曾參加共產黨、向調查局自新、出賣很多人』 谷正文出面證實」第十八版，1996年3月19日。

民生報：「『谷正文明顯遭人利用』 李陣營嚴詞質疑」第十八版，1996年3月19日。

朱雲漢：〈台灣民主新的紀元 兩岸不確定的未來〉，《聯合報》（2000年3月19日），第十五版。

李勇：〈赤手伏魔記〉，聯合報，1965年2月13日，第十版。

林志雄：〈顯微鏡下的「台獨」〉，《聯合副刊》第十二版，1979年3月10日-16日。

姜昉：〈謝雪紅之死〉，《聯合報》第34版，1996年1月17日。

須文蔚：〈從後設中見現實糾葛〉，《中央日報》第十七版，2004年2月19日。

聯合晚報：「入共黨案再掀波 老將軍現身談 谷正文：宋心濂要我不能說出秘密 林陣營：忠誠上的污點 不可原諒！ 李陣營：採取法律行動」第四版，1996年3月18日。

聯合晚報：「李登輝是否共黨員 彭明敏：應親自公開說明」第五版，1996年3月22日。

聯合晚報：「郝柏村：中南部李登輝情結是利用省籍挑起的 不能選共產黨當領導人」第二版，1996年3月20日。

聯合晚報：「鹿窟受難者 現身爭補償」第十二版，1999年7月30日。

聯合報：「42年前圍剿鹿窟叛變 指揮官：錯了」第六版，1994年7月9日。

聯合報：「一周大事」第六版，2000年3月19日。

聯合報：「台獨講古 抗戰時期維護民族獨立 台共主張與今大不相同」第二版，
1988年5月29日。

聯合報：「共產黨員？賣友求生？彭謝促李清楚交代政治資歷」第六版，1996年
3月15日。

聯合報：「李登輝曾否參加共黨 谷正文昨天細說往事 谷出面指證：此李登輝 即
彼李登輝；李總部律師：若李是匪諜 谷何以錯放」第五版，1996年3月1
9日。

聯合報：「前『台共』被請出來當『證據』 統獨之爭 更趨複雜」第三版，1988
年5月28日。

聯合報：「是否參加過共產黨？謝長廷要求調查李登輝」第六版，1996年3月1
1日。

聯合報：「桃園地區匪幫組織 當局業已全部摧毀 主要匪犯林秋祥等七人昨正法
餘犯十九名均已分別判處徒刑」第三版，1951年10月9日。

聯合報：「寫完「謝雪紅」發現女性主義——陳芳明 解放了自己」第35版，19
94年4月13日。

聯合報：「潛台匪黨金瓜山支部 全台組織被我破獲 匪首兩名昨晨正法 於兩犯分
別判處徒刑發監執行」第七版，1951年10月8日。

六、 檔案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非法顛覆案／檢呈傅君等一案卷判。1951年3月22日。檔
號：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5/061。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蔡秀榮等叛亂案／葉君知匪不報處有期徒刑五年。1
953年11月19日。檔號：B3750187701/0042/1571/44902099/119/065。

國防部情報局：蔡孝乾／蔡孝乾訊問筆錄。1950年8月29日。檔號：A305050
000C/0036/0410.9/44904440/2/006。

七、 學位論文

王濬：《「天然獨」世代的「島嶼天光」？——三一八學運中的國族認同與兩岸關係》，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年。

林邑軒：《來自彼岸的紅色浪潮：從意義中介視角重構戰後初期「省工委」的地下革命行動》，台北：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

范淑雲：《藍博洲及其作品研究：從小說創作到歷史書寫》，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陳青峯：《導演即大眾史家：電影《返校》的歷史書寫與歷史意識》，台北：台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社會科教學碩士論文，2022年。

曾彥晏：《敘事與記憶——藍博洲的報導類作品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湯舒雯：《史的暴力，詩的壟斷——台灣白色恐怖的文學見證、癥候閱讀與文化創傷》，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年。

葉宗鑫：《戰後初期台灣省工委會學委會之研究（1946—1950）》，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年。

羅宜芬：《台灣政治案件平反與轉型正義——以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為中心》，台北：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

六、其他（含電子資源）

Dominique Chiang：〈《返校》導演徐漢強：不要忘記我們現在擁有的這一切，是很多人的犧牲所換來的！〉（2019年9月17日）。檢索日期：2024年11月2日。<https://www.elle.com/tw/entertainment/voice/a29066798/detention-director-interview/>。

王宗偉：〈轉型正義的下一步——文明社會版的分類械鬥乎？〉，《風傳媒》（2022年5月29日）。檢索日期：2023年5月31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4353702?mode=whole>。

台灣人權促進會：〈不義審判 彌過唯誠 「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評論與分析〉（1998年12月21日）。檢索日期：2024年12月31日。<https://www.tahr.org.tw/publication/777>。

林乃文：〈再現「受難者」形象的漫漫長路：從《無／法／對／白》到《紅色青春》〉，《表演藝術評論台》（2022年11月1日）。檢索日期：2024年12月31日。<https://pareviews.ncafroc.org.tw/comments/92743c4a-4cc5-484b-b3f0-e8e9b3140b39>。

林志雄：《顯微鏡下的台獨》（私立僑光科技大學印製，1979年6月）。檢索日期：2024年12月31日。<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20.032.0072>。

林傳凱：〈左翼、地下、血的預感——五〇年代給青年的邀請函〉，《報導者》（2020年9月17日）。檢索日期：2025年2月3日。<https://www.twreporter.org/a/bookreview-taiwan-white-terror-novel-1-guide>。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平復李媽兜、陳淑端司法不法〉，Facebook，2022年5月18日。檢索日期：2023年5月31日。https://www.facebook.com/twtjc/posts/378811014288206/?paipv=0&eav=Afa8U5GDN-ohibMsyPrL7-TxSRdSkekV6wAJ9J0DPYm-vR0_FqVp99IilzThsMcLKcQ&_rdr。

徐宗懋：〈促轉會赤化台灣〉，《中國時報》（2022年6月1日）。檢索日期：檢索日期：2023年5月31日。<https://www.rti.org.tw/radio/programMessageView/id/134515>。

徐漢強：《返校》，影一製作所，2019年。

國家人權記憶庫：「傅慶華」。檢索日期：2024年12月31日。<https://memory.nhrm.gov.tw/TopicExploration/Person/Detail/3750>。

張智琦：〈我們的思想自由了嗎《紅色青春》〉，《表演藝術評論台》（2021年12月）。檢索日期：2024年12月31日。<https://pareviews.ncafroc.org.tw/comments/f650ccca-8edf-4515-bda7-43c6bf3674aa>。

華視新聞網：〈「返校」非虛構？故事原型「基隆中學事件」〉（2019年09月27日）。檢索日期：2024年12月31日。<https://news.cts.com.tw/cts/entertain/201909/201909271976162.html>。

楊文理（@楊文理），2022年5月22日上午8:33，評論於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平復李媽兜、陳淑端司法不法」，Facebook，2022年5月18日下午6:00。檢索日期：2023年8月28日。

維基百科：「返校（電影）」。檢索日期：2024 年 2 月 29 日。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BF%94%E6%A0%A1_\(%E9%9B%BB%E5%BD%B1\)#:~:text=%E8%BF%94%E6%A0%A1%E7%9A%84%E6%95%85%E4%BA%8B%E5%8E%9F%E5%9E%8B,%E5%91%A8%E8%B3%A2%E8%BE%B2%E7%9A%84%E5%8F%A3%E8%BF%B0%E6%AD%B7%E5%8F%B2%E4%B8%AD%E3%80%82](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BF%94%E6%A0%A1_(%E9%9B%BB%E5%BD%B1)#:~:text=%E8%BF%94%E6%A0%A1%E7%9A%84%E6%95%85%E4%BA%8B%E5%8E%9F%E5%9E%8B,%E5%91%A8%E8%B3%A2%E8%BE%B2%E7%9A%84%E5%8F%A3%E8%BF%B0%E6%AD%B7%E5%8F%B2%E4%B8%AD%E3%80%82)。

維基百科：「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案」。檢索日期：2024 年 12 月 31 日。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9F%BA%E9%9A%86%E5%B8%82%E5%B7%A5%E4%BD%9C%E5%A7%94%E5%93%A1%E6%9C%83%E6%A1%88>。

潘慧中：〈特／歷史真有「方芮欣」！《返校》5 真實故事解析...網淚：比電影更可怕〉，ETtoday 星光雲。檢索日期：2024 年 2 月 29 日。 <https://star.ettoday.net/news/1540092#ixzz8T3aDaMho>。